

目 录

文 献

- 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学风 叶剑英 (1)

回 忆 录

- 北伐和南昌起义 (上) 李一氓 (4)
新疆工作的回顾 黄火青 (48)
忆张家口地区保卫战 肖 克 (53)
难忘的三年 胡开明 (68)
我所知道的“乒乓外交” 赵正洪 (133)
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及图书
出版发行的封锁与反封锁斗争 左明德 (151)

专 题 资 料

- 李大钊与苏联及共产国际 黄修荣 (169)

- 抗战前夕彭德怀为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地方军队所做的贡献 蒋宝华 (179)
- 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军区的政治工作 莫文骅 (193)

综 述

- 党对军队领导的几项组织制度综述 李俊亭 (206)

人物介绍

- 党的挚友陈嘉庚 曾昭铎 (234)

译文选登

- 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 [苏] П·З·索尔金 著
马贵凡 译 (255)

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叶 剑 英

毛主席在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为我们党树立了优良的学风。这就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学风。

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我认为有两层最基本的意义。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我们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千辛万苦，研究了历史，研究了自然，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立和奠定了人类最革命最先进的科学。这是解放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全人类的真正科学。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才真正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才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一百多年以来，全世界革命政党，革

* 本文是叶剑英同志 1977 年 10 月 9 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摘要。

命人民凭借这个武器，把旧世界的一部分打翻了。在打翻旧世界的过程中，伟大导师列宁和毛主席在批判旧世界过程中发现新世界，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这样，就出现了这样的动人情景：革命理论造成了伟大的革命运动；革命运动又促进了革命理论向前发展。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列宁和毛主席的发展，比起一百多年前是更加完备，更加丰富得多了。单从这一点来看，旧世界要被人民彻底推翻，新世界要被人民创造，还有什么疑问吗？我认为是没有疑问了。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林彪、“四人帮”一伙，时而把马克思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时而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原理同另一个原理对立起来，经常不顾任何历史条件，不顾原著的精神实质，挑出片言只语，骗人，吓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最凶恶最无耻的敌人。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如果没有马克思，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我们仍然要在“黑暗中摸索”。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只靠读马克思主义的书，还必须面向实践，参加实践，接触新鲜事物，研究实际问题。伟大的革命导师还说过，如果我们只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脱离实际，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那就只能在生活中实际的“天空中飞翔”。因此，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时，一定要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这就是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处理、解决我们

遇到的一切问题。可以说，理论愈多接触实际问题，愈敢接触实际问题，不是绕开问题走，不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理论就愈加彻底，愈能掌握群众，愈易变成物质力量。党中央号召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做大无畏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相信，只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把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风气普遍推广开来，就可以把我们党的事业推向前进。

一切革命同志，要从正反两面教员中吸取教益。一定要有计划地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一定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联系实际。我相信，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党干部，首先是高、中级干部，一定会切切实实养成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习惯，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责任编辑 刘昌亮）

北伐和南昌起义（上）

李 一 氓

（一）

1926年3月初，我结束了在东吴大学的学习，离开上海去广州。同路人有两个，一是欧阳继修，他离开了上海大学；二是朱代杰，他辞掉了淞沪铁路实习站长的职务。我们坐的是英商太古洋行的一只客货船。我们都取得了党组织开的去广州的介绍信，但党组织并不发路费，要由自己负担，我们只好买船票中最贱的那种散铺了。这种铺没有固定铺位，只临时在什么地方加一个帆布床。我们的帆布床就放在船头一个拉船锚的舱位中，是全船最颠簸的地方。我们居然以乘风破浪的气慨度过了几天海上生活。

到了广州，和广东区委接上头。就在这个时候，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我们对广州政治情况一无所知，直到现在，我对这个事件还是缺乏准确的历史的了解。我认为这是蒋介石设下圈套，诱使李之龙上当，借以压迫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而且经过国民党中央的改组，兼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长，把黄埔军校和他的第一

军中的共产党工作人员全部赶走，要求把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党员名单交给他。在当时的形势下，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妥协了。

事件解决后，我被约到文明路 75 号广东区委会所在地，同陈延年谈了一次话，决定我去政治训练部接替吴明当宣传科长。政治训练部主任是陈公博。那个时候国民革命军没有总司令部，这个政治训练部就隶属国民政府，叫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管理国民革命军各军师的政治工作。办公地点就设在国民政府里面，今广东纺织路仲恺农学院就是它的旧址。

吴明，湖南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原姓陈名公培。可能受当时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不要自己的姓名了，而自称“无名”。但是，实际上行不通，又把“无”改成“吴”，把“名”改“明”，叫吴明。1928 年以后，又叫陈公培了。当时他为什么离开政治训练部，我至今仍不清楚。后来他也没有为党正经工作，逐渐地跟党脱离了关系。1928 年，我在上海见过他，那个时候他的政治观念还不坏，说中国革命要依靠武装斗争，而这个斗争的队伍必须是自己的；大革命时候的武装斗争完全附属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一反动，这个武装就解体了。可见他还有一定革命气派。1931 年，我因工作到北平，正是“九·一八”的时候，在北平看见他。那时他已消极脱党了，在北平赋闲。1933 年他参加了“福建事变”。1948 年全国解放前夕，他到了北平。此后一直住在北京当国务院的参事，很消沉。在北京，我们之间虽然偶尔还有来往，但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我接替吴明工作的时候，是个刚出学校大门的学生，没有^有在军事机关工作过，也没有办过报。吴明虽然卸职了，却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能够顺利地从他手上把工作接受下来，而且逐渐熟练地去完成工作。在我参加工作的开始，能够遇上这么一个人，也可以说是运气了。我们之间虽然不能算是深交，且为时甚短，但一提到他，我总是非常怀念和感谢他的。

我在政治训练部，名义上叫宣传科，实际上就是编那份《革命军报》。因为北伐的关系，这个政治训练部很快就改组了，陈公博也不当主任了。组织科长是周逸群。我当时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在四川同乡当中。如当时在^在广东大学医学院的王季甫、蒋留芳，在黄埔教书的欧阳继修。这样扩展开去，就认识了医学院的柯麟、黄埔的熊雄、余洒度、周恩来的兄弟周恩寿（黄埔三期学生）。因为开会关系，还认识了陈乔年。所有这些人，我离开广州以后，除王季甫、柯麟、欧阳继修以外，就没有什么来往了。

一个人日常生活的食宿总是一个问题。在广州，我一个人租住在高第街一个商店的楼上。午晚两餐，包给^给财政部（现财政厅）附近一个云南馆子，菜不坏，价钱也可以。这样就顺当地直到北伐离开广州。

（二）

北伐时，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改组，改组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邓演达当主任，但后

来一直叫“总政治部”。孙黎明当驻广州的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朱代杰当秘书长，章伯钧当组织科长（他才从德国回国，是共产党员，安徽人），郭沫若当宣传科长（他已辞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这里所谓的科和下面的股，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二级部的部处级。后来加上江董琴（福建人）任党务科长，李合林任社会科长，还有一个郭冠杰当总务科长。我改任秘书。

广东国民党武装力量准备北伐的方针确定以后，除了确定参加部队的战斗序列以外，新的部队的政治工作就提到议事日程上了。因此，就由邓演达主持，开了4天的政治工作会议，解决北伐军政治工作上的原则和具体问题，时间是6月21日到24日。中央党校还存有一份当时会议的原记录（见附件）。它记录了中国近代武装仿效苏联红军建立政治工作的情况。后来，中国工农红军把它认真地继续下来了。

这次政治工作会议，无论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其草创之功，是不可泯灭的，影响所及也是相当深远的。

会议从始至终由政治部新主任邓演达主持，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李富春（任大会秘书）、包惠僧、郭沫若、梁绍文、鲍慧僧、恽代英、余程万、丁默村、伍翔、朱克靖、朱和中、陈公博、黄仲翔、熊雄、陈雁声、林祖涵、关学参、铁罗尼（苏联顾问）、罗扬清、陈璠、贾伯涛、酆悌、甘乃光、李朗如、褚民谊、熊锐、王志远、顾孟余、邓颖超、邓福林、缪斌、杨麟、周恩来、余洒度、彭熙、方德华、李

合林、欧阳继修（阳翰笙）、李笠农、曾扩情，共40多人，几乎包括了当时在广州的直接和间接参加过军队政治工作的所有主要人员。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在总政治部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一切行动都要以总司令部的指令为依据的新形势下，建立一套与新体制相适应的、统一的、系统的全军政治工作的原则和规章制度。

会议主要针对军队政治工作的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议定了总政治部的编制、军队政治部的编制和团连建立特派员和指导员制度。同时，还对政治工作人员的考评、纪律、任免作出了规定。军师的政治工作以及团以下的经费全部由总政治部统一经理，与军费分开，这样就使政治工作经费不受部队经理制度的束缚，既方便政治工作，又避免了军政首长之间的矛盾。

其次是解决北伐军队的群众宣传工作。因此着重研究了宣传队的问题。由李富春主持制定了宣传队组织条例，并请周恩来主持制定有关宣传队的考选和训练方案。同时，由总政治部拟定了许多北伐宣传标语，在广州大批印刷，分发各军师团连使用。这样做，显然收到很好的效果。即使国民党的那些旧军队，经过政治训练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也多少解决了军民关系问题，使北伐进军途中，大受群众欢迎。

会议期间，邓演达还请蒋介石到会训话，题为“战时政治工作人员应注意之点”。蒋介石主要讲了总政治部是隶属于总司令部的，因此一切都要听总司令的。总司令既然

给了总政治部应有的权力，总政治部就应该负起责任。

会议最后一天，邓演达作总结讲话。他对会议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认为这次会议是有历史意义的。他认为政治工作距革命需要尚远，希望大家努力工作，贯彻好会议的各项决定。

陈公博由于两个政治部接交的关系，仍然出席了会议。邓演达两三次说陈公博的好话，说陈公博开辟了部队的政治工作，而邓是在这个基础上把政治工作这个机构接受下来的。这也是事实。

这次会议解决了好多技术问题，如编制经费等等。关于准备北伐的政治工作，也就是北伐时期的战时的和战地的政治工作问题，蒋介石在演说中说，总政治部要统管战时、战地的国民党党务的建设和发展及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与群众运动。这在蒋介石来说，虽然是符合他一贯的集权思想的，但当时北伐军的政治工作所承担的任务，也需要有这一条来肯定它在战时、战地的法律权威，所以在新的总政治部的编制当中，除了原来的组织、宣传科股以外，新增加了党务和社会科股，这就是为解决这个新任务而添设的新编制。

广东的政治工作是从苏联学来的，在这次北伐当中，军事上有一个加仑将军当顾问，政治部也有一个苏联顾问铁罗尼，据说是苏联红军炮兵出身，北伐从广东到武汉，他都和总政治部一起行动。现在流传比较广的一张照片，就是邓演达、郭沫若、铁罗尼三个人在武昌城外照的。就是这个铁罗尼，在《会议录》上可以看出来，他出席了第一

天和第三天的会议。听郭沫若说，抗日战争中他去苏联时，还在莫斯科见过他。

关于会议中讨论的宣传队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广州并没有解决，这是因为在广州很难招募学生参加宣传队，广东学生多了，进入湖南以后，语言上也会发生困难。可能各军、各师的政治部招了那么一点，但并没有能够组成一个宣传大队。真正招青年学生编成一个宣传大队，是在湖南长沙进行的。湖南的青年学生，经过党的动员，很多人加入了这个宣传队。但是谁当宣传大队的队长，却引起了我们和邓演达的争论。邓演达想要季方当队长，而我们则推荐胡公冕当队长，两个人都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但胡公冕是共产党员。最后，邓演达还是同意让胡公冕当队长了，这已经是进入武汉以后的事情了。

这个会议的出席人，都是各单位的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还有的是准备进入总政治部，还没有到任的，如郭沫若；有的是非军队单位，带顾问性质的，如顾孟余、邓颖超；有的则以前是政治工作的负责人，现在已离职的，如周恩来、陈公博。总政治部各单位的负责人，都算列席，不算出席。我也是列席的。在第二次会议上，把我补为印刷委员会的委员，会议记录上的李民治就是我。但在广州因为语言关系，我也并没有参加什么具体工作。总政治部出发离开广州以后就没有这个委员会了，但宣传标语的印刷一直还是由我负责。如到了长沙，利用长沙的石印店，印了很多标语；到了武汉，也在印刷厂印刷了标语，这些都是由我主管的。当时各军、师不自己印刷标语，都由总政

治部印好了发下去。标语有1尺宽，4尺长，顶上有一个青天白日的图案。

对于参加会议的人，有些比较有名的，不管他们最后政治生命如何，在这里都不说明了，如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陈公博、林祖涵（伯渠），褚民谊、顾孟余、邓颖超、周恩来；其余的人，我现在还能记忆到的，简单的做一个注释。

1. 熊雄（1893—1927），江西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战役，失败后随孙中山赴日本。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后转德国和苏联学习，回国后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政治部主任。1927年在广州被国民党杀害。

2. 熊锐（1894—1927），广东人，曾留学日本、法国、德国。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

3. 朱克靖（1895—1947），湖南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回国后任朱培德第三军党代表。抗日战争时，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团长。1947年作为新四军代表派到徐州郝鹏举部队，后被郝鹏举暗害。

4. 鄢悌（1903—1938），湖南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第一师党代表，抗战中任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后因长沙大火案，被蒋介石枪杀。

5. 缪斌（？—1945），江苏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当汉奸，任汪伪政府考试院副院长。日本投降后，以汉奸罪处死。

6. 欧阳继修，即阳翰笙，四川人，当时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队政治部主任。

7. 李合林，四川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回国后任总政治部社会科长。

8. 包惠僧，湖北人，1920年在武汉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曾代表广东区出席中共一大。先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北伐开始时任战时政治训练班主任。后脱党。

9. 李朗如，广东人，南京陆军中学毕业。广东商团的军事干事。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党代表。

这个名单是不全的。虽然都是当时在广州做政治工作的人，但我在广州的时间很短，和他们很少往来，对相当一部分人的下落不明。至于梁绍文、余程万、丁默村、贾伯涛、甘乃光、王志远、余洒度、曾扩情等，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改组派，一些人则当了蒋介石的特务军官。

(三)

在蒋介石的口气里，北伐好象是他提出来的，并且在“中山舰事件”期间，他诬称苏联顾问某某等三人阻挠北伐。这三个顾问也确实在“中山舰事件”后辞职回国了。

对于北伐，北京中央特别会议的3月14日通告（第79号）已经提出这个问题，说：“这个会议，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跟着又说：“……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

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3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中最后说：“真正爱国民众尤应集中于广州国民政府革命旗帜之下，助成他的北伐使命”。但是5月7日的中央通告（第101号）又说：“目前只要广州政府及北方国民军能守住现有的实力，等待直奉冲突之到来，已是很大的胜利。”6月陈独秀致信蒋介石，承认：“我和某几个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主张目前广东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我以为要乘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否则他将南伐，广东便没有积累实力之可能”。奇怪的是7月7日陈独秀发表一篇《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向导》161册），他不认为革命有力量向外发展，而是要防备吴佩孚进攻湖南对广东的威胁。他着重的在文中说了一长段这样的话：“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在整个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的响应反赤。”并且最后说：“所以现时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广东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

在广东和中共有关系的群众组织怎么样呢？4月20日，中国共产党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同日致中国

第一次农民大会的信，没有涉及北伐的内容。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也没有涉及北伐的内容。

但4月10日的广州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决议案，最后口号的第二条却有请愿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好象北伐这件事，国民党还没有什么想法，而我方提出了要求。5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它的口号的第二条却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就是这个农民代表大会，在其全国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报告的决议案后，又提出三条口号：革命的出路是广州政府北伐！拥护广州政府，扶助广州政府北伐！打倒张吴，北伐成功！这就是说，我们拥护或者赞成北伐了。可是这些在4月、5月提出口号赞成北伐的，都是广州或广东的地方工农组织。直到7月底才发表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的宣言》。全总宣言对北伐的态度稍微积极了一些，但基调和陈独秀的文章大体相当。它提出：“国民革命军应宁为拥护民众利益和自由而败，不肯牺牲民众的利益自由而胜，因为这是国民政府北伐与一切国内战争不同之点……”依照陈独秀的说法，就是北伐的时机没有成熟，不仅广东是个被动挨打的局面，而且南方的劳动群众也没有起来打倒北洋军阀的要求。

7月31日中央忽然发出《通告》第一号，改口说：“现在吴佩孚不但是没有力量去南征，即其自身之存在亦尚成问题。”又说：“而革命潮流则随北伐军之进展而上涨，广东政府之北伐已成为全国民众最注意的一个问题。”又说：

“在一个月前还是为防御吴之南侵必须北伐，现时吴既失势，正是革命势力伸张之机会，更须北伐。不过我们虽极力赞助广东政府之出兵，同时须预防过分宣传北伐之流弊：1、令民众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而自己不努力工作；2、对北伐预有过分之希望而终于失望；3、为北伐而先牺牲民众之自由利益。”更奇怪的是规定“在此时期中我们总的政策口号”是国民会议，而不是和北伐直接有关的，争取最后胜利的方针政策。

国民会议的问题是1923年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来的，要求国民党牵头，号召全国商工农学派代表参加全国会议。因为国民党不行，就要上海总商会来当发起人。这个主张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反应。1924年利用孙中山北上，中央又提出各地应组成国民会议促成会并开展活动，同时党中央和团中央联合发出通告，定出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这个口号一直延续下来，到1926年北伐已经开始还是丝毫不变。大革命失败之后，这个口号才自然消失了。

从上面有关文件看来，对北伐这一带号召性的军事行动，党基本采取消极态度。对北伐的总的看法是，这是国民党的事情，几乎和共产党无关。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不是无产阶级的事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最多不过是“扶助”、“拥护”而已。这种指导思想，表面上看来是很有群众立场的，是保护了群众利益的，但是它只突出了北伐与工农群众的矛盾，没有看到军事上的胜利也是革命的胜利，军事上的失败也是无

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的失败。至于说时机不成熟，更是一种对当时社会形势的错误估计。否则，我们何以解释北伐会获得那么大的胜利，人民群众会给战斗部队以那样积极的支援。在北伐路线上，简单的定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四省，而事态的发展是直隶并没有去，河南仅在后期去打了一下奉军，随后便撤下来了。而军事行动所涉及的地地区如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苏这些省却一字未提。对于战争的结局，甚至分析到可能出现蒋（介石）冯（玉祥）孙（传芳）联盟，这将是一个进步的局面。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党中央在整个北伐过程中，对好多关键问题，其方针政策要么是摇摆不定，要么是模糊不清，以至最后发生蒋介石、汪精卫的彻底叛变，夺取了胜利果实，中国人民重新陷入灾难的深渊。对此，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应该负重要责任，从反对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开始，他一直是错误的。

这些事件，今天是比较清楚了，但当时并不如此。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独立的军事力量问题、汪精卫、蒋介石的性质问题等等，作为一个普通新党员的我就是不懂，非常幼稚，听命于中央，听命于上级。急风暴雨的一年，哪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

（四）

北伐开始的时候是夏初，部队已发现霍乱，特别是进入湖南的郴州和衡阳一带，霍乱传染尤为厉害，很影响部

队的战斗力，成为心理上的一种负担。除了多带一点酒精棉花以外，对个人来讲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至于说行军准备，如水壶、指南针、图囊、雨衣、油布，或者陆军呢的绑腿等等，都可以在广州买到。那时广州的百货商店里都是从香港进口的外国货，陆军呢的绑腿就是英国货。个人装备总算应有尽有。

7月中旬总政治部离开广东北上，在出发前，何香凝为总政治部科长以上的干部设宴饯行。邓演达带头参加宴会，另外还特别邀请了周恩来、邓颖超。何香凝发表了一篇鼓励大家争取北伐胜利的即席讲话，但还没讲上几句，就一边讲一边哭，为廖仲恺诉冤。据说廖仲恺牺牲以后，每当遇到这种场合，何香凝总是要哭一场。当然这也不会影响饯行。最后由邓演达带头向她道谢。

广州市公安局长李章达也为我们送行。他是以前大元帅府警卫团团长的身份为我们送行的。为什么他要出面给政治部的人送行，我说不出什么理由。可能是因为他和邓演达关系不错的缘故。

孙潜明也为总政治部的四川同乡饯行，同时请了一些其他的同志，地址在原财政部附近的八景酒家。他同邓演达在德国就认识。总政治部开赴前方以后，邓演达就委托他当总政治部的留守处主任。参加这次宴会的有周恩来、郭沫若、陈莘农（启修）、吴明（陈公培）、朱代杰、李陶（硕勋）、欧阳继修（阳翰笙）、周逸群。据说还有段雪笙、张斗南。另外还有些什么人就记不得了。1927年4月，因为广东形势已开始恶化了，孙潜明离开了广州，到上海后

被白崇禧逮捕，据说4月25日就在龙华牺牲了。1927年5月，我从上海回汉口后曾写了一篇哀悼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央日报》上。

出发时，少数人坐火车，从广州黄沙车站上车到韶关，大多数人是步行，要经过花县、源潭、连江口、英德、马坝才到韶关。到了韶关以后，连我们坐火车去的人，也要徒步前进了。大体上沿京广线南端向北，由韶关到乐昌，翻过大瑶山（这个山现在由于修衡广线的复线，已打通了一个30多里长的隧道），下山就进入湖南境内的郴县，而后奔耒阳，进衡阳。县与县之间究竟渡过什么水，经过什么市镇，每天在哪里宿营，已经不能确指了。现有的印象是，在徒步行军中，很少进入村庄或民家，都是露天宿营。营地都选在周围人口少、宽敞和水源清洁的地方，主要为了避免霍乱的传染。看来还有效，在这支队伍中，没有发现霍乱症。到衡阳以后，缘湘江坐木船到长沙。那时湘江的水流不畅，木船行驶起来经常搁浅。虽然是顺流而下，并不很快，但总比徒步行军省力多了。我们还是勉强坐木船到了长沙。邓演达、铁罗尼、郭沫若和我都在一只木船上。

到长沙以后，住了几天。唐生智早已在长沙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部，他当军长。我们前去拜会，他请我们吃了饭。我们还去找了湖南省委的同志，因为有些事情要请他们帮忙，有些事情要跟他们通气。我认识了省委的负责同志夏曦（曼柏），这个同志看起来很潇洒，并且一口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总政治部在长沙招了200多名的宣传队员。其中有好多青年团员和党员，都是由省委动员来的。

他们还开了一个名单给我，凡是名单上有的，我们都录取了。此外，利用长沙的印刷条件，我们又印刷了一大批标语。这对长沙印刷业来讲，是很大一笔生意了。那些印刷店的老板，接受了印刷任务以后，大包小包的，给我送来了好多礼品，里面还有没有见过的人参。当时认为，这是向我行贿，侮辱了我，于是大训了他们一顿，把东西都退回去了。用一句现在的北京话，真可谓“不要白不要”了。当时有两个办法，一是把东西退回去，要他们对印刷费再减些价，二是收下来交公。简单的退给他们，实在是便宜了这些小业主。

这时，前线的军事发展很快，第四军独立团、第七军很顺利地攻下了汀泗桥、贺胜桥，打垮了吴佩孚的军事力量，迫近武昌城。因此我们赶快离开长沙，向武昌徒步前进。我们到了汨罗以后，向右走通城，直插羊楼司、羊楼洞，再沿铁路线到蒲圻。到了蒲圻，邓演达、郭沫若就丢下我们，搭一辆军车，经过汀泗桥、咸宁和贺胜桥，直奔武昌。剩下的人，由我带队，骑上他们丢下的马，跟在他们后面，赶到武昌去。

大家都知道，消灭吴佩孚的队伍，是在汀泗桥和贺胜桥打了两个非常激烈的大胜仗，占领汀泗桥是8月27日，占领贺胜桥是8月30日。由于白天黑夜地赶，当我们经过的时候，战场还没来得及打扫，击毙的吴佩孚士兵，有的横躺在铁路边上，有的浸泡在两个桥下面的水里，空气中散发着死人的气味。马遇到了死人挡路，不肯前进，还得勒住马，躲开这些死尸。而死尸又是成片的，完全是一个

刚结束的战场景象。至今想来，既有胜利的气氛，又有战场的惨状。我们没有打扫战场的任务，目标是向武昌迅速前进。等到过了贺胜桥，才平静下来，策马向武昌前进。我是学生出身，没有当过军人，没有参加过战斗，这是我一生军事生活的开始。

接近武昌以后，武昌还有吴佩孚的陈嘉谟、刘玉春固守着，没有打下来。我们就暂时设营在从前南湖的陆军小学的旧址。这时也无所谓政治工作，邓演达是个军人，是个指挥员，怀着很浓厚的兴趣去参加制订打武昌的军事计划或者去指挥打武昌的战斗。对武昌的强攻有过两次，9月3日晚上是第一次，邓演达、郭沫若都去了。但准备不足，敌情不明，所以没有能够攻进城去，自己反而有伤亡。第二次是9月5日晚上，准备组织敢死队架云梯爬城，由李宗仁指挥。但是城墙太高，梯子绑得太短，连城垛都靠不上。绑梯子的事，总政治部的人也参加了。但是这次的攻击仍然没有奏效。

这时，对武昌改为围而不打的方针。其他的部队都调到江西前线去了，只留下第四军围武昌。想用挖地道爆破的方法破城，铁甲车上加沙包作为掩护，逼近城墙，请煤矿工人来帮忙挖地道。但这样毫无掩蔽的作业，自然为城里的敌人所侦悉。9月16日，敌人强力突击，这个计划也就继续不下去了。但敌人被围困已经有20多天，既没有什么援军的希望，城内粮食又开始发生恐慌，弹药消耗得也差不多了，士气也更加低落了。所以到了10月10日反而轻而易举地就攻占了武昌。邓演达从中和门随攻击部队进

入武昌。至此武汉三镇就全部克复了。

在攻打武昌的时候，邓演达、郭沫若、苏联顾问铁罗尼、俄文翻译纪德甫和我，都迫近武昌城下去观察敌情。大概我们隐蔽得不好，被陈嘉谟的士兵在城墙上发现，就开枪向我们射击，纪德甫中弹受重伤，不幸牺牲了。洪山东麓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北伐功臣阵亡官兵烈士墓，当时，纪德甫只草草掩埋在洪山脚下。第二年也就是1928年3月，我在《流沙》上写过一首诗，叫《春之奠》，就是献给这位同志的：

前年的春天，
我们在炎炎的南国相见；
今年的春天，
我高举起一杯苦酒相奠。
武昌城外怕已生磷的枯骨之魂哟！
生机之能灭了，
一般这便是“死”。
但他们说你永生，
你负有“烈士”之名。

我亲眼看见是
你的血并未染出半朵自由的鲜花，
从棺材中把一点一滴的尽浸入泥沙。
至今有谁记着？
土家中怕只有子弹与枯骨相亲地长眠，
唱不出“不朽”二字，白杨树上的啼鹃。

模糊的影像里，
高不过五尺，圆径不过一丈的馒头一个，
不是丰碑，是细长的木牌上题着“阵亡战士之墓”。

前年的春天，
我们在炎炎的南国相见；
今年的春天，
我高举起一杯苦酒相奠。

武昌城外怕已生磷的枯骨之魂哟！

北伐，我只亲身参加了攻打武昌的战役。打湖南、打江西以及打湖北等其他的地方，我都没有亲身参加。这次军事行动，一个在中国军事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现象是，军队比较守纪律，人民群众支持这支军队。当然，这支军队还不是新军队，还有很多旧军队的成份和习气，但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支军队和旧军队不一样。军队在行动中，不需要怎么强迫，就有本地的群众组织，如工会、农会等派出向导；有什么弹药、粮食要运输的，也有群众组织帮忙。军队不需要去讨人怨恨地拉夫。在战争中，也有群众组织起来，自愿去打探敌情，而且报告的消息准确。对伤员，群众也会组织起来，把他们运送到后方救护站。这种情况，就是那些旧军队出身的军官也颇为感动。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党组织，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同时部队里面的政治工作人员，发挥了军队和群众之间的桥梁作用，并直接对军队做了有效的政治工作。这个政治工作是

从苏联学来的。部队调整了官兵关系，吃空额的现象和打骂士兵的现象都大为减少了。军队压迫人民的现象也减少了。群众拥护这支军队。这种情况在以前的中国军事史上是没有过的。

在部队9月6日攻克汉阳、汉口之后，总政治部就搬到了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地址在今汉口路中山大道），开始办公。只有邓演达等少数人，留在南湖参加军事指挥。邓演达搞了个专用渡轮，从武昌经过鹦鹉洲到汉阳，又从汉阳过浮桥到汉口。武昌克复以后，因为湖北省政府设在武昌，他仍然用这个渡轮来往于武昌、汉口之间。我们有事去武昌也乘他这个渡轮。

邓演达在总政治部也有一个主任办公室，因为他要照顾省政府和武汉行营的工作，他到总政治部的时间很少。说是主任办公室，还不如说是我的宿舍。我在里面架了一个行军床，办公、吃饭、睡觉，一天24小时都在那里。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还走到江汉路一个咖啡店，去喝一杯咖啡，吃几片三明治，作为夜宵。

那个时候我管文电处理，汉口电报局在总政治部里面设了一个分机，可以直接接收发电，处理起来比较快。至于说文件处理，开始我完全是外行，有好多当时实行的文件规格，如象什么叫“等由准此”，什么叫“等因奉此”，都从老文书股长那里请教，他懂的东西很多。幸好在文件处理上他已做了个初步的加工，如来文的摘由，发件是由八个字拟定，即所谓“由头”。同时，文件本身带有很浓的官僚主义性质，或准或驳都有往例可寻。我只是对来文核

定处理意见，或对发文稿加以改定。最后的手续是“画行”。照理这些画行都应是主管长官的事，譬如说总政治部的发文，画行的应是邓演达。其实这些例行公事，主管长官也管不了，因为太多。事情当然就落到了秘书的身上，画行既然不是邓演达，就由我来写个“行”字，但一定要在行字下，加“李代”两个小字。更重要的是，要盖一个我的图章。但是也有极少数的极重要文件，抽出来由主管长官自己画行。“李代”的意思，就是李某人代替邓某人，等于还是主管长官自己签署的，代画行的人对于那个文件既没有法律地位，也没有法律责任。至于画行的“行”字，现在看来是很可惊异的，每个人的画法都不一样，五花八门。有的人写楷书，有的人写行书，有的人写草书，有的人写狂草。字的大小也不一样，有的人写得很小，有的人写得很大，大到跟文件稿的字不相称的程度。还有的人写得很长，长到占满直行文件的上下格。画行都是用毛笔，比现在人用圆珠笔、用铅笔画圈圈，麻烦多了。不过，当时也有当时的好处，只要我画了行，签了字就算数，不需要找第二个人去画圈圈，除非这件事是两个机关、三个机关出面，才会出现两个圈圈或三个圈圈。

公文的处理，我是要求快速，稿案无留牍。当时的文牍主义很厉害，芝麻大一点事件都要上行下答变成文件，数量就很多。幸好分类、摘由、拟稿、誊抄、监印、入档等等都在文书股，我只画行。但那也不得了，每天少则一百多件，多到三百多件。在画行下笔以前，你总得大体上看看，这就变成了很繁重的劳动。每天有时还要开会，有时

还要商量点什么事情，所以为了画行，我就搞到半夜去了。当时年轻，还有那么一股劲，也不觉得苦。搞这个东西，我顶怕弄得不好，文书股来挑眼，因此费尽心力，适应文牍主义的要求。最后，那些老文书都不得不佩服我对有些问题比较复杂的文件处理得比较精明，特别是稿案无留牍，更加使他们惊异。邓演达因为事情多，又是行营又是省政府，也信任我代他处理这些文件。从进入汉口到离开汉口赴南昌这几个月，在文件画行上没有出过什么大的事故。以后我在工作中，处理过不少机关文件，也起草过不少机关文件，这段文牍主义的学习和经历，给我打下了一个基础。

总政治部有两辆汽车，一辆归邓演达专用，一辆归科长级公用，但实际上是郭沫若用得最多。那个汽车的派头，完全是从北洋军阀那儿学来的。当时汽车门下面，有一条长的踏板，打开门后先踏上这个踏板才能进去。车门关了以后，这个踏板还依然露在外面。北洋军阀利用这个车子的踏板，再在车前挡风玻璃左右的钢柱上，焊上两个把手。车主人的警卫人员，在左边的就站在左边踏板上，右手拉住把手，左手提驳壳枪；反之，在右边的，一样地站在这个踏板上，左手拉住把手，右手提驳壳枪。车子在汉口市上开起来好威风。有时我和邓演达或郭沫若坐这个车子时，也分享了这个威风。现在闭起眼睛一想实在好笑。这种军阀架势已成过去了，但军阀利用汽车摆威风，让两个警卫员站在车门的左右，也可算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了。

湖北和江西的战事结束以后，10月20日在武汉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阵亡烈士追悼会。这是由总政治部主持，与

武汉各团体联合举行的。这个会是由邓演达代表总司令部讲的话，蒋介石在南昌没有来。但郭沫若代蒋介石写了一幅挽联，一共 16 个字：“嗟尔忠魂，恢弘党国；存吾浩气，涤荡河山。”我想这是郭沫若代笔当中最好的作品了。这个口气当时只能是一个总司令的口气，蒋介石是不是当之无愧，那就不去讨论它了，只有凭郭沫若的天才才能写出来。

总政治部的构成从党派来讲，基本上就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从籍贯来讲，主要的干部四川人最多，原宣传科长、后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秘书长朱代杰，秘书李民治，社会科长李合林，都是四川人，其中郭沫若那时还不是党员。此外，党员很多，他们不是四川人，如章伯钧、胡公冕；还有一些党员的股级干部，如袁文彬。其他则以广东籍干部为多，主要的有郭冠杰，属于邓演达系统的。当然也还有江苏人如季方，福建人如江董琴。总政治部内部逐渐地就有了四川和广东籍贯上的矛盾，也表现为郭沫若和邓演达的矛盾，实际上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矛盾。这个矛盾，虽然有这么一个错综复杂的表现形式，但实际很简单，不是政治上有什么分歧，政策上有什么分歧，而是集中在两个人事上：（一）在提级和定级问题上，即军阶问题，邓演达对于四川人，对于共产党员总是想把军阶定得低一点。如把中校定为少校，把上校定为中校之类。我们就极力反对，甚至于原来定为少校就可以的，我们也力争定为中校。（二）许多重要工作，他首先照顾的都是广东人，都是国民党员。譬如说宣传大队长，他的提名是季方，我们的提名是胡公冕，争了好久定不下来。胡公冕并不是四

川人，但他是共产党员。这种情况，引起邓演达的极大不满，认为这几个四川人太跋扈，认为四川人在这里有意培植四川势力。其实情况不是这样，我们不想培植什么势力。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工作能力，拚命工作，不偷懒，邓演达本人也并不是不知道。

(五)

武昌克复以后，武汉统一，也就是湖北统一。加上蒋介石亲自率队打江西，并把他的总司令部设在南昌。1926年冬季到1927年夏秋季，邓演达的政治、军事地位和权力都有提高或扩大，除了任总政治部主任以外，还兼任蒋介石的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这样，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就一个在南昌，一个在武汉，给工作带来很多不便。折中的解决办法是，武汉总政治部不动，另外组织一个小总政治部，到南昌同总司令部在一起。因此，就任命郭沫若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去南昌，随同总司令部主持政治部的工作。编制比武汉总政治部小，级别低一级，譬如武汉总政治部有科股两级，而南昌总政治部只有股没有科。编制大概是组织股长陈必贶，宣传股长潘汉年，社会股长袁文彬，党务股长辛焕文，我当秘书长。机关就设在南昌百花洲的江西总商会。政治工作主管的范围就是江西，即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部，鲁涤平代军长，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三军朱培德部，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克靖，朱培德后来兼江西省政府主席；第六军程潜部，党

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伯渠）。

这个时期江西基本没有军事行动，部队只是处于警备状态。党中央为了统一南昌部队党的工作，成立了一个南昌军委，李富春为书记，成员有林伯渠、朱克靖和我。但有时朱、林不在南昌，开会时就由是党员的政治部秘书出席。后来朱德任第三军教导团团长和南昌公安局局长时，他也参加了这个军委。因为没有军事行动，部队就处于一个半平时状态。所以在军委来讲，也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要讨论，开会的时间不多，每个月大概一次，都在晚上。成立南昌军委这件事对郭沫若也不保密。我去开会以前，总是征求他有什么意见；回来以后，除必须保密的以外，我也向他简单地报告讨论内容。譬如蒋介石突然开条子，要给郭沫若每个月发200元津贴，就是他提出来，征求党的意见，要不要接受。军委讨论过后，认为他可以接受，就由我转达了军委讨论的意见。

我们住在南昌，必须和中国共产党南昌市委取得密切联系。陈奇涵是市委书记，他原是黄埔第一期学生，因为他是江西人，就没有参加军队工作，到地方上来了。这个时期我同他的工作关系非常好，一直到南昌起义。在九江时，我还把我们带不走的一箱新驳壳枪、两箱子弹交给他。后来他又做军事工作，解放后一个时期，曾在人民解放军里任军事检察长。

在南昌我还要提到另一个人，蒋先云。这时他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立夫也任机要秘书，一武一文。他是湖南人，考入黄埔第一期是第一名，黄埔第一期毕业时也是

第一名。蒋介石非常器重他。“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强迫黄埔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双重党籍的工作人员和学生，宣布只留在一个党，要么留在国民党脱离共产党，要么留在共产党脱离国民党。蒋先云是宣布留在共产党脱离国民党的第一个。虽然如此，蒋介石对他还是始终抓住不放，留在身边。相反，对别的共产党员，蒋介石却任其一走了之。所以北伐时就任命他当总司令部的机要秘书，并不在乎他保留共产党的党籍。在南昌的时候，我经常代表政治部参加总司令部所属各单位的例行会议。这个例行会议，一般由参谋长白崇禧主持，蒋先云也经常出席，所以我逐渐同他熟悉起来。他有时也到政治部来闲谈。时间久了，同志们当中有一种看法，认为他情绪比较低沉，有的同志甚至于怀疑他被蒋介石收买了。我则认为他心理上的烦恼在于他还保有共产党人的立场，而对于蒋介石也不无那么一点知遇的感情。这种心理烦恼，在他一时也很难解决，我们也无法明白地加以劝说，因为这些都是不露痕迹的。直到蒋介石出师东征，他才断然弃蒋回到武汉，坚决要求参加打奉军的河南战役。他出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团团长兼党代表。1927年5月在临颖前线，勇敢杀敌，三次负伤不下火线，最后牺牲在战场上。这消息传到武汉以后，我总觉得他是下了决心牺牲在战场上，以表示他对于党的忠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那些怀疑他的人，最后相信蒋先云没有被蒋介石收买。无端的猜疑是很可怕的。

住南昌的三个军的党代表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还有新认识的总司令部的秘书处长李仲公，加上郭沫若，还

有我，每个星期总有那么一两次，上南昌有名的菜馆“小有天”相聚晚餐。由他们五个人轮流出钱请客，我白吃。在晚餐上，也谈全国新闻或南昌内幕。

那时年轻，因为闹革命，没有游山玩水的兴趣，虽然知道青云谱近在咫尺，也没去过。有一天，鲁涤平请我们吃饭，骑马到了他的军部，没想到他的军部就设在青云谱，那是一处很清静、很幽雅的道观。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八大山人，有兴趣的倒是鲁涤平的厨房端出来的是很有味道的湖南菜。确实了解青云谱，了解八大山人，那是20年以后的事情。

李仲公，贵州人。他的兄弟李侠公是共产党员，还在苏联留学。他好象在北方住得很久，爱唱京戏。在小有天聚餐时，李仲公有时情绪很好，还清唱几句谭鑫培的戏。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一些总司令部的内部动向。不知为什么，有谁在蒋介石那里告了朱代杰（总政治部秘书长）的状，蒋介石就发电报到武汉逮捕他。李仲公很快地向我们透漏了这个消息，我们又很快地通知了武汉，所以朱代杰能够迅速离职，后来党就送他到苏联留学去了。李仲公大概在蒋介石那里不大得意。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他一直任国务院参事。

蒋介石两三次向郭沫若提出，要找一个文笔好的秀才替他起草文稿。那时的两位秘书一个蒋先云，一个陈立夫，对于起草文稿，从中文底子上说都不行。他不借重李仲公，原因不知道，李的文章我们当时没有看过，很难说他的笔下怎么样。政治部有一个人写东西比较快，楷书小字写得

也比较好，但古汉语基础比较差，也无法推荐。在南昌当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一下就想到了《上海商报》的主笔陈布雷，近两三年以“畏垒”署名的商报的社论，文笔清新锋利，看来古汉语的水平也不低。于是郭沫若就把陈布雷这个名字向蒋介石推荐了。其实我们大家都不认识他。果然蒋介石约见了她，他就到南昌来了。陈布雷后来在蒋介石那里一直得到重用，居然高就为蒋介石的幕僚长，这是我们当初没有意料到的。蒋介石是不是告诉了陈布雷，他是郭沫若推荐的，陈布雷是不是了解到原是郭沫若向蒋推荐的，都很难说。郭沫若自己当然不好向人讲陈布雷到南昌是他向蒋提名的。但是1941年在重庆，郭沫若五十寿辰的时候，陈布雷却写了一封感情洋溢的贺寿信和一首贺寿诗。

这里还应当提到蒋介石的夫人陈洁如。总司令部在南昌安置下来以后，她大概也从广东到南昌来了。南昌当时是一个很落后的城市，而且在军事状态下，大概她住在总司令部也很无聊；蒋介石就介绍她给郭沫若，要郭沫若请她到政治部去玩。郭沫若当然只好照办，请到政治部吃一顿丰盛的午饭，让政治部的摄影员替她照了各种姿势的照片。在整个南昌时期，这种情形大概有三次。这应该算是蒋郭关系的一个侧面。

1927年3月，赣州发生一件新一军党代表倪弼伙同赣县县长，枪杀赣州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的事件。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南昌的国民党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联合起来制造的一个反共行动，后台是蒋介石。事先两方面已经有很

多明显的纠纷，因为涉及到部队，南昌政治部就不得不去干预。曾经派胡公冕去进行调查，并准备处理。但处理不下去，因为中间横梗一个蒋介石。为了釜底抽薪，郭沫若曾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要求把倪弼调走，这本是一个妥协的办法。但蒋介石一直拖延着，让倪弼把陈赞贤打死才满意。可惜我们把它当成在江西发生的个别事件，没有把它和北伐的军事进程和政治进程统一起来分析，所以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是整个局势的变化，政治部起不了什么作用，郭沫若也无能为力。

倪弼这个人后来在国民党一直反共，非常反动。全国解放后还在镇江本地活动，一直到1958年才被江西发现，送到赣州去法办。虽然时间迟了30年，郭沫若和我后来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快意。

看起来北伐是胜利了，但原来没有解决的和新引起的一系列的矛盾，都正在影响大局。其中主要的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问题，国民党内部左右派之间的问题，正在发展的群众运动和共产党、国民党的问题。此外也还有：帝国主义者和东南的买办阶级与国民党的问题，冯玉祥和共产党与蒋介石的问题，还有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关系问题等等。最后形成决定后来政治形势发展的两个局面。首先是共产党的联汪反蒋，其次是蒋介石的联合一切反动派（包括汪精卫）反共。当时的政治术语就是“宁汉分裂”和“宁汉合流”。从1927年4月12日上海事变到八一南昌起义，这几个月的事变，都可以归结为这个形势促成的。当

然，在“四·一二”以前，蒋介石还有一个叛变革命的过程。

1927年初，庐山还很冷，蒋介石在牯岭召集会议，我和郭沫若也去了，邓演达也早从汉口赶来了。这是我第一次上庐山。我们在旅馆里大烧壁炉，外面很冷，也不敢出去。会议大概是讨论要把国民政府定在南昌的问题。我们不知道邓演达和蒋介石争吵到什么程度。邓演达要我们在牯岭多住一两天，他本人却悄悄地下山，回武汉去了。我们等他走了以后，才回南昌的。大概邓演达怕蒋介石对他不客气，我们多留一两天会对他起一个掩护作用。

[附件]

总司令部政治部战时政治工作会议

第一日记录

日期：6月21日

时间：上午11时至下午5时

出席者：邓演达 包惠僧 郭沫若 梁绍文 鲍慧僧
恽代英 余程万 丁默村 伍翔 朱克靖
朱和中 陈公博 黄仲翔 熊雄 陈雁声
林祖涵 关学参 铁罗尼 罗清扬 李富春
陈璠 贾伯涛 鄧悌 甘乃光 李朗如
褚民谊 熊锐 王志远 顾孟余 邓颖超
邓福林

主席：邓演达

秘书：李富春

主席恭读 总理遗嘱——全体肃立

主席宣布开会宗旨

略谓：当此北伐时期，关于政治工作方面，非常重要。此次召集战时政治工作会议之要点，在决定战时政治工作之方针，及准备一切北伐应做之事项。今日以前，本部是创造时期，经陈主任及各同志之努力，已使民众同军队，对于政治工作有相当之认识。我们应感谢陈同志打开这条路的劳绩，现在政治训练部既改为总司令部政治部，我们当更加努力工作，以求前进。此次会议，因各项议案重要及过多关系，时期上必须延长，始能完成。

(甲) 报告事项

(一) 主席报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之组织及以后全部政治工作之系统》

略谓：总司令部现在尚未成立，政治部之组织，系根据总司令部之系统表及组织大纲草案，除总务、宣传、党务三科外，尚有其他独立委员会。条例尚未拟就。在组织上与原政治训练部稍有不同，其管辖范围全依总司令部为准。

(二) 各军及军事机关主任人员报告各部政治工作概况：

照规定应由第一军起，依次报告，因兵工厂党代表朱和中有要事须先行，乃临时与第一军对调，提前报告，其次序如下。

兵工厂 朱和中……缺

1. 第二军 李富春

2. 第三军 朱克靖
3. 第四军 罗扬清
4. 第五军 李朗如
5. 第六军 林祖涵
6. 第二十师 黄仲翔
7. 海军局 余程万
8. 制弹厂 王忠远
9. 公安局 陈 璠
10.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熊 雄
11. 入伍生部 贾伯涛
 第一军 关学参……缺
12. 兵工厂 伍 翔
13. 航空局 梁绍文
 第一师 鄯 悌……缺

以上各同志依次按照节目，简略报告。详情另有本人书面报告附后。

(乙) 讨论事项

(一) 宣传队之组织案：

议决：将原拟条例名称，改为“国民革命军战时宣传队组织条例”，举李富春为主席委员，林祖涵、恽代英为委员。将上项条例审查，于下次会议提出宣读讨论，并决定原则。宣传队以师为单位，直属于师或相当于师之政治部。

(二) 宣传员之训练及选考住宿案：

议决：宣传员之最低程度：1. 高小及中学毕业，能说能写，有政治常识，思想清楚，能耐劳吃苦者；2. 农民、工

人，明了政治要求，且能简单释党义者；3. 能到敌人阵地做工作者。宣传员人数第一期 600 人至 800 人，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高级政治训练班，中央党部政治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及江西革命同志会考取之。地点广东大学。

(三) 宣传品之印刷案：

说明：印刷问题，常感困难，因各印刷机关，为少数商人所把持操纵，故意抬价为难。在曩昔平静时期，尚无大碍，当今战事发生，政治中心，移至前方，宣传品需用量大。若一时机器不足，工人难招，材料缺乏，必生不良影响。应妥为筹划，将各印刷所集中，使其工作敏捷，出品增加，以利宣传。

议决：组织一印刷委员会，举李朗如、关乾甫、余程万为委员，负责将广州市各印刷所机器数量出品多少及工人价格详加调查，于 23 日提出报告。

第二日纪录

日期：6 月 22 日

时间：上午 9 时至下午 5 时

出席者：邓演达 鲍慧僧 缪 斌 杨 麟 熊 锐
李朗如 王志远 朱和中 贾伯涛 鄧 悌
陈 潘 周恩来 伍 翔 邓福林 彭 熙
陈公博 褚民谊 关学参 李富春 朱克靖
方德华 郭沫若 熊 雄 李合林 余程万
罗扬清 林祖涵 黄仲翔 恽代英 欧阳继修
李笠农

主 席：邓演达

秘 书：李富春

主席恭读 总理遗嘱——全体肃立

(甲) 报告事项

(一) 各军及各军事机关主任报告各部政治工作概况

军需部 邓福林

第二师 杨 麟

第十四师 彭 熙

军医监 褚民谊 (陈寿函代)

(书面报告附后)

(二) 林祖涵报告审查国民革命军宣传队组织条例结果。

(三) 余程万调查印刷所结果。

(乙) 讨论事项

(一) 陈公博发表各军及各军事机关政治部提案意见：

1. 各军政治部经费应如何规定案：略谓，各军政治工作经费不同，应统一规定，由总政治部呈请总司令部发给。

2. 规定战时政治工作人员纪律案：略谓，可分二方面讨论：A、除军纪外，对于党纪应特注意；B、政治工作人员，于战时可以管理行政，平时不能管理。

3. 集中训练各军政治工作人员案：略谓，本案应分两层讨论。关于前方，由高级政治训练班，中央党部政治讲习班，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农民运动讲习所中考选人员，训练出发前方；关于后方，集中宣传人员，根据宣传大纲训练。

4. 党代表与政治部权责划分案：略谓，现已决定中央军人部管辖党代表，总政治部指挥各军政治部，党代表有时可以指挥政治部及军事，党代表有意见可以提交政治部讨论。

5. 远驻各军应恢复壁报案：略谓，壁报收效甚大，应即恢复，惟办理人员须加以训练。

6. 政治工作人员，应具领短枪案：略记，政治工作人员每不能与军队同行，常有生命危险，应具领短枪，以策安全，惟兵工厂能否供给，尚属问题，可呈请军事委员办理。

(二) 扩大印刷委员会案：

说明：印刷事繁，原有印刷委员会不能应付，须扩大以利进行。

议决：除李朗如、关乾育、余程万外，再举罗扬清、伍翔、黄汝春、陈藩、贾伯涛、李民治为委员，仍以李朗如为主席委员，办理印刷事项。

(三) 设立北伐宣传队训练班案：

议决：举周恩来为主席委员，缪斌、郭沫若、恽代英、熊锐为委员。草拟计划，限二日草成。

(四) 各军事机关及军师与独立部队政治部之编制暨系统之确定案：

议决：先成立二编制委员会，第一编制委员会，负责审查军队政治部之编制，举朱克靖为主席委员，鄞悌、余洒度、李富春、罗扬清、李朗如、林祖涵为委员；第二编制委员会，负责审查军事机关政治之编制，举周恩来为主

席委员，熊雄、余程万、朱和中、王志远为委员。

(五) 战时出发准备案：

议决：A、携带装具

校官只可携带行李 40 斤，尉官 20 斤。应带用品为图囊、水壶、干粮袋、指北针、日记本、手电灯、时表、墨水笔、小刀、针线包、雨衣、雨帽、米突尺、绑腿、草鞋等。

B、旗帜符号

旗帜用国旗缀白字，符号用臂章。

C、通信联络方法

远距离通信用电报，分明码密码二种，密码由总政治部颁发，党代表及各军师政治部主任存用之；普通通信，可利用军队交通机关，或利用士民组织通信社。

D、炊具设备

以连为单位，计划应用物品数量，举杨麟负责计划。

E、宣传品之运输

暂定每军募雇运输卒 20 人，每师 10 人。

F、报告及报告表格

1. 工作报告表：宣传员特派员下级工作人员对上级工作人员报告及特别事项报告适用之。

2. 调查表：民众团体军队与党部调查适用之。

3. 公文临时报告：委任人员请求经费及宣传品适用之。

4. 统计表：统计各种事项适用之。

上事组织委员会并聘请统计专家而有政治观念与实际

经验者，共同计划办理，即备函请陈启修为委员会主席，举李合林、熊雄、关学参为委员，以五日内完成之。

G、印刷机之选购

备函询问顾孟余并举李朗如担任调查油印机何种最佳，外用政治部名义，登报招请油印工匠及修理印刷机匠。

(六) 考试技术人材与宣传员案：

议决：组织考试委员会，举恽代英为主席委员，其余委员由主席聘请。

(七) 组织印刷价格审查委员会案：

议决：举李朗如为主席委员，附印刷委员会，外加李超为委员。

(八) 各军及各军事机关政治部经费应如何规定案：

议决：组织预算委员会，以朱代杰为主席委员，伍翔、鲍慧僧、邓福林、刘陶为委员，由各军及军事机关政治部将经济概况，作一报告交委员会参考，限月底办妥。

第三日记录

日期：6月23日，

时间：上午12时至下午5时

出席者：邓滨达 鄯 悌 朱克靖 邓福林 林祖涵
缪 斌 余洒度 杨 麟 李朗如 朱和中
曾扩情 熊 锐 铁罗尼 关学参 熊 雄
贾伯涛 伍 翔 鲍慧僧 王志远 恽代英
陈 璠 黄仲翔 李富春 罗扬清 褚民谊
郭沫若 方德华 梁绍文 余程万 彭 熙
陈公博 周恩来

主 席：邓演达

秘 书：李富春

主席宣读 总理遗嘱 ——全体肃立

(甲) 演说

正午 12 时，由主席特请蒋总司令到会演说，题为“战时政治工作人员应注意之点”。词如下：

今天是沙基惨案的纪念日，各界在东校场集合开会，等一会还要到东校场赴会去，在仓忙的时候，将我几点意见要各位政治工作人员注意的特地说出来。第一点是凡一切宣传的言语行动，要本着建国大纲的原则做去，建国大纲上已经很明白的指示我们，这是完全可为政治工作人员很好的理论基础，无论何时都不要忘了建国大纲，或是走出建国大纲范围以外，照建国大纲做去，是永不会有错误的。第二点我们在军政期间，什么事都要照军政期间的办法去做；尤其是政治工作人员应注意的地方，无论前方后方，通通集中的原则来办理，各团体的言论、宣传品，都不客气的要受政治部来检查监督，比方出版的宣传品，军政期间，一定要依照预定方针来做；要依党许可的总政治部及军政时期的一切政策来做；一切的团体组织、言论，无论是工会、农会、青年团体、学生会、教育会等社团，政治工作的人员，都要知道他、指导他，并要纠正他，不准他们自由，照着军政期间的计划来做。所以兄弟有点意见要向中央请求许可的凡是我革命军事区域之内一切的组织，都要受总司令部政治部之监察，比方阶级斗争及工农运动的罢工事件，在战时是破坏敌人的力量和方法，对付敌人是可

以的，若是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如前时兵工厂一样，不问什么要加工钱就罢工，甚至可以随便打人这是不可的。在军事期间，所有工、农团体，应使集中，不能随便自由的罢工，所以这点要请各位在宣传方面注意。还有今天重要的是要起草向中央党部请求，许给特权，指导改良一切团体，在军事期间不能不照军事计划来进行。其余的问题过几天再有具体的计划，今天要讲的是这几点，各位有详细意见，可以发表指教。

(乙) 报告事项

(一) 李富春报告宣传队组织条例。

(二) 褚民谊报告广东大学党务概况。

(三) 李朗如报告印刷委员会拟定各项办法。

(四) 周恩来报告北伐宣传队训练班计划。

(五) 恽代英报告考试委员会拟定考试办法。

(六) 朱克靖报告第一编制委员会审查军师政治部团党代表办公厅及团营连指导员编制结果。

(丙) 讨论事项

(一) 组织印刷委员会案：

议决：举李朗如为主席委员，江董琴、朱代杰、贾伯涛、王志远、关乾甫为委员。任务为：(1) 调查印刷机关；(2) 办理印刷事项；(3) 监察印刷办事人，23日起开始办公，并规定办公时间。

(二) 军师政治部团党代表办公厅及团营连指导员编制案：

议决：照第一编制委员会审查结果，稍加修正付印。

(三) 战时政治工作人员旗帜符号案：

议决：照余洒度绘就图式稍加修正付印。

第四日记录

日期：6月24日

时间：上午9时至下午5时

出席者：邓演达 朱和中 李富春 伍翔 梁绍文
鲍慧僧 邓福林 缪斌 朱克靖 熊锐
王志远 余程万 彭熙 鄯悌 杨麟
李朗如 林祖涵 周恩来 陈璠 熊雄
褚民谊 黄仲翔 罗扬清 陈公博

主席：邓演达

秘书：李富春

主席宣读 总理遗嘱——全体肃立

(甲) 报告事项

(一) 朱代杰报告各军政治部宣传费预算原则。

(二) 周恩来报告第二编制委员会审查军事机关政治部编制结果。

(乙) 讨论事项

(一) 规定政治工作人员纪律案：

说明：自来政治工作人员，都不如为军队长官之守纪律，常自由行动，致为官长所轻视，失却政治工作之效力。今后政治工作人员之纪律，应严厉规定，养成模范党员，以为军队长官士兵之表率。

议决：以缪斌为主席委员，梁绍文、伍翔为委员，负责草拟军政治工作人员特别惩戒条例。限即日草成，呈请

中央审核，转总司令颁行。

(二) 集中训练各军政治工作人员案：

说明：现时政治工作人员能力学识尚多薄弱，应设法集中，加以训练，使成健全人材。

议决：现时政治工作人员，设法加以严密考查，以孙炳文为主席委员，各政治部秘书为委员，负责起草政治工作人员任免条例，限3日完成。

(三) 远驻各地军师应恢复壁报案：

议决：以师为单位，刊发壁报画报，并遵总政治部所定宣传大纲及一定对象，印发传单，以酆悌为主席委员，杨麟为委员，负责起草出版物条例，限2日草成，交总务处。

(四) 规定各军师政治部宣传费办公费及各级党代表薪俸办公费案：

议决：平时宣传费每军每月1000元，每师200元，独立师500元；战时每军每月500元，每师600元，独立师800元。政治部办公费每军每月1000元，独立师600元，师300元，团50元，连10元。党代表薪俸照原额将官8折，校官8.5折，尉官9折，新出校学生再行酌减，党代表办公费团30元，连10元，军师党代表兼军师政治部主任，不另支薪。

(丙) 闭会。

会议至今，已历四日，各项重要问题，已得相当解决，主席即宣告闭会。惟以此次会议，意义之重大与成绩之完满，不能无所纪念，用特邀请前政治训练部主任陈公博到场，共摄一影志盛。摄影后，更由主席作一结论，将此次

会议之要点及今后之希望，分别详为讲述。词如下：

各位同志，今天是战时政治工作会议结束的日子。在这次会议，我们所得到的的是什么，第一是得到各种提案的解决，第二是得到各级政治部系统和编制的决定，同时得到战时的政治工作方案的结果，与战时政治工作有关的重要的结果。政治部的产生不过一年多，是由无变为有，由复杂变为简单。普遍的，一年多以来得诸位同志们的奋斗，才得到今天的结果。从工作的情形说：由藐视的态度变为迫切的需要，一天一天的奋斗，一天一天的进步而后有这种结果。但是计划和组织，还不统一，不能不说是离完备的程度尚远，由于革命的需要，不能不要求一个统一的计划和编制了。我们这次会议，已得到了编制的解决。同时又得到经费的解决。此外关于党代表的问题，又有相当之研究而得到规定草案。大会得到这种结果，可以供给中央党部的参考。综计这次大会得到战时政治工作，平时政治工作根本的解决，虽然是四天工夫，大会没有解决的事还多，但所有重大的事件也解决得不少，这次大会可以说是有历史的意义的！各位到会的同志，有不远千里而来的，牺牲了不少的时间，耽误了不少工作，才得到若干决议。在这次大会的所有决议案，都要实行的，我们一定要把决议实现才不辜负这次的会议。我们目前第一步的工作是如何能够改良工作的方法，把从前的困难地方打破；第二步的工作是如何实行这次的决议，把他实现出来。能够两步都做到了，然后党的效力才为党员认识，然后党的主义才能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目前神圣的工作是北伐。我们为

什么要北伐，同志们知道，北方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向我们革命势力进攻是有历史性的，但现在民众渐渐觉醒，革命潮流逐日高涨，他早已成崩溃之象。我们革命者是站在自己的观点来看的，不专在敌人情势如何，尤要在自己方面怎样的努力；第一要受党的指挥，而后民众才能得党的指导，同时涣散的党员，要如何使之团结，不肖的党员，要如何使之在政治之下不生异动，这是我们在北伐的过程中，应当特别努力的。各位同志，我们不久就要分散各自工作去了，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失掉了民众的感情和军官的联络，我们要洗去不好的习惯，我们要决心于党的指导之下，冲锋陷阵，我们的胜利要在敌人的刺刀上取。各位同志，在北伐工作过程中，当然有不少的困难问题，举例来说：如新投来的部队，带满了灰色，我们应该如何抚慰和安置他们，使他们逐日革命化！凡此之类，要大家准备，鼓着勇气冲破层层困难，为党工作，党的策略才得实施，即总理主义才可实现，我们不要忘却散漫的征候便是灭亡！所以我们做政治工作一方面觉得容易，一方面却感觉困难！因为政治工作比训练军队的训练工作大有不同。单就训练军队说，军队摆在面前，训练容易着手，政治工作一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更要应社会的要求，我们要得到很好的方法，才能够解决一切的困难。前日训练班的北伐宣传大纲，各位同志拿回去应该照这上面所说的去训练军队，自然同时也就适应了社会的要求。现在总司令不日要出发了，工作分为两方面，一是在前方的，一是在后方的。出发部队事实上不在后方实际工作了，在后方的各政治部却是担

任巩固后方的工作，发展后方的民众，实际上的工作，对党对国还是极为重大，所以对于后方工作的同志们，希望更加努力。现在大会是闭会了，再来开会讨论，恐怕要在武昌才能集会，中国革命势力没有推到武昌以前，是很少机会再象今天这样的集会的，所以今天特请各位合照一相，以为纪念。兄弟相信凡属同志能站在党的方面忠实做去，虽聚难离易，而对党的忠实态度，是永远不会有变更的。在第二会议未集会之前，还希望同志们更加努力以促国民革命之成功。以后的工作如何，还是盼望在会诸同志的指导。

(责任编辑 刘昌亮)

新疆工作的回顾

黄火青

1937年4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余部败退到新疆星星峡时，共有450余人，主要干部有李先念、李卓然、曾传六、李特、程世才、黄超、李天焕、郭天民、苏井观、宋侃夫、黄火青，还有汪小川、刘鹤孔、宋承志、刘寅、姚汝良、胡鉴、周纯麟、吕黎平、潘同、刘琦、黄义明等。开始，盛世才颇为重视，曾提供各种方便，如派飞机空投食品和弹药，接济物资；新疆省星星峡边防站站长王效典（辽宁北镇人）也热情接待。中央代表陈云和滕代远、冯铨等5位同志带了一名苏联医生很快从迪化^①乘车赶来，党中央的关心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陈云同志在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大家听了更是兴高采烈，使我们这些从祁连山荒原僻野中历尽艰辛长途跋涉出来的红军战士，精神上得到极大慰藉。随后大家都换上新军装，乘汽车进驻迪化纺织厂，后转移东门外营房，生活待遇较好，体力日渐恢复。

陈云同志自始至终本着团结教育方针，找同志谈话了

^① 即今乌鲁木齐。

解情况，沟通同志间的感情，大家轻松愉快，不谈过去的事，不提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事。但陈云同志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这件大事还是非常关心的，他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还是积极找机会向他和代远、冯铨同志反映张国焘反党的错误和罪行事实，诉说我个人心头长期积存的闷气。我还把从西康炉霍带出来的张国焘反党刊物《干部必读》中主要的若干册交给了陈云同志，他可能转交共产国际了。不想这触犯了李特、黄超等的忌讳。在一次陈云等同志参加的会上，他们向我提出指责，挑起争论。我当然起来反驳，表示我对张国焘的反党罪行历来是反对的，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不违反党章原则。陈云同志支持我说：火青同志有意见，可以保留，党章允许的。在当时情况下，不便把问题深入下去，但由此可以证明李特等对张国焘路线陷入有多么深。

盛世才是依靠苏联扶持起家的军阀、地方实力派，离开苏联难以生存。他为了统治新疆，伪装进步欺骗人民、讨好苏联：宣布六大政策，成立官办的反帝会，并准许学习马列主义。当时我党对盛世才进行统战工作是具备条件的。在初期，陈云同志和盛世才关系比较融洽，西路军几名高级干部和延安派来的以及从苏联回国经过新疆留下来的，一共100多名干部，都安排了适当工作，新兵营多数指战员分别送去学习技术兵种。盛世才又曾以他的名义捐赠给八路军20万件皮大衣和一批药品。当然他的友好行为背后有苏联的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由他出面罢了，不由他出面，有些事情也不好办。

另一方面，盛世才是野心勃勃的封建统治者。他胸襟狭窄，嫉贤妒能，汲汲于自身安危，认为处处都是敌人，不断制造冤案。他口口声声自称反帝亲苏，但对待真正的革命战士，如苏联派来的王寿臣（即俞秀松）、陈中、张益吾、陈培生（刘进中）等，及有亲苏倾向人士如陈立德、东北抗日将领冯梁、蒋毓芬，以及他的至交好友何语竹、杜重远等却不能容纳，连他的胞弟盛世麒（排行老五）也因亲苏而遭杀害。他在和我们交往中，处处伪装进步是企图混入我党内，为其政治野心涂上保护色。在遭到婉言拒绝后，他的本来面目就暴露了。但惮于影响他与苏联的关系，又不敢马上和我们翻脸闹僵，便采用疏远办法，给点脸色看。首先从新疆日报总编辑汪小川同志下手，寻找借口给汪小川以所谓处分使其不能继续工作。接着又把一批同志调离迪化，我去阿克苏任行政长（即专员），林基路调任库车县长，李志梁调任巴楚县长。盛世才和中共中央代表邓发同志（化名方林）也闹翻了。在我1940年调回延安以后，1941年春，盛世才索性把我们留在新疆的干部全部集中到迪化南岗软禁起来。后来苏联驻哈密的部队撤走，在希特勒围攻莫斯科的紧急时刻，盛世才就肆无忌惮地下了毒手，将我们的同志逮捕起来残酷杀害。

当初我们干部出去工作时，邓发同志曾向我们宣布过约法三章（即我党同志在新工作时，不发展组织，不搞群众运动和不搞群众斗争——编者注），其方针既不是党中央的指示，也不是在新疆工作的同志们讨论决定的，估计是中共中央代表和苏方与盛世才协商定出来的。我们在新疆

工作，好像是按苏联原定的方针行事，以示前后衔接。我们100多名干部在新疆工作中，虽然不以共产党员面目出现，却都以党员自律，克尽职守，公正廉明，生活朴素，不摆官架子，接近群众，特别注意利用机会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马列主义和我党抗日方针政策，扩大影响。毛泽民同志整顿新疆财政，改革币制，是卓有成绩的。林基路和其它同志在青年中做了大量工作，有很高的威信。反帝会大力开展革命理论学习，宣传抗日主张，充分利用新疆日报阵地教育各族人民，在组织上把官办的反帝会发展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仅在迪化一地短期内就将手工业者一千五六百人组织起来了。总之，各方面工作都是有成绩的，在广大范围内撒下了革命种子。不过，说真话，当时那种工作方式，我们很不习惯，束手束脚，特别是停止组织活动，感觉十分别扭。事后有人认为新疆工作主要是执行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招至失败。我觉得这样提法毫无根据，不符合事实。王明经过新疆时并未发表什么言论，仅去过一次新兵营，表示其关心而已。

在新疆工作的苏联同志对我们是关心的，我有亲身感受，这是事实。但当德苏关系紧张时刻，苏联驻新疆哈密的机械化旅撤走时，沿途将迪化羊毛山下的飞机装配厂和独山子的石油设备全部强制拆走，而对我们被软禁于迪化南岗的100多名中共党员干部，却置其生死于不顾，难道机器比人还重要吗，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关于新疆工作的经验教训，今天回头来看，当时有一件事是最大失策的。就是西路军余部退入新疆之初，正值

哈密反动头子尧乐博斯逃离新疆，那时我们如争取填补哈密专区那个空缺，按情况是可能的。能如此办理，则大有文章可作。一、干部力量集中，首先可以在该区范围内接过六大政策的旗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搞好经济文化建设，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在全省起到示范作用，树立党的威信。二、利用反帝会组织教育群众，创办抗大式学校，吸收新、甘、青广大各族青年，从群众性的武装逐步发展为正规军。1938年秋蒋介石曾命令新疆派两个团进驻甘肃二里子河（即居延海），当时如抓住这个机会在河西走廊建立据点，更是难得的机会。三、向甘肃、宁夏、青海开展经济贸易和广泛的统战等工作。如此经过三五年努力，以哈密为基地，加上苏联的额外支援，扩大三五千人的队伍是办得到的。这样，新疆的大门钥匙掌握在我们手中，谁要进出都得有我们的通行证。国民党要进来不那么容易，盛世才想跑出去也不让他跑。从地图上看，哈密和延安相距千里，中间只隔一片沙漠和黄河，配合行动很方便，对中国革命能作贡献。退一步说，盛世才要反苏反共，也不敢轻举妄动，可避免一次我党同志的牢狱之灾。当然，这个意见是事后诸葛亮，那时却没有想到这一着。

（责任编辑 汪 新）

忆张家口地区保卫战

肖克

(一)

1946年6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对此，我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击，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在北线战场，我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相互配合，先后在晋北战役和大同、集宁战役中给敌人以重大打击。张家口地区保卫战，就是继上述战役之后，我晋察冀军区部队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防御作战。

张家口，位于平绥线东段，是连接察绥、大同、晋东北地区的一个重镇，北依长城，南傍洋河、桑干河，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是察哈尔省会，伪蒙疆政府的所在地，日军驻蒙军司令部也设在这里。日本投降后，包括张家口、北平等城市在内的华北地区，本应由我们来接收，因为当时平西、平北、大青山、燕山南北广大地区都是我们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游击区域。但是蒋介石却阻止我们受降，到处抢夺胜利果实。为此，抗战胜利

后，敌我双方争夺张家口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不久，我们从日伪军手中夺取了张家口。那是1945年8月上旬，苏军根据苏美英三国雅尔塔协定出兵东北，当时我各大战略区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参加党的“七大”之后还都在延安。我们晋察冀军区的几位领导同志得知苏蒙联军一路将由蒙古直插张北，认为这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一个互相配合的好机会。8月10日，聂荣臻司令员与我及刘澜涛同志将这一情况电告在晋察冀主持工作的程子华、耿飏同志，要他们立即派出部队向张家口、张北方向进攻，配合苏蒙联军的行动。他们迅速作出部署，决定以冀察^①军区一部夺取张家口、张北等城。8月23日，我冀察军区部队解放了张家口。随后，晋察冀军区机关即移驻该城。

9月9日，我们从延安搭乘美军来晋察冀接飞行员的飞机回到张家口。这时，正是蒋介石玩弄“和平”阴谋的时候。他一面邀请毛泽东主席去重庆谈判，一面发出“剿共”密令。在美国的帮助下迅速地向华北、东北、华东、中原地区运送军队，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进行内战准备。我们到张家口的时候，国民党军队正在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在西面，傅作义以马占山为前锋，由绥远直趋张家口西南的柴沟堡（即今之怀安县），妄图从我手中“收复”张家口（随即被冀察部队击退）。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在抢占

^① 冀察军区、冀晋军区以及冀中军区等同为晋察冀军区所属的二级军区。

了太原之后，又以一部沿同蒲路北上，进占大同及其周围地区。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夺占了归绥（今呼和浩特）、集宁等城市及绥东、绥南、察西、察北广大地区后，继续沿平绥铁路东犯，马占山在柴沟堡被我击溃后，傅部仍在该地区，伺机而动。在东面，敌人也以优势兵力威胁着我们。当时敌人的战略意图是，以张家口为主要目标，从东西两面对我晋察冀解放区进行夹击，占领热河、察哈尔两省，从而打开由陆路进入东北的通道，并切断我华北、西北、东北战略区的联系。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争取在中国实现和平、民主的新局面，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挑衅，则“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当傅、马逼近我张家口时，为了反击敌人的进犯，9月11日，中央军委指示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集结主力，组织绥远战役，消灭傅作义进犯解放区部队，收复归绥，解放绥远，切实保障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战略根据地。9月19日，中共中央又指示我们：“晋察冀（除冀东外）和晋绥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向察哈尔张家口之进攻及将来胡宗南由北平向张家口之可能的进攻，坚决打击傅、马及其他进攻之顽军，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10月18日，我军发起绥远战役，给傅作义部队以迎头痛击。经过近两个月的作战，我军收复了丰镇、集宁等城和绥东绥南广大地区，粉碎了敌人进攻张家口，控制平绥路的企图。但傅作义部仍盘踞绥远西部，平绥线就形成了东西两段分治的局面。当时，战役开始后不几天，中共

中央获悉敌人将有 3 个军 8 个师集中北平，判断敌除以一部保护北平及平津线外，主力将向承德进攻，并威胁张家口。为巩固热河及平北，中央决定组织晋察冀（当时称冀察晋）第二野战军，以我兼任司令员，罗瑞卿兼任政治委员。10 月 24 日打下平地泉（今集宁）后，我和罗瑞卿即回张家口进行野战军的组织工作。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我们于 11 月 4 日完成此项工作，随后就前往承德，与程子华、李运昌同志组成冀热辽军区，指挥野战军和地方军打击进犯冀热辽地区的国民党军。直到全面内战爆发后，1946 年 8 月，罗瑞卿和我才先后回到张家口。

（二）

全面内战爆发后，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我晋察冀解放区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这时国民党军部署在我解放区周围的部队有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和第二战区的阎锡山部。共计 38 个师，约 33 万余人。敌人的企图是：首先在北面占热河的承德和冀东地区，切断关内关外的联系，尔后以孙连仲和傅作义部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张家口，以期控制平绥线和同蒲、平汉路北段及北宁路、锦承路，分割我晋察冀、晋绥、东北解放区，进而分别消灭我军。

对于蒋介石蓄意打内战的阴谋，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早就有着高度的警惕。记得在党的七大召开之前不久，在延安有一次我见到毛主席，在谈到北面的战略形势时，毛主

席就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会打内战。因此，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前夕，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正确地分析了形势，并及时地拟定了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在致各战略区的电报中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则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基于对形势的这一估计，中共中央在6月28日给聂荣臻、肖克、刘澜涛、罗瑞卿的电报中，提出北线的作战计划是：以晋察冀和晋绥野战军及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用半年或较多的时间，夺取三路（平汉路北段和正太、同蒲路），并相机夺取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使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各解放区连成一片。

根据中央赋予的任务和当面的敌情，晋察冀和晋绥军区确定采取下列三个作战步骤，实现中央的作战计划。第一步，以晋察冀军区的部分兵力配合晋绥军区部队组织晋北战役，夺取同蒲路北段诸城，割断太原、大同之敌的联系，主力则置于冀东地区，打击东线敌人。第二步，集中晋察冀、晋绥两区主力会攻大同，同时阻击敌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的东进，并以一部兵力在平绥路东段阻止北平之敌西进。第三步，视情况发展进行平汉战役，夺取平汉路北段，并相机攻占石家庄、保定等城，然后再夺取正太路和太原。

在这一战略意图下，我晋察冀军区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平绥线，保卫张家口。于是，我们决定在平绥线采

取西攻东防的部署。西攻，就是与晋绥军区协同，会攻大同；东防，就是在平绥路东段阻击北平之敌向张家口的进攻，张家口保卫战就是在东防方针下部署的。8月间，我从承德回到张家口时，由晋绥军区组织的晋北战役已经结束，我军攻克和收复了崞县、五台、原平、定襄等10座城垣，给阎锡山部以重大打击，控制了同蒲路忻县以北地段，使大同之敌陷于孤立，实现了夺取“三路四城”战略计划的第一个作战步骤，并已开始第二个作战步骤——由晋察冀、晋绥两军区夺取大同的作战正在紧张的进行中。攻击大同作战，由两区合组的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任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副政委罗瑞卿任政委。

大同是平绥、同蒲两铁路的交会点，因其地理环境的险要，历史上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国民党军在原来方正坚固的旧式城墙的基础上，加上适应现代战争具有完备防御体系的工程，是座坚城。当时敌人在大同及其外围的兵力有阎锡山的暂编第三十八师，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两个骑兵师及其他武装，约近2万人。而我军参战部队虽有30个团的兵力，但因两区部队刚刚集合起来不久，又缺乏攻城的经验，一开始的外围作战就进展缓慢，双方的争夺形成拉锯。到9月初，打了一个多月，才肃清了城郊各据点，逼近到大同城下。正当我军准备攻城的时候，蒋介石为了挽救大同的危局，促使傅作义增援大同，将原属第二战区阎锡山所辖的大同，划归第十二战区傅作义管辖。于是傅作义马上作出反应，集中第三十五和暂编第三军主力共3万余人，由归绥向东，以平绥路为轴线，分南、中、北三

路向集宁进犯，企图经集宁南援大同。

鉴于敌情的变化，我大同前线指挥部决心首先北上消灭傅作义部援兵，然后再攻取大同。9月5日，东犯的敌军攻占我卓资山后，我军除留一部继续围困、监视大同之敌外，主力迅速隐蔽集结在岱海滩附近和榆树湾地区机动，准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但由于我军在撤出卓资山后，未能严密监视敌人，致使傅作义部3个师秘密东进，于9月7日集结在集宁西北地区。我军主力又昼夜兼程，10日晚全部赶至集宁城下，四面包围了敌人。经一天两夜激战，傅作义部3个师已被我打得支离破碎，但由于我军没有组织连续进攻，使敌得以喘息。当9月12日我军再次向城下敌人进攻时，傅作义部主力一〇一师赶来增援。这时，我军本应先对集宁城下已被打乱之敌发起总攻，再打来援之敌，但我军却令主力转兵西进，先歼来援之敌。各部因临时变更部署，地形、道路又不熟悉，未能统一协调行动，错过了聚歼城下残敌的良好机会。又使敌军残部得以重新整顿，在空军的配合下攻入集宁城内，与我守城部队展开巷战。我军再战不利，遂于9月13日晚撤出集宁。集宁一战失利，大同不宜再攻。9月16日，我军即撤围大同。西攻，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三)

大同久攻不克，集宁作战失利，平绥东线战局陷于被动，处于东西两个方面作战。张家口的战略态势，更为严

峻。当我军主力集中大同、集宁方向作战时，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就指挥第十三、第九十三军会同第十一战区的第五十三军共7个师开始进攻热河。从8月21日起，敌三个军分别由天义（今宁城）、凌源、山海关、锦州向承德、青龙、建昌进攻。在我离开承德回到张家口不久，8月28日敌进占承德。接着，从9月4日开始，敌第十一战区孙连仲也集中主力14个师，连同非正规军10万余人，向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敌人采取向心突击的战术，西部从通县、怀柔、密云，南部从武清、唐山、滦县，东部从山海关、昌黎等地分别出动，形成合围态势，企图一举消灭我军。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下，至9月21日，我迁安、乐亭、丰润、遵化、平谷等15座县城先后被敌占领，冀东地区我一部分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转入游击战争。

敌人在占领集宁、承德和冀东各县城后，北平行辕决心以“彻底摧毁匪热、察、绥根据地，收复张垣（即张家口），打通平绥路，巩固华北”为目的，集中第十一、第十二战区主力对张家口实行东西夹击。在东线，以第十一战区第十六、第五十三军（均美械化）为主攻，分别由南口和怀柔地区沿平绥铁路向怀来进攻；第十三军（美械化）从承德出大阁（今丰宁）、沽源配合；第九十四军（美械化）位于北平，为战役预备队。在西线，以第十二战区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和第二战区暂编第三十八师集结大同、集宁一线，准备配合第十一战区会攻张家口。

在平绥东线战局被动的情况下，对于张家口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领导在大同撤围的当天召

开会议，就坚守还是放弃张家口进行了讨论。讨论中，大家从战争的全局出发，分析了战略形势及敌我力量的对比，认为部队经过连续作战损耗较大，需要补充、整顿，当前的态势不利于我坚守张家口。记得开中央局会议时，7个常委，只有一人不在，其余都到了，在决定放弃张家口问题时，聂荣臻同志提议举手表决一下，我是首先举手的。会后，我们即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陈述了意见，建议在敌人进攻张家口时，能守则守，形势不利时就主动撤离，以争取今后战局的主动。9月18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我们的这一建议，认为“依南口至张家口之地形及群众条件，我事前进行充分准备，各个歼敌，打破此次进攻之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同时指出：应“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如届时敌数路密集，不利于我，可以临时决定不打。”并指示我们，对张家口的机关与物资应秘密进行疏散，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之。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力图挽回东线的不利局势，对张家口战役进行了具体部署。估计敌人的主攻方向将是平绥路东段，可能以康庄、怀柔地区的两个军西进；集宁之敌则可能在东线敌人占领怀来后沿平绥路东进，与西进之敌会师于柴沟堡地区。因此，决心以歼灭由康庄、怀柔西犯之敌为目的，保卫张家口。并决定组成野战军前指，由我和罗瑞卿指挥。我们确定的部署是：以第二纵队主力附地方武装一部在怀来、延庆地区正面抗击敌人进攻；以第一纵队和第二、第三纵队各一个旅，隐蔽集结在怀来以南

地区的一个山沟里，待机出击。另由军区直接指挥第四纵队和地方武装一部会同晋绥军区4个旅，位于张家口以西之柴沟堡、阳高地区，抗击大同、集宁方向敌人的进攻。为了配合平绥线作战，由第三纵队1个旅及冀晋、冀察、冀中军区部队共6个旅的兵力，同时和平汉路北段发动攻势。

这次作战，我们采取攻势防御的方针，在怀来和延庆地区，动员民兵，民工与战士一起构筑工事。到9月下旬，共修筑了几百个露天土堡和部分水泥堡，挖了40余公里的纵横交通壕，把原来用水泥构筑的一些半永久性工事联成了三道阵地，基本完成了战役的准备工作。

9月29日，北平方向的敌第十六军及第五十三军1个师共4个师1个炮兵团的兵力，分两个梯队，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沿平绥路向怀来地区发动了进攻。在飞机和炮火的狂轰滥炸面前，守卫在前沿阵地的我军官兵沉着应战，凭借野战工事，英勇抗击优势装备的敌人；连续战斗到10月2日，敌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进占了东、西花园等地。

接着，敌人又连夜调整部署，开始使用第二梯队投入战斗。10月3日拂晓，敌用2个师的兵力，以我怀来东面火烧营阵地为重点，分别沿铁路南北两侧10多公里宽的正面，展开了全线猛攻，企图突破火烧营阵地夺取怀来，打破我军整个防御体系。这天，敌人出动飞机100多架次，炸弹、炮弹向我阵地倾泻而下，真是“万炮齐轰”，使进攻达到高潮。我守卫在火烧营阵地的第二纵队的官兵们，在敌步兵进至我阵地附近时，采取以短促火力向敌急袭，用集

束手榴弹和汽油瓶打敌坦克，以分队或部队对进攻之敌行反冲锋、反突击，甚至插入敌群，与敌白刃格斗。是日从拂晓到黄昏，打退了敌人三次大的进攻，终于制止了敌人陆空联合宽正面的阵地攻击，敌被迫退到东西花园等地。我们则按预定战斗方案，即让敌进攻我预设阵地，不使得逞，敌必退回进攻出发地，然后乘其安营未定、饥疲交加的时候，从侧后夜袭，“击其堕归”。当晚，我第一纵队向敌左侧的突出部东花园和旧村突袭，一举全歼敌一个团和一个营，完全恢复了火烧营阵地。

敌人从正面进攻怀来受阻，蒋介石派他的参谋总长陈诚和北平行辕副主任陈继承，10月4日亲自到南口，部署从侧面迂回怀来。10月7日，傅作义第九十四军两个师，企图从怀来东南20公里的马刨泉、横岭城向我侧背迂回。我们觉察到敌人的这一企图后，决定由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指挥，以第一纵队和第二、三、四纵队的两个旅另一个团，在马刨泉地区设伏。8日傍晚，敌人的1个师、1个团和3个山炮连进入我伏击阵地。我马刨泉东南山上的部队迅速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担任突击任务的各部队居高临下，发起冲击，经4个小时的战斗，全歼敌军1个团和3个炮兵连约1600余人。敌再分别经镇边城和横岭城企图迂回怀来，我又先后在南石岭、镇边城东南的两次阻击战中歼敌1600余人，粉碎了敌人从侧翼迂回怀来的企图。

我军主力在平绥路东段10天的作战中，共歼敌1万余人，将敌人阻止于怀来以东地区。与此同时，野战军一部

和各军区独立旅在平汉路北段发起大规模破击战。在9月29日至10月3日的5天时间里，先后攻克保定南北之定兴、徐水、容城、望都4座县城，歼敌8000余人，控制铁路120余公里，有力地策应了野战军主力在平绥东段的作战。

正当平绥、平汉路前线不断告捷，中央军委已令晋绥军区派出部队东调协同我晋察冀军区，准备粉碎傅作义部从西面对张家口的进攻时，蒋介石为促使傅作义尽快从西面发动进攻，又把张家口划归第十二战区。傅作义即乘我张家口西北方向兵力空虚，以一部兵力向兴和佯动，集中主力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及骑兵集团，于10月7日由集宁方向西北迂回，经张北偷袭我张家口。8日，敌人进到南壕堑（今尚义）、大清沟，进而以2000多骑兵乘虚直插张北。10日，敌又占张家口以北的狼窝沟。于是，驻张家口的我晋察冀军区等领导机关，便在教导旅的掩护下有序地进行转移。11日敌人突入张家口，我守城部队即于当日撤离该城。东线我军因张家口撤守已腹背受敌，亦在西线第四纵队的掩护下转入察南。

我军撤离张家口，标志着我军最终改变了原定在北线夺取“三路四城”的外线作战计划，而改取内线歼敌的方针。放弃张家口如同放下了包袱，我之军事战略亦开始从被动转入到主动。

(四)

张家口的得而复失，在当时不仅使国民党蒋介石得意地喧嚣了一时，而且在全国也曾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震惊。在我们的一些同志中也众说纷纭。对于张家口地区保卫战的_{认识}，我认为应与内战爆发后整个北线的战略计划联系起来看。日本投降后，晋察冀地区被国民党控制了若干点线，还能大致相连，总的形势是好的，但内战一起，就处于国民党的战略进攻中。我们采取“三路四城”的方针，主要任务是巩固平绥线，保卫张家口。这个方针，不利于以弱对强。尤其在进攻大同及集宁战役时期，张家口就直接处于东西两面作战之中。我们为实现前述方针与计划，两个多月中在平绥线上打了三仗，给了进攻之敌以严重打击，顿挫了敌人进攻的锐气。大同虽然没有攻下，集宁虽然失利，但仍有不少战术上的胜利，历时一个半月，共歼敌 1.2 万人。张家口保卫战中，我军在平绥路东段和平汉路北段也曾给敌人以有力打击，但没有达到大量地歼灭敌人的目的，平绥线也就不能坚固。造成这一结果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战略来说，战争初期，我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提出北线在半年的时间内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现在看来不适于这一时期的情况。按照这个计划，我们要夺取大同，控制平绥线，保卫张家口。这就形成了东西两面作战，不能不分散兵力。后来的战争实践也证明了这个问题。如 1947 年 3 月晋察冀中央局安国会议后，由于我们集

中兵力在正太路作战曾一次歼敌 3 万余人。我们过去因为包袱背得太重，各路迎敌，虽然消灭敌人不少，但自己也消耗不少。打正太路、保北以后，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并以俘虏补充了部队，使部队“吃胖”了，队伍充实了。

从主观方面来说，有三大问题：

第一个是我们党当时对日本投降后的形势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出，特别是停战协议生效后，有一些同志滋长了和平麻痹思想。有的兵工厂炮弹也停产了，在战争爆发前部队又复员太多，晋察冀军区当时复员转业了约 10 万余人，战争一来，部队兵员不充实，这些都直接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第二个是我们对北线战略计划的执行上有问题，指挥上也有失误。如果我们在实行这个计划中不先攻城，而是先打路，可能是另外的结果。罗瑞卿同志在安国会议上曾同我讲到，张家口战役前他去延安，彭德怀同志对他说，你们晋察冀如果把平汉路打下来，张家口就稳固了。彭老总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铁路点多线长，敌人力量分散，便于我们歼灭，对敌人的运输交通破坏也大，可以影响他们的战略部署。而先攻城，就要打攻坚战，把自己的力量消耗了，尤其首先打大同，就更会如此。聂荣臻同志在回忆录中也说到，大同为晋北重镇，兵多城坚，军资充裕，当时我军既缺乏攻坚作战的经验，也缺乏重武器和攻坚资材，显然这是个失着。再如集宁作战中，我们在敌军增援的情况下，未能对已被打乱之敌组织连续攻击，却在部队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临时改变计划，转兵西进，打来援之敌，致

使部队失去了在集宁城下歼灭溃乱之敌的良机。在张家口保卫战中，我军曾在平绥路和平汉路北段给敌人以有力打击，但由于兵力不足，未能在平绥线扩张战果。而对敌人从集宁经尚义、张北迂回张家口的进攻路线又估计不足，使敌乘隙而入。

第三个是战前我在地方与军队的团结和协作方面，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隔阂未能及时地得到解决和消除。当时军队与地方双方都有抱怨情绪，这样就使得老根据地的优越条件未能在战争中充分发挥，影响到我军的作战。后来中央局安国会议将改进军民关系和军队与地方关系作为一个突出问题来解决，并明确指出，军民关系解决得不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胜利。通过开展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使矛盾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前述诸点，互相关联。由于“三路四城”的方针，使我们晋察冀、晋绥两个军区对大同都急于攻下而后快。从当时形势来看，应先打路后打城，我们把它颠倒了。大同打了一个月还打不下来，平绥线就开始被动了。集宁前线指挥的失误，更加重了这种形势。如战术指挥得好，张家口还可以巩固一时期（在战略反攻前，似难保住）。至于战前领导上思想的缺陷，对战争的影响很大，就不多说了。

（责任编辑 汪 新）

难忘的三年

——困难时期我在张家口工作的经历

胡开明

自荐赴山城

1959年9月下旬，我和河北省省委常委兼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裴仰山受河北省委委派，到张家口任指导整风反右工作组的负责人，同去的还有省纪委几名干部。

我去张家口前，河北省省委常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的议题是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之前，给每个与会者发了一份彭德怀元帅在庐山给毛泽东同志写的信，让大家看。这封信是对是错，却没有讲。

我被分到张家口小组，我和组里的同志一样，反复阅读这封不足4000千字的信。

一天晚饭后，张家口市委（当时，张家口是地市合并，市委直接管辖各县）第一书记葛启约我和张家口市委书记处书记张何明出去散步。葛启问我们：“你们看彭总的上书有什么问题？”我摇了摇头说：“看不出来。”“我也看不出来。”张何明也回答。心直口快的葛启叹了一口气说：“我总觉得这个会开得有名堂。如果说彭老总的上书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咱们都是一条道上的人。他说的话我都说过，

有的比他说的还重呢。”

听了葛启的话，我心头不禁一怔。对葛启，我是了解的。他对党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思想敏锐，敢于负责，也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难道，彭老总的信真又要引起一场运动吗？

葛启的推理和我的担心果然成为事实了。

9月上旬，在省委一届八次全会上，省委点名批判了葛启，印发了《葛启右倾言论集》，组织与会人员对葛启进行批判斗争。16日，省委全会作出《关于葛启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指责葛启从1959年1月开始，“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省委直到中央，进行了连续地、越来越猖狂地进攻。这种攻击延续到7月，葛启在《大海陀》（内部理论刊物）发表文章和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达到顶点。”就这样，葛启的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被撤掉了。

葛启的文章和讲话，我早已读过，那篇文章是他为理论刊物《大海陀》所撰写的署名评论，题目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认真改进工作作风》。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我个人理解，由生产队（原高级社）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变化，也要有一个过程，也不能性急，它的变化迟、早、快、慢，同样也是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

悟水平，不能只凭我们的主观愿望办事。在谈到集体和自由问题，他认为两者是一致的。所谓大集体，不是没有自由，而是在集体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有更大的自由。应当肯定，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日趋集体化，自由是越来越多，决不是越来越少。在总结工作中，既要看到九个指头，又不可用九个指头掩盖住一个指头，更不可夸大一个指头否定九个指头。

在市人代会上，葛启针对某些新闻记者一味猎奇，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编造新闻的恶劣倾向，辛辣地讽刺说：“他们认为说牛尾巴长在牛屁股上没希奇，非要说牛尾巴长在牛脑袋上才有新意。”这些议论都体现了葛启敢说真话的精神。

我对张家口和那里的干部，是比较了解和熟悉的。为了及时解决反右倾中一些实际问题，尽快改变那里贫穷落后面貌，我经过反复思考后，主动向省委提出到张家口工作的要求。这个举动，使很多人难以理解。一是不理解高职低就。明明是副省级干部，偏偏要去当地市一级的书记，这不是自己降了自己的职吗？二是不理解边陲“发配”。张家口和承德是河北的边陲区，那里自然条件差，生活水准低。在有些人看来，省委里的干部只有遭贬才会被派到张、承地区，哪有自己要求“发配”的。三是不理解自讨烦恼。不仅葛启同志犯了“错误”，市委农业书记史万修也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整个张家口市委受到了批判和指责，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一个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势必要受到上面与下面的各种压力，况且，这里各级干部我又是那么的熟

识，这不是自讨烦恼？

针对一些人的议论，我和林铁书记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居然说服了这位在河北工作几十年的老书记。

我说的第一条理由是感情。我在张家口工作多年，1945年8月，我军第一次解放张家口，就在晋察冀中央局办的《晋察冀日报》社任副社长。1946年10月，我随部队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撤出这座山城。1948年12月张家口第二次解放，我又是首批进城，担任察哈尔省委宣传部长，省政协副主席。1952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当时华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找我谈：“察哈尔省撤销，很多同志不安心工作，你是察哈尔省的老同志了，你先留张家口市工作一段，对稳定干部队伍会有好处。”这样，我就留在张家口市委任第一书记，半年后才调河北省委工作。这次如组织能批准我的要求，那将是我三进塞外山城了。这一条提的真诚，记得林铁书记马上就赞同了。

我说的第二条理由是在省里工作矛盾不好解决。我当时任省常务副省长，在1958年大跃进时兼任省大炼钢铁指挥部总指挥。这之前，我还任过省委工业部部长，对全省的工业实际状况比较清楚。所以，在讨论上报全省钢铁指标时，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因之与省府主要领导发生分歧。一年后，全省所炼钢铁的实际数字又证实我坚持的意见是正确的。但那些年月讲大话讲空话盛行，我同顶头上级矛盾不好解决。我要求下去也是解决矛盾的一个办法，也为省委书记林铁解决了一个工作上的困难。

我说的第三条理由是责任。从我的潜意识来说，面对

即将开始的反右倾斗争，张家口市委班子出了“问题”。自己原是察哈尔省的干部，对那里是人地两熟，自己去可能多保护一些干部。这一条，我没有多说，但林铁也是同意的。

还有一条，就是我在省里工作，究竟下边存在什么问题不大了解，我想很有必要去实地主持一个地区的工作，全面调查研究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扎扎实实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我毛遂自荐要去山城的请求，最后得到了省委的同意。

9月下旬的张家口，已有初冬的寒意。身体弱的人早晚已穿上了棉衣。然而，此时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已伴随着塞外的寒风，席卷着张家口地区。

“暴雨”化“蒙蒙”

我和裴仰山带工作组到张家口市后，市委首先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市委代理第一书记刘一鸣主持会议。我代表省委工作组传达了省委常委扩大会批判葛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和对史万修批判的情况。在会上，一些同志对葛启及史万修进行了批判发言。当时，在市委召开的一些内部会议上，我也随声附和地曾对葛启进行过批判。但在深入实际的调查中，在大量事实面前，我感到对葛启他们的批判是错误的。

为了解真实情况，我决定亲自到下面去看看。我首先去的是坝上大张北（大跃进时，将坝上张北、商都、沽源、

尚义、康保五县合并为张北一县)。

我一进县委宿舍，一眼就看到了县委第一书记刘文达。我高兴地喊道：“老刘！”没有料到，刘文达竟然连头都不抬。我有些生气地放开嗓门，喊了一声“刘文达！”喊声刚落，刘文达扭头就跑，一直进了里院的一间房子。我真生气了，就“蹬蹬蹬”追过去。一推门，里边插着。我伸出两个拳头，擂起门扇来。门开了，刘文达垂着头站在门边。我气冲冲地问道：“我是狼？我是老虎？叫你不应，追你就跑，还把门插起来，搞什么名堂？”刘文达抬头看了看我，哭丧着脸说：“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啦！”话刚说完，就嚎啕大哭起来。我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得见人哪？你说说，你犯了哪些右倾错误？”刘回答说：“我刚调来，情况也不了解，我也不知道自己犯了哪些右倾错误。”

从刘文达房里出来，我又去找张文光，这也是我熟悉的一个老部下。正在县里主持工作的一位同志告诉我，张文光组织右倾反党集团，已被隔离审查。

见到张文光，我开门见山问他：“你组织了反党集团？有什么事实？”张文光说：“原来的县委领导做粮食生产计划平均亩产400斤。我说在坝上地区根本做不到，是浮夸，同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后来刘文达来当第一书记，我又降低了他提出的指标。”我问：“就这些吗？”张说：“我们三个主管农业的书记常在一块讨论，反对高指标，所以不仅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我又问：“那到底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张文光说：“平均超不过100斤。”

随后，我又去县城附近的海流图公社，见到一个公社副书记，这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村干部。我问他：“为什么把你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回答说：“人家说我胆子小，暮气大，不敢放‘卫星’。”

次日，我又到几个“高产”社队了解情况。

黄盖淖公社食堂，每人4颗焖土豆，一锅酸溜溜（草）汤，人们一口汤，一口土豆。而我见到的材料上，赫赫印着，黄盖淖公社平均亩产410斤，创历史最高产量。

大阿囿村，刚刚秋收一个月，生产队、大队的库房只剩下一个粮底子，社员家中几乎无存粮。而按上报的“卫星”，这里的粮食早已成10倍地超出了库房的储存能力。

狼窝沟村一户社员，孩子饿得直哭，母亲把干瘪的奶头塞进孩子嘴里，却挤不出一滴奶水。

难道这就是闻名全省的粮食高产“元帅县”？难道这就是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会获得表彰的典型？本来，在到张家口之前，对于这里的困难情况和反右倾问题，我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但面前的现实已远远超过我的想象。

张北县地处内蒙高原南缘，古长城以北，平均海拔1500多公尺，地处高原，丘陵起伏，地广人稀，土壤贫瘠，气候干燥，风多雨少，十年九旱。冬季时常冷到零下30多度，地冻五六尺，立夏才能消融。有人作诗形容这里的气候和景象是：“狂风起处飞黄沙，少见行人不见家，晚秋未完冻先结，初夏不见桃杏花。”无霜期只有90多天左右的，农作物生长期极短，产量低而不稳。1949年全县粮食平均亩

产只有 55 斤。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粮食亩产平均达到 100 斤左右。

然而，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张北县的主要领导在全省由上至下放“卫星”的影响下，在上级的一再催促和号召下，昏了头脑，提出了“实现亩产 400 斤，争当粮食元帅县”的“左倾”口号。当时，许多人认为，张北气候寒冷，条件恶劣，这个指标达不到。但是，张北县委不但没有采纳，反而发动全县，在全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展开了大辩论。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开展了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插红旗拔白旗，大反所谓的右倾保守思想，促进人们的思想“跃进”。当时墙壁上贴的标语是：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土地”。

“天冷冷不住决心，地冻冻不住恒心”。

“苦干硬干拼命干，严冬寒春变夏天”。

为了实现“元帅县”，张北县和其它县一样做了很多“左”得可笑的事情：狗打死了，猫杀掉了，抓蛤蟆、捞蝌蚪、逮草鱼、找毛毛虫，为的是煮肉汤追肥，还将 44000 斤食用麻油和牛奶施在试验田、丰产田；农民的菜缸、水缸都被收去当尿缸，衣柜、衣箱则成为运送肥料的工具。

1958 年 10 月，中央发出了召开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会议的通知后，张北县委总结上报：全县放出了亩产莜麦 3012 斤，亩产马铃薯 24000 斤，亩产小麦 1176 斤，亩

产蚕豆 2600 斤等的高产“卫星” 21 颗。全县 9 万亩粮薯作物基本田，平均亩产 412 斤，比平均亩产 81 斤的 1957 年，跃进 4 倍多。加上草粮田，粮食总产量达 4 亿余斤，比 1957 年提高 1.75 倍。油料总产量达 4038 万斤，比 1957 年增长 88%。全县 23 万人民，每人平均占有粮食 1770 斤。其实，这一年的粮食亩产只有 110 斤。成绩被近 4 倍地虚夸和扩大了。

张北县委就是这样，在“大跃进”“左”的思想指引下，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蛮干，急躁冒进，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虚报浮夸，瞎指挥，酿成了当年高产获奖励，翌年就闹粮荒的被动局面。然而，骑在马背上的“元帅”却下不了马。1959 年又是浮夸，群众又是缺粮，恶性循环。

张家口的情况比我想象的严重的多，全区 70% 的社队缺粮，寒冬已经到了，而很多社员还没有一件象样的御寒棉衣。“死宝变活财”、“砸锅炼铁”搬空了人们家中的什物。浮夸风、高指标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200 百万人民生活没有着落。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很痛心。解放 10 年了，我们的人民还过着这样的日子，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没能带领群众脱贫，却带头吹牛皮说假话，怎么对得起人民？可眼下更糟糕的是，除了经济、生活上的困难外，正直、敢说实话的共产党员正被当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到批判。

葛启、史万修的问题我管不了，那是省委定案并报中央批准了的。整个“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我也阻止不了。但对张家口地区的事情我不能不管。我几经反复思考，拿

起电话，要通了市委书记处书记兼专员解峰，我尽量平和地叙述在调查研究中了解到的情况，心里告诫自己：“刚刚来，要小心！要谨慎！”但说着说着，我究竟没能控制住自己。当说到很多敢于讲真话、实话的同志正在被当成“右倾”受到批判时，我激动了，高声地说：“老解啊，下边的反右倾再不能搞了，这样搞，谁还敢说真话？我要在张北开全区的电话会议，宣布反右倾刹车！你能支持我一下吗？”

多年之后，解峰回忆当年接我电话时的情景说：“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老胡——你是省委派来指导整风反右倾的工作组长啊！但张家口的实际情况我是清楚的，那时，我听到你的指示，心里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果断地表示：同意老胡的意见和作法。”

电话会议召开了。全区上万名基层干部聚精会神地听着我代表省工作组和市委的讲话。一大批干部被解脱了。一场“急风暴雨”的“反右倾”斗争被化成了“蒙蒙小雨”。

解 放 干 部

1959年12月11日，中央正式批复，我任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身上压着一副沉重的担子，甚至怀疑自己这个常务副省长能不能干得了市委书记。但我眼前浮现出一批批干部受批判的情景，浮现出饿得直哭的孩子时，一切顾虑就全打消了。

我上任后，首先与张家口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广泛接触，

调查研究，与他们逐个促膝谈心。从第二书记刘一鸣（我来前，曾代理第一书记）以及书记处书记兼专员解峰、工业书记王云、城市公社书记张何明到一些县委和公社书记，都逐个地谈了。我和解峰的倾心长谈是在去省里汇报情况的路上和住招待所时。话题是如何汇报批葛反右倾的情况。

在省委召开的情况汇报会上，解峰同志做主要汇报发言，对所谓葛启的错误，他显然是字斟句酌，十分慎重。但是，对葛启的称呼，他仍象过去那样随便，一口一个“老葛”。中央一位听汇报的领导同志打断他的话，严肃地说：“不要老葛老葛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实质上是敌我矛盾，只不过是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解峰沉默了一下，继续汇报。这回，不是称呼“老葛”了，而是改称“葛启同志”。散会以后，我找到解峰，坦率地说：“我同意你的称呼，葛启还是个好同志，怎么能划到敌我矛盾呢？这种形势咱们不必紧跟。”解十分感动地说：“老葛根本不是右倾。要说检讨，我和老葛都应该检讨‘右倾’。这两年时间，我们脑子发热，办了极左的事。只不过在‘两次郑州会议’以后老葛对这一点认识的早，他想纠‘左’，倒成了‘右倾’。你对张家口基层的反右倾斗争‘急刹车’，解脱了不少基层干部，但反右倾的大气候你是抵御不了的。”我接着说：“不光是老葛，还有承德的王克东、唐山市的刘汉生、省里的杨英杰，都不是右而是‘左’，就是‘左’的不如别人厉害罢了。至于反右倾的大气候，我一个人顶不住，还有你，还有一鸣、何明、王云，还有全市280万人民。咱们要尽最大努力抵挡‘左’的干热风！”

有一次，我还找来了担任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于力耕。这是个很有思想的同志，可是在批葛反右的风浪中，却变得小心谨慎，生怕由批葛而“殃及池鱼”，因为葛启的那些右倾言论很多都是出自他的调查汇报。

我对于说：“找你谈话，不是谈一般话，大众话，是和你谈心里话，真心话。你大概想，胡开明会不会抓我的辫子？你可以放心，我胡开明决不会抓辫子的，不抓你于力耕的辫子，也不想抓葛启的辫子。当然，你也不会抓我的辫子。说实在话，对葛启我早就反不下去了，因为他说的这些话都对。我虽然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但我也受批葛的影响。这就是我的心里话。”于听我说的话，连连点头说：“葛启虽然说犯了‘右倾错误’，可他说的句句是实话……‘五风’刮光了社员的家产，有的社员家中只剩下一铺一盖、一碗一筷……”我们从傍晚谈到半夜，于详细介绍了全区农村的真实现状。我不时地插一两句话。

第二天，我又到了张北县，找到了张文光。我风趣地对他说：“我想听听你这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高见。”张回答：“我说的还是‘右倾’言论”。我说：“那好啊，在反右的时候能听到‘右倾’言论可不容易呀。说实在话，我跑90里上坝，就是为了听你的真话。”

张文光抬起头，看着我真诚而又恳切的神情，才下决心说：

“大跃进再也不能继续搞了。今年秋收前，张北全县234112人，就有213965人缺粮，占农业人口的93%，缺粮数达2889万斤。秋收后，缺粮问题暂时缓解了一点，但

现在才过了3个月，离明年秋收还有9个月，而粮食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明年的形势会比今年严峻得多。可是，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同志头脑在发热，还在叫嚷‘形势大好’，还在那里反‘右倾保守’，而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想方设法克服困难。这样下去，明年不知要饿死多少人啊！”张文光不知是怎么想的，说着说着话就象拐了弯似的自相矛盾起来：“我是犯了右倾错误的人，您上次来张北宣布反右倾刹车，使我少受了很多批判。但现在的气候，我的右倾帽子是摘不掉的，您也不必为我费心。我刚才说的尽是和大好形势唱反调的泄气话，谁处在您的位置上，也不会欣赏这些‘右倾’言论的。”说着，他痛苦地低下了头。我接着说：“张文光，你前面说得很好，可这几句话说错了，我欣赏的就是你能讲真话！你要是不敢说真话，那我不为你费心了，可你还是说了真话。帽子能戴上去，就一定能摘下来，况且是顶不合适、不公正的帽子。你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相信我们市委，振奋精神，准备继续为党工作。”

我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有时先实地察看，与群众交谈，再听当地领导汇报；有时先听汇报，再去实地在群众中验证这些领导汇报的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样既是在考察干部，又是在纠正错误，寻求正确的方针政策。在调查的全过程中，我唯一感到自慰的是，尽管处在“整风反右”的形势下，但是，仍有不少干部敢于抵制和批判“左”的错误，敢讲真话、实话。为了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再不能让讲真话的干部坐冷板凳。在常委会上，我郑

重提出了给张文光、刘文达、白玉等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定为犯了右倾错误的同志平反及安排工作的问题。我说：“对这些干部的情况，大家比我更了解，更熟悉。我认为，这些同志说过这样那样的不适宜的话，但是，给他们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是搞错了，搞过了。我们党历来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如果搞错了，就一定要纠正。这不仅是解脱几个负责干部的问题，还在于使广大干部都能说真话，说心里话，恢复党内民主作风。否则，敢说话的人都戴上了帽子，那以后我们还怎么能听到真实的情况呢？我建议，该平反的平反，该工作的工作，不要再让这些同志背着包袱了。”会场沉默了。这也难怪，多少年了，大家习惯于听上边的，上边怎么说就怎么干。现在，中央和省里没有平反的指示，无论是上边来的红头文件，还是人民日报、河北日报核桃大的标题都是“反右倾鼓干劲，再创新跃进”。市委要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安排工作！能这么干吗？大家以怀疑的态度掂量着这件事的份量。

一阵沉默之后，书记处书记张何明首先说：“我也做了些调查。开明同志说的很对，我们不能再让说真话的同志受委屈了。我同意给他们平反，安排工作。”何明的发言，无疑在常委会上带了好头。对于何明我是十分了解的，他资历很老，又素来以“好脾气”著称。他对同志的热情关怀和真诚，他处理事情的公道、正派，使他在干部中有很高的威望。他又是一个硬骨头，省委全会上对葛启的处理决定表决时，别人都举了手，唯独他不举手。

书记处书记解峰接着说：“我完全同意开明、何明同志

的意见。但在方法上，我建议分成两步：第一步，首先全部分配工作；第二步，分期分批地甄别平反。这样可能更稳妥一些。”

书记处主管工业的书记王云也表态了：“解峰的意见很好。工作可以先安排，平反可以分批。象烟厂厂长白玉这样的，只是不同意耽误纸烟生产去炼钢铁，并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就可以立即恢复工作。”

三位书记的明确发言，使常委会顿时活跃起来。虽然有的同志一再提醒，这会不会右了？会不会犯错误？但还是以多数通过了决议。一项项任命通知发下去了：张文光任中共张家口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刘文达任中共张家口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白玉任国营张家口卷烟厂厂长……

食 的 困 惑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做为市（地）委第一书记，感到最棘手的要算解决群众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它关系到全区人民性命问题。1960年初的冬天特别寒冷，食不果腹的人们在严寒中挣扎着。我一天要接十几个来自各县的电话，而内容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要粮食。多少年过去以后，人们仍忘不了恶梦一样的困难时期，饥饿，象一个恐怖的恶魔，威胁着每一个人，以至有人一听说农业歉收的信息，就囤积粮食。人们实实在在是饿怕了。

造成大饥饿的原因很多，首先是高指标，虚报浮夸。1959年，全国粮食实际产量是3400亿斤，这个数字比1957

年的 3900 亿斤还低了 500 亿斤，人均占有粮食 560 斤。但是，中央在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上确定的 1959 年的经济计划，粮食要求达到 8000——10000 亿斤，后来又正式确定对外 5000 亿斤，对内的第二本帐为 10500 亿斤，这完全是一个脱离实际的空想指标，直到现在，我国的粮食年产量还没有达到过 10000 亿斤的指标。但是，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鼓动下，各级层层加码，特别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谁也怕当彭德怀第二，结果，汇总到国务院的数字不仅达到了计划中提出来的数字，而且超过了它。

由高指标和虚报浮夸而来的，就是高征购。既然农村生产了这么多粮食，当然要多收购一些。从各地报的产量看，征购的粮食并不多，但实际上，很多地方连种子粮和饲料粮都交了征购，更不要说基本口粮了，岂有不饥饿之理？与虚报浮夸结伴而来的另一个孪生兄弟是浪费，人们沉浸在大丰收的喜悦之中，中央接连发出指示，强调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全国到处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不少地方搞“一平二调”，胡吃瞎喝。在农民还饿肚子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粮食过早、过多地转化为工业原料。

从 1959 年到 1961 年，老天爷也不帮忙，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张家口是风灾、旱灾、雹灾、水灾、病虫害五灾齐全。1959 年，全市受灾面积近 1000 万亩，约占耕地面积的 60%。1960 年，自然灾害比 1959 年更为严重，全区有 1010 个生产大队遭灾，占总队数的 68.84%，其中重灾队

230个，受灾人口占总人口数的54.11%。1961年再次重演前两年的惨景。三年的自然灾害，再富庶的社队也经不起这连续的折腾呀。

1960年1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经过反右倾以后，现在的情况是国内形势极好。决定1960年继续“跃进”。

6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十年总结》的讲话，指出在过去十年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在今后的实践中，要继续去调查它，研究它，从而找出他固有的规律。但党所面临的问题，当时没有得到解决。

直到12月的北京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党中央和毛泽东才决心停止“大跃进”，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其中头等重要的就是解决6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到了这时，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和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已经使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

1962年1月，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曾讲：“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他借用湖南农民的话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说，“你不承认，人家不服”。

刘少奇对三年困难的原因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遗憾的是，当时，这个分析并未被全党真正接受。那时，我对

形势的分析也有同感，在省及华北局召开的一些会议上，我曾几次讲过，全国的经济形势，我不清楚。就河北、张家口而言，我看困难并没过去。我认为张家口地区乃至全省，几年来农村生产力破坏严重，难以很快恢复。做好工作，也需要三四年的时间。

1958年是丰收之年，张家口总产16.5亿斤，人均550斤左右，低于全国人均水平。1959年到1962年，粮食总产在10亿斤左右徘徊，人均只有350斤左右，更是大大低于当时全国人均水平。当时，全国人均是450斤左右。

作为市委第一书记，我耳闻目睹，面对这场灾难性的饥饿了解的更深，更细。

我来到蔚县西合营，这里的人饿到了什么程度呢？春播时，前边播上种，后边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籽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饥饿难忍的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大大超过了对毒药的恐惧，种籽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先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仅此而已。结果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大增加，活着的人甚至没有力气把死人从屋里抬出去。

市委派去下乡的工作队员由于吃不饱，相当多的干部得了浮肿病。市妇联主任梁国英给市委写一份工作报告，饿得手发抖，握不住笔，写了几天，歪歪扭扭的字没有落到纸上多少。我得知这个情况，立即下令，所有的工作队员返回整顿半个月，住招待所，实际上就是休养。可是，200多万农民群众又该怎么办呢？

1960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宣化市委书记芦起打电话报告，由于饥饿，许多哮喘病人往往在黎明前死去，他要粮食，还要治哮喘病的大烟土。据说只要将大烟土和一点食物一起吞服下去，就能治疗或减轻哮喘。这个机灵鬼早就打听到，地区公安处就有过去收缴的大烟土。

大烟土，这个已经绝迹10年的东西，要把它从公安处的仓库发放出来，虽然说是作为治疗哮喘病的特效药，然而，谁又能保证不会出现吸食大烟的丑恶现象呢？我思虑再三，把解峰和公安处长孙凯找来，试探地问：“宣化县因得哮喘病死亡人日益增多，如果由我来负责任，能给哮喘病多发区发放一些大烟土当做药急用吗？”解峰马上说：“我和开明共同负责！”孙凯感动得连连点头说：“行，行，我马上回去安排发放。”大烟土发放了，缓解、救活了许多群众。

我还听说过宣化市委书记芦起挨骂的事。芦起到农村调查，看到一个老人躺在坑上，他问：“大爷，您是不是病了？”老人没有回答。芦起又问：“大爷，您病了吗？”老人看了看他，仍然没有回答。芦起以为老人没有听清，又提高声音问：“老大爷，你是不是病了？”老人突然用力撑起身子，怒气冲冲地说：“我没病，给我吃饱什么都好了。”随行的大队支部书记说：“这是市委芦书记……”老人说：“我骂的就是他！”大队书记还要说话，芦起用手势制止了他，用沙哑的声音对大队书记说：“赶快想办法给他解决点粮食”。

老人的话象针一样扎我的心，我似乎觉得那个老人就

站在自己面前，他骂的不光是芦起，还有自己……

芦起让大队干部给那个老人立即解决救济粮食，可挨饿的仅仅是一个老人吗？全区 280 万人都在挨饿呀！

1960 年，省委做出了日吃 4 两口粮的新规定。当年全省秋粮歉收，口粮标准降低些，是为了来年的生产，这是可以理解的。可全省不分地区，一刀切地都吃 4 两，张家口的寒冬是很不容易度过的。为了让各地、市落实这一指示，省委同时提出了“吃 4 两，晒太阳”的口号。张家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种种的“增粮法”应运而生。

1960 年 11 月 9 日，我主持召开县（区）委和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了省委会议精神，集中讨论了生活问题，进一步强调了“低标准”、“瓜菜代”的政策。12 月 4 日是个星期天，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云、市长刘谦和全市 4 万多名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城市居民，利用公休奔赴山川，采集各种野生杂物。在领导的亲自带动下，不到 10 天，仅张家口市区就有 50 多万人，参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动。山坡上长的，平川里埋的，水底下游的，全部采集了回来，共获得代食品 5500 多万斤。而全市的代食品原料已达到 2.3 亿多斤。其中的主要品种有玉米棒子芯、高粱穗、土豆藤、萝卜缨、榆树叶等，26400 多台加工机械昼夜运转，粉碎这些原料。

代食品在缓解粮食紧张状况方面起了一些作用，然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吃这样的代食品出毛病也就不奇怪了。病号日渐增加，最常见的是肠梗阻，有的人死于低血糖休克。

在宣化西望山大队召开代食品吃饭大会时，我的司机吃了两个代食品窝窝头。那还是拿到会上的展览品，在代食品中属于“优质产品”。散会刚刚把车开上公路，他就觉得肚子沉堕堕的，越走肚子越痛，象刀绞一般，汗水直往下掉，车子开得摇摇晃晃的。我问他怎么了，他一只手指着肚子，说不出话来。叫他停车，他怕耽误工作，咬着牙不肯停，坚持开回市委大院。一开车门，便“哇”地吐了一地。门诊部的医生说，亏了车子颠簸，把这些东西吐了，要不然积在肠道里，非出大毛病不可。

严重的困难威胁着人民健康，也考验着每一个干部。那时，省委为了来年的生产，定下日吃4两的规定是不能逾越的。为了对全区人民负责，对党负责，为了维持全区人民最低的生活，我多次向省领导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我对突破4两界限，可能要戴一顶非马列主义的帽子是有思想准备的。

做为第一书记，我再也坐不住，我直奔省会找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建议：“请你们下来看一看，一天4两粮食怎么活下去？”这位领导也很干脆：“全省都是吃4两，又不是光你张家口！”我说：“可张家口情况更严重，你看看，你这窗外是什么气候，可张家口是什么气候。那么冷的地方，吃四两粮怎么能果腹？你再看看，你这窗外的树木和草地是什么样子，可张家口的树木和草地是什么样子。塞外高原，气候严寒，代食品也少，不增加粮食老百姓怎么能活下去呀！”那位领导似乎也感动了，他走到我身边，用恳切的语气说：“老胡呀，我也想增加指标，可是没有呀。”我

针锋相对地说：“不是没有，指标就在你们手里，关键是敢不敢负责！”这是实话，省委确实掌握着一批由省调配的机动粮。但是，却没有人敢于向下负责，把它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与省里某些领导的态度相反，在蔚县的一个公社，出了一位秘密放粮的公社书记武万升。在省委提出吃4两的标准以后，蔚县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与省委驻蔚县工作组共同研究，为了模范地执行上级党委指示，做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决定，再压低一两，规定日吃3两粮食。这个标准降到了一只鸡所需食物以下。即使这3两粮食，也是由公共食堂统一管理，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大增加。1960年10月，死亡人口为0.29%，11月为0.49%，12月上升到0.99%，进入1961年1月，死亡人口猛增到1%。

武万升所在的东城公社情况也很严重，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夜盲症。武万升带着公社干部深入各家各户了解生活情况，查看病情。每到一户，人们都拉着他的手，流着热泪说：“你什么时候再来呀？咱们再见上一面吧，要不，恐怕就再也见不到了！”听到这样的话，武万升好似一把刀子扎在自己心头。回想自己参加革命以来所学的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反复思索着：“马列主义不是要我们为人民服务吗？马列主义不是要我们关心群众生活吗？马列主义不是要我们解救群众疾苦吗？看着群众饿死不采取措施，那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乌纱帽可以不要，党籍也可以开除，但人不能不救！‘跳水救人’再也不能迟疑了！”

武万升冒着对抗上级指示，冒着戴“非马列主义者”帽

子的危险，秘密召开东城公社书记和大队书记会议，做出了秘密放粮的决定：第一，从公社掌握的储备粮中给全社每个人分10斤粮食，增产队可以分15斤，这些粮食不交食堂，由社员拿回自己家食用。预计全社要放粮40万斤。第二，从入库粮中拨出白面和玉米面5000斤与中药材合制成消肿点心，分配给病人食用。第三，国家干部带头，每人捐献一个月的工资和衣物救济严重困难户和重病人。在会上武万升将自己临开会时刚领的88元工资，全捐献了。

粮食是第二天晚上分的，群众背着粮食，一迭连声地说：“这真是救命粮啊！”很多人感激地称武万升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是东城人民的“武青天”。武万升尽管是秘密开仓放粮，还是引起连锁反映，相邻的公社也都先后发放了一些粮食。

1961年初，鉴于蔚县死人太多，省委工作队队长李芳林和地委第二书记刘一鸣来到蔚县，主持召开三级干部会，调查解决饿死人问题。他们惊异地发现，在大多数公社死亡人数急剧增加的增况下，阳原片却死人很少，特别是东城公社情况最好。事情的真象弄清楚了。武万升淌着眼泪向刘一鸣如实汇报了群众生活困难，及自己擅自决定“放粮”的经过。当他表示罢官、坐牢任凭组织处理时，刘一鸣紧紧握着武万升的手说：“不，你做的对，我支持你，地委知道了也会支持你的。我现在就向省委工作队李芳林如实汇报，有什么问题我们顶着！”

武万升这样的公社干部，是多么好的基层干部啊！他心中装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这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我在地委常委会上讲：“就是要表扬宣传这样的好干部。应该了解一下，除了‘武青天’，还有没有‘张青天’、‘王青天’、‘刘青天’。共产党的干部都应该成为关心群众疾苦的‘青天’。”一年以后，蔚县分为蔚县和阳原两个县，刘一鸣提议，将武万升提拔为阳原县委书记处书记，我头一个举手赞成。

1960年冬，我又一次打电话找到省政府主要领导，详细汇报了张家口市广大农村的饥荒，提出要杀一批过不了冬的弱牲口度荒，请省领导开绿灯。我当时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的请示使省主要领导又一次陷入为难之中，反复掂量，总感到此事关系重大，不敢贸然批准。谁料就在这时，毛泽东来天津视察，于是省领导小心翼翼地给毛主席汇报了张家口想杀老牛和瘦羊的事。毛主席几乎没有思索，手一挥，说：“救人要紧，杀就杀吧！”一道指示传下来，杀了一批老弱牲畜，缓解了我区一些困难，救活了多少人却很难统计。

我仍在不断向省委汇报张家口的真实情况。每天早上，我第一件事就是向主管生活的副秘书长询问死人情况。有一天，办公室的同志怯生生的请示我：“饿死人的数字是不是可以不报或尽可能少报一点？”我不明白地问：“为什么要少报？”办公室的同志讲，最近了解到，有的地方死了人不报告，结果，不但受到上边的表扬，而且死了的那份口粮还可以继续领，这叫吃空额。而张家口，死一个报一个，报一个死亡减一份口粮，报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评。我听后半晌没有说话，直到办公室同志再次请示是否据实汇报时，

我斩钉截铁地说：一个都不要漏掉，是怎么回事就怎么汇报，大家都说假话，中央怎么能知道下边的真实情况呢？

1960年秋后，宣化市委汇报，在省委规定吃4两以前是5两左右，当时农村非正常死亡就已经不少。1960年10月前，平均每月死460多人，省委“一刀切”规定口粮指示后，12月比10月前平均每月死亡人数增长1倍多。1961年初，我作地委赴宣化工作团团长和省委赴宣化工作团一位领导一起听宣化市委书记芦起汇报工作。芦说：“粮食指标太低了，浮肿病十分严重，死人在逐月猛增。”我说：“那你说要几两？”芦说：“6两！”我说：“6两能过去吗？依我看，7两能过得去就不错。问题是地委没有粮食，增加粮食指标得请示省委批准。”芦说：“我去找省委阎达开书记，阎书记不批，中央我也敢去。”我制止道：“你不用说了，这些问题地委已经向省委反映了。”

春节前几天，我和解峰、王云接到省委紧急通知，赶到天津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中，突然通知芦起大年初一赶到省城，却使我颇费猜测。初一下午，会议正在进行，芦起和宣化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凯元走进省委会议室，会场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原来，芦起是这次会上将要被解剖的“麻雀”。

一位省委领导首先发言，他指着芦起说：“宣化市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原因是什么？”芦要求做系统的汇报。省委主要领导紧接着说：“不要说情况，只说原因。”这种方式的开场白，又当着这么多的省、地、市领导，一下子把芦弄得蒙头转向，他只好概念性地汇报说，死人多的原因主

要是：口粮指标太低；地方性的哮喘病流行；代食品加工粗糙；还有坏分子当道四条原因。当芦汇报到省委下达的日吃4两不行，就是吃5两也不行，至少需要6两时，省委主管生活的领导便大发雷霆说：“好，就是你芦起马列主义，省委不知道吃1斤比5两好。为什么你们光强调粮食指标？5两粮过不去是错误的。”紧接着，这位领导又责问说：“为什么你芦起对省委深恶痛绝，竟敢向中央告省委！”话说到这，他扭过头来对我说：“芦起之所以胆子那么大，那么固执，是因为你老胡支持他要粮食的。”我承认我支持并据理力争。最后省委领导宣布：“全省部分条件差的地区（占20%）口粮指标提高2两，但不是采取宣化的办法，而是经过算帐后省委决定提到6两。”我听到这个决定，长长出了一口气。

这件事对我印象甚深，记得1962年1月到2月，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我主持张家口地区小组讨论，芦起就此事对省委提出尖锐的意见。当时，因中央规定主持人不能纠正别人发言，所以我并没劝阻。1964年上半年，省委对此问题查对，我为此专门给芦起和早已调甘肃省工作的张凯元写信核实。

口粮提高到6两以后，我仍把自己的心思用到了解决280万人民的吃饭问题上。在一些会议上，多次讲了解散食堂，鼓励开小片荒，尽力做了自己职权范围内所能够做的一切。工业生产上的事基本上交给了书记处书记王云。为此王云有意见，多次找我反映，希望我这个第一书记多关心一下工业。我笑着说：“老王，陈云同志都表扬你是工业

专家，你就大胆干吧，我现在主要是管吃饭。”

对公共食堂的逆思维

公共食堂，是“大跃进”中产生的事物。在1958年8月29日，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给以充分肯定：“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旗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从而预言，“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地应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的热潮。这一年的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宣布：“公社适应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创办了大量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这就是使得几千年来束缚在锅灶旁边的妇女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而笑逐颜开；很多公社在农业巨大丰产的基础上，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广大的男女农民开始领到自己的工资，而过去经常愁吃愁喝、愁柴米油盐酱醋菜的家庭，从此可以‘吃饭不要钱’，也就是说，得到了最重要的和最可靠的社会保险。”

全国大办食堂，张家口也不例外。据当时专区妇联的报告，截止1958年9月25日，全区已基本实现“四化两

院”，即食堂化、托儿化、米面加工机械化、缝纫集体化，妇产院、幸福院。共建公共食堂 16000 多个，有 85% 的农业人口入伙……

一开始，农民对“吃饭不要钱”欢欣鼓舞，好多是在锣鼓喧天中参加了公共食堂，开始吃松心饭了。1958 年农业大丰收，一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民在收秋时，也就不那么精心了。在收花生中，改变了用镢刨、仔细捡的收秋方法，而是用犁一岔了事，好多花生果丢在土里，甚至有的生产队种的白薯多了，人们怕食堂老吃白薯，连收也不愿收，送别的村收获。中国有句俗语：“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农民们都成了吃现成饭的人了，对于一年的生活安排不作考虑。虽然那年庄稼丰收了，但是没有很好地收获，出现了丢、烂、糟踏的现象。一到了 1959 年，粮食出现了不足，公共食堂的饭食标准越来越降低，“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不能保障人民吃好、吃饱了。人们吃不饱肚子，便产生了怨言。

1959 年，在这种严重挫折面前，身为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的葛启，总结了这一经验教训。他为了顺应民意，提出入堂自愿、出堂自由的办食堂的主张。结果，在张家口地区，大部分公共食堂解散了。其它省市也出现了食堂解体的现象。庐山会议之后，全党大反右倾。中央提出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把巩固食堂提到维护三面红旗的高度。葛启顺应民心，将公共食堂大部解散，便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行之一，受到撤职的处理，下放劳动改造了，由我接任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

1960年2月26日，中央批转了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6月，中央再次批转这一报告，要求各省“一律仿照执行”贵州经验，“不应有例外”。并接连转发河南等省办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材料。中央还公布了各省参加食堂人数的统计表。河南、湖南等七省市90%以上的人口参加公共食堂；甘肃参加公共食堂的在50%以下；内蒙只占16%。

我对照张家口地区的实际情况，反复思考：为什么甘肃、内蒙这些地广人稀的省份，参加公共食堂的人少呢？这与本地的地理和生产条件与其它省市不同有关。张家口的坝上与内蒙毗邻，和南部平原不同。葛启解散食堂到底是顺应民心还是违背民意？违背民意的事办它干什么？可省委工作组在涿鹿县西二堡搞调查，给公共食堂总结出十大优越性来，引证了群众对公共食堂的赞美话，引起了我的怀疑。我立即给涿鹿县委书记王洁波打电话，请他马上组织几个敢说真话的，实事求是的同志，在不带任何偏见和框框的思想指导下，到西二堡再搞一次调查。叫社员们把办公共食堂的优点、缺点如实地讲出来并向我汇报。

王洁波接受了这个任务，一个星期以后，一份详尽的报告送到我的办公桌上。

报告上说：西二堡的公共食堂没有什么优越性，倒是存在着十个缺点。与省委工作组的调查结论相反。

我征询解峰、张何明等书记处同志的意见，他们早在1959年就看到了公共食堂的种种弊端，因为中央和省委一再强调保卫三面红旗，怕说了实话被扣上“右倾机会主

义”的帽子。

听了地县级领导对食堂的反映后，为了亲耳听听群众对公共食堂的反映，亲眼看看公共食堂的情况，我便驱车来到坝上，单等吃饭的时候挨个看各个食堂的伙食。

顶着“白毛风”，我来到康保县的一个村。食堂设在一座破庙里，百十个社员蹲在背风的角落里，就着天上飘落的雪花和冷风，吃着糠菜饼子。

来到狼窝沟下，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从公共食堂提出来半罐子糠菜糊糊，吃力地往坡那边走去。我叫秘书追上去问他为什么不在食堂吃饭？孩子说：“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又问他：“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说：“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哩，锅也砸了炼钢铁了。”

我听了秘书和孩子的问答，不由心中一阵酸楚，站在那里久久没有说话。直到目送那个提着瓦罐的孩子一步一步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才去看别的食堂。

我用几个月时间，亲自调查了近几十个公共食堂，从食堂的组织，食堂的管理，到食堂的帐目，做了全面的了解。我亲自和数百名干部、社员交心倾谈，终于掏出了群众的心里话。

无须再调查了。很明显，无论从人们的心理、习惯以及物质基础等各方面来说，当时的中国农村，特别是张家口坝上地区，还不具备办公共食堂的条件。人们的生活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生产、居住条件、物质条件各不相同，生活方式不应强求一律。生活方式的改变一定要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基础。人为的、强制的大办公共食

堂，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不符合群众的意愿，只能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在严重受灾、粮食紧缺的情况下，坚持大食堂、大锅饭，将进一步加剧粮食分配不合理，乃至出现多吃多占现象，造成更大的灾患。

我承认解峰、何明同志的话很有道理。中央、省委要求巩固扩大，我们要解散、压缩不行。但是，在巩固扩大公共食堂与解散压缩公共食堂之间，实在找不出可以使二者统一的办法。

在省委常委会上，我有选择地汇报了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在不涉及全国、全省大办公共食堂伟大成绩的前提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家口的情况比较特殊，天气冷，饭一出锅就凉；食堂又没有足够的房子，坝上地区更是人烟稀少，一个村几十户人家，住的相隔四五里路，每天去食堂吃饭，路上耽误时间不少；加上粮食定量低，大锅饭很难分的均匀……因此，请省领导考虑，是否可以停办公共食堂。”

省委领导对我的发言反应十分干脆：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张家口情况再特殊也不能不要社会主义阵地。因此，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办、解散。省领导还提出办好食堂的十四字诀，即“共产党员进食堂，支部书记来掌勺”。照这十四字诀，可以把食堂办好。可我听了并不死心，又找了王洁波，鼓励他在省委三级干部大会上把涿鹿县西二堡公共食堂的十条缺点说出来，打算引起省领导的重视。如果省委认为我调查有片面性的话，那么，县里同志的意见该考虑考虑吧。我怕王洁波有顾虑，就旗帜鲜明地表态

说：“你那十条我是同意的，如果今后有什么问题我承担责任。”

王洁波确实在会议上讲了。会议简报将王洁波的发言摘要登了出来。不过，换了两个字，把十大“缺点”换成了十大“罪状”，把王洁波个人发言改成了“张家口地区认为”。这样一来，张家口就有攻击人民公社之嫌了。我气愤地对省委副秘书长说：“王洁波说的是食堂的缺点，你们却改成罪状，这个责任完全由你们来负！”把企图向王洁波兴师问罪的人堵了回去。看来请示省委马上下令解散食堂是不可能了。可我还是想向上反映这个问题。当时有些老熟人说我：“你老胡真不会当官，没见过象你这么死心眼的！”可我想，我怕啥，想当年，带领东北流亡学生，在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请愿，促他们抗日，后来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死都不怕。现在，我这个共产党的地委第一书记，就不敢如实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吗？老熟人的劝阻，还是没能改变我这死心眼。中央和省委不解决办公共食堂的问题，我自己解决，管它落个什么后果，无非是摘掉“乌纱帽”，和葛启一道去劳动改造。我选中了郊区永丰堡村的公共食堂，先由这个村做起。因为这个村是张家口三大红旗食堂之首，是全省挂了号的典型。它的兴衰，对其它食堂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我来到这个村，叫干部将全村人都集中在永丰堡学校的院子里。我开始讲话：“社员同志们，今天我是专门来和你们研究公共食堂问题的。你们谈心里话，吃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好在什么地方？”群众中不知谁嚷了一句：“好！”

节省柴、省粮、省工”。我说：“依我看，不是省柴禾，而是浪费柴禾，这么冷的天，你们谁家不烧炕呀？可公共食堂做大锅饭烧的柴，暖不了你们各家的炕，回家还得烧柴禾暖炕。不是浪费了柴禾吗？”人们说，是这样。我又针对大食堂省粮食的说法向大家算细帐：“咱们村 210 户人家，要是自家做饭，谁不是算计着吃，节省着用？这一顿剩下饭，下一顿热热再吃，涮锅洗碗的泔水还用来喂鸡喂猪。那时，谁家都养十来只鸡，一两头猪。今天没东西喂鸡喂猪，全村连鸡打鸣也听不见，猪只有集体养的百十头。大食堂做几百人的饭，做少了不够，做多了剩下，给谁谁也不愿吃，就得扔掉。这不是浪费粮食吗？”我针对大食堂省工问题，又讲：“单从做饭的人数讲，全村只用大食堂做饭，是比家家户户做饭用人少了，可是各家做饭没有用整劳动力的，尽是一些不出工下地的婆婆媳妇们。可现在，全村 5 个食堂，就用 25 个壮劳动力专门做饭，这到底是节省劳动力还是浪费劳动力？”经我这么一讲，人们说，这个理我们也懂，可是我们不敢说呀。要是说心里话，吃食堂，我们早就不愿意了。我说：“你们早就不愿意了，就按大家说的办，解散！”这时，人们高兴了。一位老人擦着眼泪对我说：“胡书记，你句句话说到我们心眼里了，可得谢谢你呀！”我说：“谢谢毛主席吧！是他老人家叫我们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办的。”可大队书记郝永昌却担心地说：“葛书记解散食堂受了撤职批判，我们也受了株连，您又要解散食堂，将来……”我说：“你们就推到我身上，我不怕。群众不拥护的事办它干啥！”我亲笔修

改了向省委上报的解散公共食堂的报告。报告中说：“绝大多数群众不愿意把食堂再办下去。永丰堡大队的三个食堂，是全区办得最好的红旗单位，一宣布停办食堂，全村 210 户，全部高高兴兴回家做饭了。崇礼县下窝铺大队 638 口人，宣布自愿参加食堂后，只剩下 10 人，其中单身汉 7 人。各地群众普遍认为，办食堂弊多利少。不仅浪费大，增加了社员负担，降低了劳动日值，而且引起干群之间、群众之间的关系紧张。”报告还指出：“在目前物质基础不具备的条件下，勉强办食堂对生产不利，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得越快越好。”

到了 1961 年的 5 月，中央和省委正式发出《关于解散公共食堂的通知》时，我们张家口的公共食堂大部已经解体。5 月 17 日，张家口召开电话会议，指出：解散食堂是群众迫切要求，一搞试点就闻风而散。会议统计，已有 5200 个食堂停火，90 多万人回家做饭，其中自动解散的食堂就有 4713 个。实践证明，食堂解散得越快群众越满意。

“草伴养”和“分户喂养”

60 年代初的最困难时期，省委提出“要保证不饿死人”的口号。我这地委第一书记责任重大，心情是极为沉重的。怎么使群众吃饱肚子呢？必须使农民创造物质财富。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必须在张家口的山山水水上作文章。

张家口有山，但山不多；有水，水也不多。人们习惯

地把张家口分为两个自然区，坝上为内蒙古高原南端，称张北高原，包括张北、康保、沽源、尚义、商都五县（商都1962年划归内蒙），海拔1300米至1600米，面积12520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的36.8%。坝上地势南高北低，象波浪起伏。岗梁、淖泊分布其间。全年无霜期90至110天，降雨量340毫米左右，日照2700至3000小时之间，气温低，风沙大。土壤多为甸土和栗钙土，适合牧草生产，历史上就是较好的天然牧场；坝下面积为21520平方公里，山峦叠嶂，沟壑纵横，山地，丘陵相间，适合放牧的草山草坡至少有1000万亩。因此，张家口素为河北主要畜牧业基地之一。“张北马”、“阳原驴”、“草原红牛”、“坝上细毛羊”，是张家口畜牧业四大特产。

我来到张家口，首先对这里的畜牧业生产作了调查，向畜牧局要来了从建国以来的畜牧数字统计表。统计数字表明：从1949年以来，数字逐年上升，到1954年、1955年达到最高峰后，却又逐年下降。这是什么缘故？我把一直在张家口工作的原地委书记刘一鸣和专员解峰找来，诚恳地向他们请教。他们两个几乎是同声回答：“因为政策”。当时我想起毛主席那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使这里的畜牧业生产下降，那一定是在本地不适应。我脱口说出：“政策不适合本地情况，为什么不改正呢？”

我一提改正政策，刘一鸣、解峰都犹豫起来，好像是有些为难。在那个时候也难怪，不是象现在的人们，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得到了解放。那时，经过反右派、反右倾等“左”的运动，在思想上都有些谨小慎微。我

看到他们这种表情，便从抽屉里取出两份材料给他们。那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和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纪要。我说：“你们看，毛主席怎么论述纠正‘左’倾错误的。他老人家也在不断地调查、研究。当他发现错误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纠正。我们也该这样！”我走到墙上挂的地图旁边，指着张家口地形图对他们说：“张家口是农牧综合区，畜牧业的生产关系到张家口 280 万人民能否度过难关，关系到张家口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为了制定一个畜牧业发展的正确政策，我恳请你们二位挂帅调查研究，向常委会提出方案……”

我对这两位老部下用了“恳请”两字，刘一鸣和解峰相望了一阵，终于痛快地接受了任务。两人立即带工作组，分别下乡调查去了。

刘一鸣到坝上的康保县，发现了屯垦公社达布沟大队这个典型。达布沟大队原来是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达布沟、孟家沟、卧虎石、王生贵营四个村组成，地处康保北边缘，与内蒙古接壤。全大队 265 户，935 人，发展畜牧业有较好的条件。但是，由于羊只集体饲养条件不足，许多羊圈在一起，羊多圈小，晚上羊在一起压垛垛，母羊经常压得流产。特别是分配上的“大锅饭”严重挫伤了饲养人员的积极性。而“一平二调”、“共产风”又限制和打击了社员家庭养羊。结果，每年羔羊繁活率只达 40%，所以畜牧业生产连年下降。

为了解决羊只饲养中存在的问题，大队党支部和管委会发动群众讨论，最后形成了羊只分散管理办法的决议。具

体方法是：集体所有的羊归大队所有，固定给生产队，由生产队组织放牧和管理，实行分户饲养。草料和放牧人员的劳动报酬完全由用户负担，按适龄母羊定产（一只适龄母羊一年生一个羔子）一年一分成，大队分三成，生产队分二成，饲养户分五成，达不到定产指标的由饲养户赔偿（每只羔羊赔4元钱，超产完全归养户所有）。群众把这一种方法叫“三二五”、“草伴羊（养）”。大队还规定，社员个人饲养集体的羊羔子，每只全年付给两个劳动日，饲养集体成羊的户，每只羊定肥两车，以质论价。群众高兴地说，“实行这种办法多好呀！”

刘一鸣同志把达布沟的“三二五”向我作了汇报，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1961年8月30日，我要地委农村工作部、政策研究室和张家口农业干校组成联合调查组，来到达布沟大队，专门调查“羊只草伴养”的情况。联合调查组在达布沟住了5天，于9月11日写成一份《关于屯垦公社达布沟大队发展畜牧生产的调查报告》和《张家口地区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十项意见》，摆在我的案头。

调查报告详尽介绍了达布沟大队实行“羊只草伴养”的原因和方法。肯定地指出：“‘草伴养’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的拥护，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显示出许多好处。一是社员养羊积极性高了。饲养员每天从地里往家捎草，准备冬季喂羊，每天往圈里垫土，把羊圈打扫得干干净净，各户还准备了过冬的暖棚，许多妇女社员把羊羔子当宝贝，抱到屋里喂，羊只膘情看好。二是大队对畜牧业生产的领导比以前加强了。大队和生产队都有一名干部主管畜牧生产，

从政策上、经营管理上和技术上，扶持社员发展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都积极执行有关规定和决议，并制定了生产计划、保留公约，从制度上进一步保证了‘草伴养’办法的顺利实施。三是干部、社员普遍要求不要再号召牧区开荒种地，要实行轮荒放牧制。”

说起号召在牧区开荒种地，也是因为缺少调查研究办出来的蠢事。省里一些部门，为了急切地搞粮食，便开来了大批拖拉机开辟草原，种粮食。他们只知道“有土就长庄稼”的一般道理，不知道坝上的地多是黄沙，水分稀少。塞外狂风又多，拖拉机把草根锄掉，大地没有野草固沙，狂风刮来，黄沙乱飞，不但长不出庄稼，还失去了天然牧草，把草场弄得黄乎乎一片，破坏了生态平衡。好心办成坏事，群众十分不满。针对这一问题，大队决定从1962年起，把现有耕地每年退耕四分之一，轮荒压青，逐步恢复放牧草场。

我看完这个报告，当天就拿到地委书记处会议上做了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是切实可行的政策。9月12日，常委决定将这两份材料用最快的速度下发。经我亲自修改的《张家口地区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十项意见》明确宣布：“集体所有的羊，目前可以普遍推行屯垦公社达布沟大队的办法，实行‘三二五’、‘草伴养’，使大队、生产队、社员逐步都有自己所有的羊。”

9月4日，当调查组离开达布沟的时候，达布沟的干部社员心里打着小鼓，他们不知道大队将要降福还是惹祸。9月12日地委发文的当天，我告诉秘书，先给康保县委打个

电话，请他们转告达布沟的干部和群众：全区将要推广他们的经验，地委感谢他们。

电话传到达布沟，已是 12 日的晚上，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给家家户户送去了这一喜讯，也送去了畜牧业政策的“定心丸”。两年以后的 1963 年底，这个大队的羊只存栏数增加了 1.7 倍，羔羊成活率达到 95% 以上。

解峰接受任务后，也在刘一鸣发现达布沟“羊只草伴养”的同时，向地委和我推荐了一份关于崇礼县白旗公社下窝铺大队把牲畜下放到生产队实行分户喂养的做法和经验。还是在这个典型刚刚露头的时候，解峰就敏锐地发现了它的价值。在崇礼县，他向县委领导、公社干部、下窝铺大队的干部社员都做了调查了解。因此，他的汇报，本身就是一个有根有据的调查报告。他说：“大窝铺大队是个不足 200 户的村庄，现有 125 头牲畜。从 1958 年以来，由于大牲畜集中喂养，不仅大队浪费了人力，而且由于责任不明，造成牲畜瘦弱以至死亡。仅从 1958 年到 1960 年就死大牲畜 32 头。社员形容，‘牛犊眼上戴了眼镜，嘴上戴了口罩’。”他看到有的同志不理解，又进一步解释说，“因为牛犊嘴眼附近的毛都脱落光了。这个大队的副大队长贾明彦说：‘这根本不象个庄户人养牲畜的样子。下得少，死得多，膘又轻，又费草，又费工。照这样再养两年，连牛毛也没有了。’社员们也非常担心，这样下去，大牲畜一年比一年少，小牲畜培养不起来，将来没法种地。”

我听着很感兴趣，插话说：“你了解得很细，再说细一点。”接着，解峰又讲了几个具体事例，他说：“第一件事，

去年冬天，在拾掇莠麦秸垛的时候，从下面翻出一条死牛。可问哪个队也不承认是自己的。最后只好抬到公共食堂煮着吃了。不久，一头牛犊子半夜撒了野，被狼咬死了，饲养员还不知道。大队查问各个队，又没人认帐。第二件事，牛腿抽筋找人拽。由于集中饲养，各种劳动报酬不落实，天一下雨，牛圈里的泥水有半腿深，把牛蹄子都泡坏了。冬天牛棚里的尿结了冰，牛卧下着了凉，腿抽筋抽得站不起来。大队没办法，好几次找人拽牛腿治抽筋。社员们很怀念过去分户喂养，他们说，分户喂养省工、省料，人人操心，个个负责。1957年他们分户喂养时，繁殖29头幼畜，成活了26头，达到90%。那时全大队146头大牲口，头头膘肥体壮。所以，经社员讨论，这个大队用保本保值的办法把牲畜放到生产队，实行分户喂养，使用喂养合一。为了明确负责，他们实行了‘七定’。”接着，他详细汇报了下窝铺大队实行分户喂养的具体做法。

解峰汇报完，我等不及先让常委们充分发表意见便站起身来，对常委们作了结论性的发言：“人吃食堂不行，牲口吃食堂也不行。分户喂养，使喂合一，这个经验好。检验一个政策好不好，就看它能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能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根本标准，没有其它标准。”

解峰说：“可是那里的群众有顾虑，担心被定成‘右倾’，担心给插上‘白旗’，担心被当作‘资本主义道路’批判。所以，我们要用文件、用政策肯定它，固定它，来消除社员们的担心。”

常委会开得十分热烈。第二天一早，地委派出工作组

同崇礼县委农工部的同志赶到下窝铺，全面总结了把大牲畜下放生产队分户喂养的经验。随后经地委批转各地，很快在全区得到了推广。

短短几天时间，地委先后肯定批转、推广了一批发展畜牧业的典型经验。除了达布沟和下窝铺，还有沽源县高山堡大队牲畜经营管理办法的调查，万全县郭磊庄公社郭磊庄大队牲畜下放生产队的调查，赤城县东山庙公社南梁生产队集体养羊和社员家庭养羊并重发展的调查，赤城县马营公社高家夭大队和阳原县东城公社五马坊大队发展社员家庭养猪的调查。这样一来，就使张家口的畜牧业出现了新的局面。

至今也很难忘记 1962 年春节前后，我到坝上四县检查工作时所见到的动人情景。在一个村庄，见到一个老太太把小羊羔抱在怀里，并撩开棉袄裹着羊羔，嘴里喃喃地说：“我的小宝贝，看把你冻成这个样子！”就象抚爱婴儿似的，用体温温暖着羊羔。这类事例，我听过多次，这次亲眼看到了。我深切地感到，一项好的政策，会调动起劳动人民如此热爱畜牧，使社员产生了这样强的责任心。这使我更坚定了支持、推广“草伴养”、“分户喂养”等项政策的决心和信心。后来有人向我吹风说：“你推行这些政策，使集体、特别是大队的大牲口和羊只的头数减少了！”我说：“你给我报个集体加个体的总数，那就大大增加了。总数增加了，不正说明社会生产力发展了吗？”

这时，我再向张家口统计局要来统计表，那份《张家口地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清楚地表明，光是羊只一项，

1961年，牧业收入1753万元，占大农业总产值的11.5%；1962年牧业收入2320万元，占大农业总产值的14.9%，1963年牧业收入2854万元，占大农业总产值的18%，畜牧业的统计数字从逐年下降变为一年一层楼地上升了。

核算单位放到“脚”上

我担任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后，经常下乡，访问了许多干部和群众，总想把这一地区的生产搞上去，摆脱穷困和饥饿。尽管我想尽办法，也没能使这个地区的形势得到根本好转，难道张家口地区280万辛勤的劳动人民的干劲与能力都在“大跃进”中耗尽了吗？为什么人们那么疲惫、麻木，生产的积极性怎么这样难调动呢？我冥思苦想，老是解不开这个谜。为了弄清“庐山真面目”，我决意广泛地进行调查研究，亲自到郊区的永丰堡、万全县的郭磊庄等社队蹲点。在我主持下，形成了有30多名社队干部、科技人员、劳动模范参加的“政策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每月集中一次，加上农工部、政策研究室，初步形成了政策研究的网络。

我掉过头来看历史，逐年考察建国以来十年农业的实际成效。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笔记、心得。从1962年8月我在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可以窥见我这一段反思的成果。现在我将那个座谈会的发言摘录几段如下：

“互助组到初级合作化这一段，生产是上升了。但到高级合作化以后，生产就开始下降了。……1958年农业生产

好，群众认为主要是风调雨顺，再就是初级合作化时期打下了底子。这说明农业实现机械化以前，集体化程度不能太高，因为它受着生产力的制约。如果无限度地集体化，就会使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

“1955年冬一下子就高级化，时间很短，想一步登天。当时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足，没有一套制度和办法，曾发生破坏生产的现象。过去说，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生产资料不能分红，到底有无充分理由，值得考虑。对资产阶级还实行赎买、给定息哩，对农民就不能分红？马列主义对农民是不能没收的。没有土地，劳动就没有对象，不加工，不会长出粮食。因此，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不分红也有问题……所以，高级合作化时期的生产关系是否搞过头了，值得探讨。

“公社化更是搞得过急过粗了，超过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当时群众的觉悟程度。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估计过快。这几年农业减产，总的说有天灾，具体到局部地区，没有天灾也减了产，这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搞过了头。”

我在省委常委一次扩大会议上，也列举了全省大牲畜从1955年逐年下降的事实，指出发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员私有的牲畜折价入社后，……与他们的个人利益不直接了。所以爱护牲畜的人少了，群众说‘乔武举的毛驴，有人骑没人喂’”。后来，我不仅跳出张家口，还跳出了河北、甚至跳出了中国范围，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比较借鉴，研究、探求如何解决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问

题。

1954年，东北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苏联奥沙基柯等著的《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一书。当时，我粗略读过一遍，还没来得及更深的思考的时候，在地委农工部副部长于力耕的书柜里我发现他也有这本书。更意想不到的，他已对这本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5000多字的读书笔记。

这份笔记的基本内容有六点：（1）苏联集体农庄的规模；（2）苏联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和基本形式——工作队；（3）工作队中的小组，实行地段责任制，超产奖励；（4）在小组之中指定某一个人负责一小块地；（5）超额产量的超额报酬分配法；（6）实行按件计酬制。可见，于力耕的目的是要借鉴苏联在当时农庄实行的小组地段责任制和定产到地责任到人的制度。这份笔记我连看三遍，大声叫好。于力耕见我这种举动，却以为被我这第一书记抓住了自己的“隐私”而惶惶不安起来。原来，他听说苏联《真理报》已经发表文章，批判了这种做法，连苏联都在纠正这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还怎么能在中国拿出来呢？

我对于力耕说：“你不必为此惶恐，苏联纠正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赫鲁晓夫撤走在我国的专家，纠正过去对中国友好的做法，不就是把正确纠成错误了吗？”

过了两天，我接到省里通知，去天津开会。我专门叫于力耕同我一块去。利用会议间隙，找了一位在苏联工作几年，对苏联农业有研究的同志座谈。我对于力耕和那位同志说：“咱们现在就站在苏联的黑海之滨，先把这个海湾

的美景看够了，看透了，再看咱们的‘庐山真面目’。这叫做‘外国人’看中国。”

我发现罩在庐山上的是“左”的迷雾，是对共产主义的片面理解。对中国国情的错误认识，导致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急于过渡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急于求成。这是问题的实质，是主要矛盾。应抓这主要一环，再不能零打碎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

1961年3月10日，毛主席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三南”会议（中南、西南、华东）。同时，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三北”会议（华北、东北、西北），我参加了“三北”会议，并与河北省一些干部提出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脚”上（即生产队），华北其他省区也都赞同。但是，东北、西北区有不同意见，仍坚持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腿”上（即大队）。

意见出现分歧。河北省委又决定派一位省委候补书记和唐山地委书记下去再做调查。两人归来，结论却是不约而同：群众认为核算单位还是放在大队好。这样，会上主张和倾向改变核算单位的同志就产生了动摇。

我仍坚持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脚”上，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纠正“五风”，彻底克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想到这里，我立即给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齐建新挂通了电话，让他马上将郭磊庄改变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报告直送北京。

“三北”会议要结束了，我收到地委送来的材料。这时省委主要领导正准备去广州开中央工作会议。我将地委报

告交给他，并说：“这个材料你看看，我觉得很有份量，能说明会上争执的问题。”

会后，我亲自带领一个工作组到万全县郭磊庄大队搞生产队的收益分配“大包干”试点。说得明确一点，就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这之前，收益分配是以公社或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一个公社几十个村，自然条件劳动情况差别很大。然而，在收入上却是“一视同仁”的。虽然这种“共产风”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却被当作“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予以肯定。我要搞核算单位下放，既砍了人民公社的“大”，又砍了人民公社的“公”。说白了，也是变“大公”为“小公”。

我和郭磊庄的婆娘有一段很有趣的调查对话。在一次妇女们参加的座谈会上，大家告诉我：年初时，二队曾死过一头大骡子。这头骡子又高又大，拉车很有劲。可大家听说它死了，却高兴得眉开眼笑，跑到二队等着分骡子肉。

我问：“为什么？”他们说：“这么大的队，还不知道少谁的呢？心痛啥？”我说：“如果以你们小队核算，再死了牲口，你们高兴吧？”婆娘们七嘴八舌：“那不和自己家的牲口差不多了吗？恐怕哭还来不及呢。”我听了婆娘们的这些话，痛心地对工作组的同志说：“再也不能叫她们盼着吃骡子肉了。”

经过两个月的酝酿、讨论，郭磊庄顺利实现了核算单位下放。具体办法是：生产大队由生产小队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生产队直接向国家承担粮食征购任务，其余收入归生产队自行分配。实行这种办法后，社员出勤多

了，干劲大了，劳动效率提高了，生产队也发挥了积极性和自主权。群众一致拥护，唯恐再变成大队核算。

根据这条经验，我亲自起草郭磊庄分配大包干向省委的报告。报告说：

“‘三包一奖’制一遇自然灾害就不能兑现，更难分清天灾和人为减产各占多大比重，而且‘三包一奖’手续复杂，讲不清，算不清。由大队统一核算，避免不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不利调动社员和小队积极性。”

报告认为：在一部分或大部分地区实行“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有五大好处，即“将生产和分配统一起来，使社员感到个人与集体利害关系直接了；彻底解决了大队干涉过多和瞎指挥问题；能够发挥干部和社员的主动性、积极性，使生产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大包干方法简单、好算好懂、好实行；从根本上避免了瞒产私分。”此报告提交到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引发了各地区组争论。

大多数组认为：划小核算单位，集体的力量小了，影响集体经济发展。他们力图维护大队核算，实际上还是受“左”的束缚。

恰巧，这时省委主管农业书记给我打来电话，讲省委主要领导从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打来电话，让转告我，会上已议过关于是否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但没有作出结论。其含义就是张家口不要扩大试点了。

郭磊庄的经验被搁置了。

在地委常委会上，我提出自己的意见：“还是干！咱们自

已推广！”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全区各社队核算单位下放逐步推开。同时，一份要求在张家口地区各生产队因地制宜地推行“分配大包干”的请示报告再次上报省委。

8月24日，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工业问题和财贸、教育问题。但毛泽东的兴趣仍然在农村方面，他关注着农村“六十条”的命运。同时，对人民公社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即土地、耕畜、劳力归生产队所有，而分配则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所有权与分配权的矛盾，也一直揣在心里。这次会议上，他仍沿着这条思路进行探索。

省委那位主要领导从庐山给我打来长途电话，要郭磊庄分配大包干的试点材料。我和主管农业的副专员曹恒忱连夜赶写出来，派人送北京，由中央办公厅转送庐山。可惜，虽然这位领导及时拿到了郭磊庄的材料，但因摸不准气候，没有给毛主席送上去。所以，庐山会议结束后，他又原封不动地将这份材料带下了山。

时隔几日，我去省里开会，遇见从庐山回来的这位领导。当我问起地委报告是否在会上送主席时，他讲：“报告我看了，感到理由不充分，就没有送上。”我仍然坚持应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到“脚”上。他说：“老胡啊，你就是这个毛病，有错误还不纠正。”我说：“我还没有认识到错误，又怎么纠正呢？”

9月16日，仍在庐山的毛泽东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毛泽东在信中指出：

“农业方面严重的平均主义问题至今未完全解决，即‘三包一奖’，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在大队。”他提出“三

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了6年之久的糊涂日子，第7年该清醒过来了吧。”

所以，庐山中央会议刚刚结束，毛主席就途经湖南、湖北做调查。当两省汇报核算单位还是下放到小队好时，主席当即表示同意。

陪同主席视察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给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打来了电话，通报这一信息。李雪峰又立即给河北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打了招呼。

9月26日，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主席途经邯郸，要听取河北省委的汇报。省委主要领导立即赶往邯郸，同时，打长途电话通知我连夜赶到邯郸。

次日中午，主席乘坐的专列抵达邯郸后，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及分管农业书记，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邯郸地委书记参加了向主席的汇报。

汇报重点，还是围绕着核算单位下放问题。主席问，是否有具体的试点材料，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由于已摸到了主席的“底”，便把张家口这份材料和保定的材料递给主席。主席从庐山回来，在沿途已有表态，所以一边看，一边在张家口的材料上批示：

“中央政治局：

这个材料请你们看看，我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下放到生产队好。请你们讨论决定。”

毛主席批示时，我就在主席身旁，我的心随着主席手笔的一笔一划而跳动。当主席写完最后一个字时，我才发

现，自己的眼眶里充满了激动的泪水。29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这激动人心的一幕，记得这刻骨铭心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这份文件后的第三天，即9月29日，我们张家口地委召开县委、市委书记会议，做出了全面推行大包干的决定。

10月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常委的指示，将郭磊庄报告列为附件，中央这一指示指出：

“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以生产大队好，还是以生产队好，很需要研究。并要求各级党委调查研究，以便中央做出决定。”

1962年2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并要求在当年春耕前后，把基本核算单位调整为生产队的工作做完。

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是公社体制上的重大调整，是对农村“六十条”的重要突破。

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层好的调查研究取得的结论，得到毛主席的赞同，这确实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们搞郭磊庄核算单位下放的试验，比中央正式文件通知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生产队的时间提前四个月。到1961年10月20日，张家口全区已有2278个大队实行了核算单位下放，占生产大队总数的59.6%，当时，在南方养病的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也兴奋地打来电话说：“开明同志，毛主席说了，基本核算单位还是放在小队上好。这件事你是有大功劳的呀！”

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

在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我们在思索着，还得往后退，退到生产力这双脚与生产关系这双鞋适合为止。在地委常委会上，我布置了这个大题目。这时机关干部的一个牢骚和一个传闻，引起我的兴趣。牢骚：“哼，咱们机关帮他们突击锄地，累得腰酸腿痛。人家倒好，生产队长领着社员来市里看戏，逛街。你不相信，我是亲眼看到的。我从他们队锄地回来，在戏院门口碰见他们一伙子出来，你说这气人不气人？”；传闻：郊区一个蔬菜队，把蔬菜包给了作业组。走到这个队的菜地，一片葱绿，和周围生产队的菜地简直不能相比。可他们不敢说，怕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

我听了这些牢骚和传闻，沉思片刻，找来了市委农工部部长唐弘毅（郊区归市管辖），限他一天之内把那个包菜地到组的生产队找到，弄清情况。三个小时之后，唐弘毅和郑振华来汇报，传闻中的这个生产队是大镜门外的孤石大队一队，情况完全属实。“走！”我一跃而起，拽上研究农村政策的几位同志，直奔大镜门外。当我看到一片长得格外喜人的蔬菜，心里异常兴奋。在田间、地头，我和社员、队干部亲切交谈。队干部告诉我作业组是自愿组合的，菜地包到组，工分、产量也包到组。现在，人们出工早了，收工晚了，干活细了，上粪多了，并指着附近的菜地说：“这些菜地是四队和别的大队的，他们没包。早一个月，我们

的菜长的也是这样子。”

“从孤石回来，我立即向书记处汇报了了解的情况。我说：“三包到组”是个好形式。第一是户数少，与社员的利益更直接，因而更关心集体；第二是大家心投意合便于互相谅解，互相监督，自觉劳动；第三是劳力好支配，农活好安排；第四，干部参加劳动多了，偷不得懒了。这个办法，比起生产队核算来，鞋码起码又小了两号，我建议在全区推广。”

书记处同意了我的意见，我的行动也激发了大家调查研究的劲头。地委常委、组织部长彭英送来了《关于划小农村人民公社规模》的调查，经我修改，常委会通过，上报省委；地区外贸局局长郭奉珍送来了他在坝上下乡，群众要求实行“三包到组”的调查；万全县委书记张文光送来了《实行按劳分配、保证口粮和“三包、两定、一奖”兑现》的建议；怀来县长赵拓送来了关于发放出工补贴粮的报告；地区农林局副局长孟常谦送来了宣化县赵川公社义合庄大队《500亩撂荒地包产到户》的调查……

这些建议、报告，从不同侧面逐渐丰富了我的认识，一些久久不能回答的问题也逐渐清晰起来。1962年初，我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两段话：“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新的生产管理形式已经被农民创造出来了，这就是包产到组，其核心是建立生产责任制。”

1962年6月，原来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葛

启，得到甄别平反。省委打算把他安排到省公安厅任副职。我不同意，我主张对葛启应官复原职。这时张何明从张家口给葛启也打来电话说，张家口很困难，张家口的人民、地委的同志希望他回去。葛启向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提出回张家口工作的要求，李雪峰表示可以考虑。省委主要领导在李雪峰的表态下，批准了葛启的请求，任命葛启为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免去我的中共张家口第一书记职务。就在我们两人互相接交手续之际，又共同在张家口地区推行了“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那年，蔚县的粮食总产量是建国以来最低的一年，农民生活困难到极点。群众竟将衣服、锄头卖掉，换高价粮食吃。甚至有的卖儿卖女，外出讨饭。播种季节快过，大量集体耕地荒芜，我对蔚县的这种情况十分焦急，便委派地区农林局长吴介夫带工作组到蔚县常宁公社推行“三包到组”。结果，出现了这样的新情况，一方面群众要求更彻底一些，实行“包产到户”；另一方面，县、工委领导有顾虑，怕犯方向错误，连“三包到组”都表示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吴介夫给地委打回电话，请示怎么办。

这时，巧逢葛启到职。地委便召回工作组，召开常委会听取工作组汇报。汇报后，解峰说：“看来常宁的问题工作组解决不了，不去大干部不行，说服不了县委。”

葛启当即表态点将：“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这是毛主席一贯教导。我去跑一趟。何明、亢杰和我一块去。”他扭头对秘书张铎说：“你也去，告诉蔚县县委，我们要边走边看边调查。也请他们用事实说话。”

此时我已经卸职，准备收拾行装回省。常宁推行“三包到组”是我提出的，但眼下要搞“包产到户”，虽然只是一字之差，我却不能同意。当葛启、张何明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则认为：“包产到户”作为生产、经营的一种辅助方式是有好处的，但最好不要推广。

29年后的今天，看当时我和葛启的认识不一致，反对葛启推广“包产到户”，还是我的思想保守了些。

葛启恢复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后，立即大刀阔斧地工作起来。他经过一段挫折，并没有出现不敢敞开心想说话和处理问题谨小慎微的现象。葛启还是过去的那个敢说真话、实事求是、敢想敢干的葛启。在他的领导下，张家口的工作，逐步破除“左”的束缚。这里的经济建设，也定会有较快的发展，对此，我是充满信心的。

至于我的工作安排，有人说：要我回省担任主管城市工作的省委候补书记，我自己倒没啥考虑，无非还是去当常务副省长。当时，我仍关心着“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的推广问题，因为这项经验，是我研究试点创造出来的。地委决定在6月25日召开第二次农工政策研究员座谈会，孤石大队在会上要介绍“三包到组”的试点经验，我也愿再听一听，以便坚定我推广生产责任制的信心。

不知怎么，当我真正要离开张家口这280万人民群众时，离开张家口地委这个同甘共苦的班子时，却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留恋情绪。在张家口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县委书记们得知我调回省的消息，晚上都来看我，并向我提出继续留在张家口的要求。我说：“葛启回来了，实

际他比我强，他农村工作的经验，对这个地区的情况的熟悉程度，都比我强。加上大家都是张家口的老干部，大家都能团结一致，张家口的工作一定能够搞好的。”

6月26日，于力耕受葛启和地委的委托，送我赴省会天津报到。几天后，在省委机关见到了省委第一书记林铁。林高兴地说：“老胡啊！你前脚回来，后脚县委书记们就联名写信来，请求省委将你留在张家口，看来你和张家口地县呆出感情来了。”

我到省委报到后，由于省里的职务一时还定不下来，我就决定利用这个空隙，先从张家口把家搬回来。

1962年7月15日，我从省会天津去张家口搬家，路经北京转车，我住在河北驻京办事处。碰巧，林铁也住在办事处。我去林铁的屋里聊天。遇上华北局第三书记李立三来找林铁。他一进门就大声说：“老林，告诉你，中央马上要开一个北戴河工作会议，华北局想赶在会议之前开一个农村工作座谈会，为中央北戴河会议搜集和提供材料。等到中央的会议开上了，咱们的会就和它同步了，最后再把中央会议的精神拿到咱们会上贯彻。你们河北北面去一个地区代表，南面去一个地区的代表，加上省农工部的领导。你赶快把一南一北的人定下来才好。”他一口气站着说完了这些话，才和我握手致意。

林铁书记问我：“北面谁去？”我微笑着没有说话。“马力？”林铁说着，侧头沉思片刻，接着又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不行……”。

李立三和我，为了让林铁静静地考虑人选就一同把头

转向屋墙，去欣赏室内悬挂的两幅国画。林铁还是自言自语地思索：“张家口的葛启，承德的王克东，都是刚刚平反回去的，工作时间不久，不会掌握很多情况……”他突然喊我：“喂！老胡，你去怎么样？”我说：“我已调回省了，怎么还能作北部地区的代表呢！”林铁说：“这倒不要紧，又不是党代会。”他为了征得李立三的支持，又对李立三说：“立三，你看可以吗？你知道呗，胡开明对农村政策是有相当研究的！”

李立三快人快语，立即表态：“可以，可以。这是个座谈会，就是要能提出意见、反映情况的人参加。”人选就这样定了，接着李立三又向我谈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开法和当前形势。随手从文件包中取出一份中央发的调查提纲，给我布置了参加华北局座谈会应准备的材料。要求是如实反映下边的情况，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

我承担了这次重任，就无暇搬家了，每天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开座谈会、个别谈心、阅读材料，每天都是到下半夜才能睡觉。经过紧张的调查、整理，《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建议》形成了。这份建议凝聚着我三年的心血，即使从确定题目开始也经过了近半年的时间。林铁、李立三两位书记确定让我参加华北局座谈会之后，我便下定决心在这次会议上把建议报告拿出来。

但我也隐隐约约听到一些消息，在农村生产责任制这个问题上，各地情况不同，中央也是有意见分歧的。安徽省有85%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湖南、河南、广东、广西等省区有些地方采用了包工包产等经营管理方法，

在少数地区也出现了“分田单干”的情况。首都北京市，也在太平庄搞包工包产的试点。据说，毛泽东开始对安徽的“责任田”也讲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自留地多一些，不会饿死人！但时隔不久，1961年底，他对自己曾表态支持过的“责任田”，来个180°的大转变，讲“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办法变过来”。当时刘少奇、陈云、彭真等同志是支持包产到户责任制的，主张农业上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作为农村部部长的邓子恢，在多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群众的经验，曾多次提出了坚持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生产责任制，并在中央直属机关作了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他主张实行包工，以生产队为主体向作业组包工，大活包到作业组，小活包到人，并支持包产到户的办法。对此，有人提出批评，说这是方向路线问题。当时，无论是中央、还是各中央局、省委，对责任制都是反对、怀疑的人多，支持、赞同的人少。在多数人不赞同的情况下，我下定决心把调查报告拿出来，意在说服更多的同志，以推动和促进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和进一步纠正党在农村工作上的“左倾”错误。

建国以来，毛泽东一直很重视农村工作，很重视农业的发展，在实践中也不断调整农村政策。比如，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小队好的郭磊庄的报告，毛主席批示，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发了，就改变了他原来主张“一大二公”的看法；对公共食堂，原来他主张整顿和大办，后来，他经过调查研究，也下发文件，主张解散了。所以，我在接受参加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的任务后，便萌发着一个

信念：一定要直接向毛主席提出建议。

给毛主席“上书”

我准备将一份写好的《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直接上报毛主席。在我到北戴河开会的第二天，我给张家口地委于力耕打电话，叫他来北戴河，并让他把给毛主席呈送的报告再斟酌、修改一遍。

于力耕来了以后，想说服我打消直接给毛主席“上书”的念头，没能说服我，于是在报告的内容和文字上作文章。他说“三包到组”的“包”字不好，太敏感。批了多少年了，最好把“三包到组”改成“三定到组”。我说：“包就是包，上书就是要一目了然，旗帜鲜明。”于力耕又提出，报告里提“不要歧视包产到户的社员，对他们要满腔热情”不合适，还是删了好。我说：“删不得，这里不亮明观点哪行啊？”议来议去，删掉了一些可有可无的话，观点更鲜明了。

7月30日，我在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关于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的发言。会议秘书处做为大会简报印发并同时转报中央。

8月8日，我再次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毛主席：

关于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加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问题，我于7月30日华北局农业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一个发

言，提出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发言稿已由华北局抄送中央一份。现在我又把它打印了一下，特再送您一份，请予抽空审阅为盼。

谨致

布礼

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 胡开明

一九六二年八月八日

这封信是通过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的秘书转中央办公厅呈送毛主席的。同时送省委几位参加北戴河会议的领导同志。这份建议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呈送手续上都是合乎组织原则的。其主要内容，我现摘要抄录几段如下：

“农村人民公社，经过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特别是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纠正了‘五风’错误，比较彻底地克服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比以前高多了，但是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主要表现是：（1）社员出勤不主动，每天还得队长挨门上门去叫；（2）社员集体劳动的时间短，出勤晚，收工早，一般每天不过六小时；（3）耕作粗放，耕地留茬子，种地不到头（边），锄地草搬家的现象仍然存在。有一个生产队长告诉我说：‘现在社员有四怨情绪：一怨别组出勤晚，本组出勤早；二怨别组歇息大，本组歇息小；三怨别组收工早，本组收工迟；四怨别组工分高，本组工分低。’”

“为什么还存在上述现象呢？除了既定的政策还没有落实以外，主要问题有三：一是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过重，而且太不稳定，群众说我们的粮食征购政策是‘鞭打快牛’的

政策；二是国家的价格政策不合理，粮食与工业品交换不等价，与其它农副产品的比价也很悬殊。所以群众说：‘以粮为纲不合算，干什么也比种粮食强’；三是生产队没有建立起生产责任制，计算劳动报酬的方法有问题，不能很好体现按劳分配。

“以上三个问题都急需解决，但是由于目前工农业生产水平低，物资少，解决前两个问题是有限度的，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当前主要是解决后一个问题，即解决生产队内部的关系问题，发挥本身的潜力。”

在对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了系统论证之后，报告详细提出了实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我在报告中举例说：

“张家口郊区东窑子公社，有几个生产队在今年春季，自发地建立了常年固定的生产组，实行了‘三包’生产责任制。我去看了一下，效果很好。孤石生产队实行‘三包’到组后，队长既不用每天派活，也不挨门上户叫出勤了，连钟也不打了。每天天一亮社员就自动下地搞集体生产，中午休息时间很短，到了天黑还不肯回来。现在他们集体生产搞得很好，开小片荒的很少。外东窑生产大队‘三包’到组的一、二、三队，种的12亩老根菠菜，平均亩产6939斤，5月12日就上市了，平均每亩收入279元多，斤价三分九厘三；未包产到组的第四生产队的3亩老根菠菜，平均亩产5757斤，低于前者17%，晚上市两天，每亩收入217元多，低于前者4%。目前生产组与生产组之间的竞赛劲头很大。”

报告列举了“三包”到组的七大好处。并针对一些反对意见，进行有根有据的批驳。

“有些同志说采用这种办法，实质上是把基本核算单位又下放到生产组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说现在生产队对生产组实行‘三包’是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组了，那么，过去大队对生产队也实行‘三包’，为什么还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呢？显然，‘三包’到组，基本核算单位还是生产队。”

“可能还有人说，小组包工包产，虽然不是基本核算单位，但是也有部分核算了。我认为核算一下也好。我们的工厂是全民所有制的，还搞班、组核算，那么，生产队的生产小组搞核算，又有什么害处呢？搞生产就应该注意经济核算。我们现在领导农业生产不注意经济核算，也是一个大毛病。”

“也有人说，小组包产以后，又有一部分分配权，不好。我认为好。因为小组有了超产部分的分配权，他们就力争超产了；他们越力争超产，完成包产和完成国家征购就越有保证。同时，小组分得这种超额报酬，也是属于多劳多得部分，是完全合理的。这样做，一点也影响不了生产队的统一分配计划。”

此件，经中央办公厅于当日递呈毛主席。几天后，毛主席在信上批示：

印发各同志讨论

毛 泽 东

8 月 16 日

以上就是我给毛主席“上书”的简单情况。我给主席的“上书”，被列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下发。毛主席对这份建议的批示很简单，看不出什么倾向性。然而我这份“上书”下发不几天，我明显地感到，座谈会的风向转了。一些原来支持我这意见的同志也转了个180°的弯子，对生产责任制基本上是一片否定之声。

是继续反映情况，还是随大流赶快转向？我思考之后，还是选择了前者。我手头还有两份材料，一份是我和跟随我工作多年的秘书曲维镇同志调查研究写成的《关于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的意见》，这份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在生产资料都归公之后，在大家口粮分配水平都很低的情况下，一味强调按劳分配是不行的。提出了“基本口粮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建议。我于8月18日，又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并附上这份报告，送了上去。

另一份报告是怀安县委书记张烈派人从怀安专程给我送来的。报告长达6000多字，用大量事实说明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行生产责任制。报告表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赤诚。但是，在会议风向已转的情况下，我没再往上呈送。

北戴河会议结束时，毛主席见到河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时讲：“看来口粮问题，不要强调按劳分配了，否则会打击农村‘四属户’”（军、烈、工、干家属户）。近年来，我结合做党史工作，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了我这份报告。在我给毛主席的信笺上盖有“已送阅”的戳记。证明我那第二份“上书”毛主席看过并采纳了我的意见。

北戴河会议前，我搞的农村调查研究，制订的政策，提出的建议，连续得到中央的认可和转发，我内心自然是高兴的。

北戴河会议后，毛主席的注意力是放到阶级斗争上来了。他讲：“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之后，我便在四清前线，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往往是被教育，直到“文化大革命”。

但我万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斗我时，竟抬出了这样一段最高指示：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的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一九六〇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原来毛主席在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是反对包产到组的。

从北戴河会议后，我一直被责令检讨，受批判，坐冷板凳。批判逐渐升级。两年后，又将我的几位战友联在一起批判，称为“胡、葛、解反党集团”（即胡开明、葛启、谢峰反党集团），最后扩大株连，被定成“胡、葛、解、张（何明）、王（云）、马（哲生）反党阴谋集团”，张家口受株连的干部则不计其数。然而使我自慰的是，我并没有做愧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人民群众对我并无仇恨。

1969年，我被押送到张家口地区轮流接受各公社批斗时，人们给我送来一碗白菜，埋在碗底的却是猪肉、豆腐。半夜三更，干部、乡亲们偷偷来看我，并安慰我：“要坚信，是非功过，历史终究会作出公正的回答。”

日月荏苒，29年过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党中央肯定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农村面貌大为改观，我所经历的这段历史也得到了公正的评说。1989年4月，我又来到阔别多年的张家口，先后到蔚县、阳原、怀安、万全、张北、怀来六县。当我到常宁、沙家屯、郭磊庄等乡镇看望当年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时，我说：1985年初我刚从安徽调回河北省时，我一直想回张家口来看看你们。因为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和地委领导推行生产责任制，被定为“胡、葛、解反党集团”，“文革”中使张家口十几万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受株连，吃了苦头，使我深感不安。我这次来看望、慰问大家，是想通过你们向张家口的父老乡亲致歉！

谈到这里，我们彼此紧握双手，眼里都滚出了泪花，一时说不出话来。最后大家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都解放了，落实政策的春风，把咱们那段辛酸的历史吹走了。1980年9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村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也证实了你过去是正确的，现在的责任制比你制定的完善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用当今的政策检验你的过去，你是为真理而奋斗的。

听了张家口基层干部这些话，我理解这是对我的安慰。因此我也愿意把过去这段坎坷的经历记录下来，作为经验教训，留给后人评说。

(刘忠整理 责任编辑 刘昌亮)

我所知道的“乒乓外交”

赵 正 洪

人的一生中，能直接参与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是很少的，能直接参与世界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的。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到了晚年，“如烟往事俱忘却”的时候，这些重大事件反而更加凸现出来。我亲身经历的“乒乓外交”就是当年轰动世界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作为这件事的直接参与者，我看了一些有关此事的文章，总感到有不尽完善和与历史有出入之处。为此，我今天尽自己所能，将当年的历史事件如实写出，供人评说。

一、战 前 受 命

1970年，当时的国家体委军管会召集会议，研究我国是否派队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乒乓球队受到很大摧残。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主教练傅其芳被迫害致死，训练全部停止，体委机关内也是派性甚浓，再加上我国已有两届未参加世界乒乓球赛，因此是否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确不好下决心。

在这次会上，当时的军管会负责同志说：“今年是举行第31届乒乓球赛的一年。世界舆论认为中国队应该参加，要是没有中国队参赛，就不能称之为世界性的比赛。因为中国乒乓球队水平高，参加比赛才能反映当今世界乒乓球运动的技术水平。”经过研究，军管会议决定，向中央写报告，请示毛主席、周总理批准派队参赛。

这时，外界的推动力越来越大了。1971年1月25日下午，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先生一行4人来到北京，邀请中国派乒乓球代表团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后藤先生认为没有高水平的中国队参加，就不能算“世界级”比赛，当晚就向我有关方面递交了一份会谈纪要。中日双方的会谈是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进行的，因而比较顺利，几个技术性问题很快解决了。1971年2月1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会议纪要。但是最后中国队是否参赛，仍有待中央拍板。

当时距比赛日期3月28日还有两个月，距参赛报名截止日期只剩下10天了。日期紧迫，参赛准备工作必须加速进行。军管会要我负责乒乓球队的训练工作。当时我刚刚被解除“群众专政”不久，才恢复工作。因此接受这项工作后，我基本上泡在乒乓球训练馆。运动队多年没训练了，抓起来有些吃力。但运动员、教练员热情很高，练习很刻苦。有时军管会研究参赛的政治问题也通知我参加。

有一次周总理接见军管会领导，讨论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问题，把我也找去了。周总理主要是了解军管会的意见和参赛准备情况。他在会议结束时要求把详细情况准备

一个方案，然后上报。

散会后，我乘机找到周总理，提出了想回部队工作的要求。因为“文革”中我虽然在体委被批斗、关押，但我还一直保留着军籍，现在被“解放”了，我想回到部队去。周总理听完了我的话后，对我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国要参加的话，准备由你率队去日本。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回部队呢？这是一项重要任务，‘文革’以来第一次派队出国比赛，你可不能三心二意啊！要集中力量，抓好训练，做好思想工作，技术上要抓紧训练。”总理的一番话使我深受感动。“文革”前，乒乓球队就经常受到周总理的关怀。几次参赛回来，周总理总要设家宴招待参赛队员、教练员和团长、领队、体委副主任。总理每次都风趣地事先打招呼：“我请你们到我家吃饭，钱我出，但要自带粮票。”席间总理和大家谈笑风生。有时周总理还拉上我这个技术不怎么样的人一起打一盘乒乓球。

二、“我 队 应 去”

向周总理汇报后，军管会根据总理接见时的指示精神，组成了出席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中国代表团。经上级批准，代表团领导班子由我、符志行、鲁挺、王晓云和宋中组成。我任团长，符志行、鲁挺、王晓云任副团长，宋中代乒协主席。符志行实际上是代表团政委。我仍分工抓训练。经过一段突击训练，运动员基本恢复了原来的技术水平。当时我国年轻一代选手中有几名后起之秀，外国人不

摸底。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但是，当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苏对峙，苏联大兵压境。美国虽然开始与我国进行某种接触，但中美关系在当时仍是严峻的。中日并无外交关系。我国参赛的消息传出后，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日本右翼势力纷纷活动。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国家体委领导班子对是否派队参加又有些犹豫。3月14日晚，召开了有体委领导、代表团成员参加的会议，研究去不去的问题。我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展开了争论，基本上分成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我们应该去。理由是我们已经报了名，如果不去，有损我国信誉。另一种意见是，在国际上有几股敌对势力千方百计想破坏我队参赛，我队不应该去。有的同志说：“我国乒乓球队在世界上很有名望。我们花那么大本钱培养出的这支队伍，把家底都端出去如果出了问题，那损失可太大了。”会上不同意去的占多数。我虽然认为我队应该去，但自己刚出来工作，无职无权不宜表态。

大家讨论完，已经是下半夜了。周总理打电话要听汇报。韩念龙、王新亭、刘春、曹诚、宋中和我去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听完汇报，沉思片刻说：“不去怎么能行？我们怎么能不守信用呢？”他耐心地阐明了我队要去的理由，最后果断地说：“我们信守诺言，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总理边说边抽出铅笔亲自给毛主席写报告。写完后马上由秘书送给毛主席。当天早上，毛主席批示传到体委。毛主席批示：“照办”。还批道：“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至此尘埃落定，我队决定出征日本。

三、出征之前

毛主席的批示下来后，准备工作更加紧张地进行了。由于是停赛多年后第一次参赛，不少同志心情紧张。我也是如此。当时军管会的一些同志对我说：“七个冠军都要拿回来，一个也不能丢！”有的甚至说：“这次比赛一定要打好，打不好，不仅是个检讨的问题。”有的老同志和我开玩笑说：“老赵啊，这可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出去啊，要不拿几个冠军回来，你就在飞机上跳海吧，别回来了。”虽然是玩笑话，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当时周总理常强调，体育比赛中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有关领导却强调“七个冠军都要”。当时我队虽然经过训练，水平有所恢复，但如何强调把友谊和拿冠军的关系处理好，我心中没底。为了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希望，不辜负周总理的信任，我决心扎扎实实做好工作。

我认为千条万条，抓好运动员的工作是基础。我先后找了教练员徐寅生，运动员庄则栋、李景光、梁戈亮、郑敏之、林慧卿等个别谈心、摸底。庄则栋说：“拼，没事。”李富荣说：“这次比赛男女各拿一两个冠军问题不大，都拿不可能。”一些新队员表示：“我们没有参加国际比赛的经验，但我们拼命去干。”运动员斗志高昂，刻苦准备，我心里感到踏实了些。

代表团党委开展了强有力的思想工作。主要是针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比赛中可能遇上情况，加强教育。要求

大家在国际斗争中既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又要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广交朋友，扩大影响。新运动员则加强心理素质训练。在技术上组织教练员、运动员逐一检查，针对弱点加强训练，研究制服主要对手的方法和策略。全体队员决心争取胜利。我也增强了信心。

3月16日晚9点30分，周总理接见即将在第二天启程的全体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包括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和代表团领导共60余人。

周总理首先强调了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重要意义，同时对参赛的政治、技术情况及有利条件讲得一清二楚。总理把大道理讲得通俗易懂，对乒乓技术也讲到了点子上。他很懂乒乓球。最后，他又再三强调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我们原打算由庄则栋代表全团同志讲话，庄则栋也作了准备。但当庄则栋要讲的时候，周总理制止他说：“让赵团长讲。”我说：“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周总理的指示办，组织好参赛。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广交朋友，提高警惕，保证安全，力争政治、技术双丰收，为国争光。请总理并转告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我讲完后，总理点了点头。

接见结束时，大家都走了之后，周总理又对我说：“这次参加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派运动队出去参加世界比赛，它的意义是很大的，责任重大，情况极端复杂。你是打仗出身的，也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人。西路军打得很残酷，你跟李先念同志打到新疆，是很艰难，很不容易的。这次去，与真枪实弹面对敌人打仗是

大不一样的。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你要很深刻地理解主席的指示。”我向总理保证，主席的指示，已经字字句句记在心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决完成任务。”总理说：“好！这是主席批给我的，你不仅要记住，还要认真贯彻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方针。在复杂的情况下，遇事要十分慎重，要多与党委同志们研究。要提高警惕，保证大家的安全。”我表示一定要按总理的指示办，坚决执行主席和总理的命令。总理紧紧地握了我的手，我更加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

四、初到日本

总理接见后第二天，代表团乘飞机到广州，再由广州乘火车抵达香港。为了保证代表团全体同志的安全，到香港时没有住旅馆，全团住进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办公室。

在香港等飞机时，周总理非常关心运动员的健康，派专人给我们送来了当时国内很紧张的球蛋白针剂。总理在电话中亲自对我交待：“球蛋白是预防感冒的，你要亲自过问这项工作，让每个人都打一针。代表团全体同志都要打，特别是运动员一定要打。你要一个人一个人落实。”周总理还让人送来一份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纪念文章，让我们组织学习。

为了代表团的安全，周总理亲自安排代表团搭乘两架西德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日本。西德那家航空公司的总经理为了表示重视，亲自乘坐我所乘的那架飞机一同前往。另

一架飞机也有西德那家航空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陪乘。

3月21日，飞机准时从香港起飞。飞机飞临台湾上空时，西德那位总经理向我介绍：“下面是台湾海峡。”我特别向下看了看。想到当年在空军率部队到福建参战，把蒋介石的飞机赶出福建省上空，不禁感慨万千。又想到眼下这场国际舞台上的斗争，想到周总理的关怀、指示，更加感到任务的艰巨。

两个多小时后，飞机到达日本上空。先到的一架飞机在空中逗留，等我们的飞机先着陆。飞机停稳后，我从飞机的窗口往下一看，羽田机场停机坪到处是人。我们还未下飞机，日本方面几位负责接待的人上来接我们。日本警察也登机了，对我表示要尽力保护代表团的安全。刚下飞机，记者和来欢迎的人就围得水泄不通。我被人群前呼后拥地推上了汽车，连我们自己的记者都来不及拍照了。机场警备森严，警察出动了大约三四千人。机场人群中也有拿五星红旗的，也有手持台湾旗的。

乘车去住处的沿途，道路两边到处是欢迎代表团的人群，有人举着五星红旗，喊着欢迎代表团的口号。当然也有少数人拿着青天白日旗，拿着扩音器吱啦吱啦到处乱窜。这也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日本警察还是很负责任的。代表团统一住在东京一家大旅馆。日方到处都派有警察站岗。爱国华侨也自发地组织起来，在旅馆轮流站岗。我在日本期间有8个人形影不离地跟着，4位日本警察，4位华侨。气氛相当紧张。

到东京第二天，我们代表团就到一所学校开始训练，后

来和日本学生一起训练，随便参观。这一下哄动了。东京各报纷纷发表文章说：“中国变了。其它国家训练时保密，不允许别人看，而中国队却是公开训练，不论是运动员、学生、市民都可以看。”还赞扬我们：“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友好态度，出乎预料之外。”公开训练扩大了我国与日本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广泛影响了日本各界人士，各国记者也广为报道，扩大了我国民间体育外交的影响面。

五、在名古屋

代表团在东京短暂停留后，移师名古屋，包下了一家藤久观光旅馆。爱知县警察总部布置了大批警察，日本警视厅特地派专员到名古屋坐镇指挥。就是这样，每天仍有七八起国民党的特务和反动分子到中国代表团住处游行、骂街、烧毛主席像、烧中国国旗。他们一来，我们就向日方提出抗议。当局就派警察驱赶。有时还有坏人乘我们到训练和比赛场地时，向我们扔只燃烧不爆炸的火药包。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根本不怕这些人捣乱，照样去训练，去接触群众。但是为了完成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我的工作是十分紧张的。除了和运动员一起去训练、比赛场地外，在旅馆时就让翻译给我读当天的各种报纸，注意分析日本各界舆论。当时日本新闻界和有关方面拼命挖新闻，有时到了很让人担心的程度。甚至有时代表团领导人之间的开会谈话，第二天就见报了！

代表团领导人根据总理“友谊第一”的指示，开展了

体育外交活动。在东京我先后会见了中岛健藏先生、后藤钾二先生、西原寺公一先生，王晓云会见日本朋友就更多了。我们参观了名古屋的大学和丰田汽车厂。所到之处，我们感到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很友好的。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对代表团的生活、安全都花了很多的心血。名古屋电视台请我和庄则栋由后藤先生陪同到电视台，向日本人民讲话。我们还拜访了朝鲜侨民协会会长，大家一起开了联欢会，共唱《金日成之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乒乓球代表团也参加了，气氛颇为热烈。

正式比赛开始了。我每天在看台上观战，有时下来到比赛休息厅和运动员们谈谈，鼓鼓劲。在团体比赛中，气氛很紧张，我的心都快提到了嗓子眼儿，双手握拳，手心都湿了，比过去打仗还紧张。如果那时有心脏病，早就发作了。尤其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刚出来工作的我，心理压力实在是大！为了保证运动员的安全，每次带队外出，我都等在车门口，运动员上齐后，我才上车。为此有些日方官员好心地向我提出劝告，怕我这个团长遭到枪击不好交待。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我仍坚持这样做。

我队在男子团体比赛中夺得了冠军。新秀梁戈亮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大家都很高兴。接着是女子团体决赛，我队由林慧卿、郑敏之参加与日本队的决赛。结果我队输给了日本队。下场后，林、郑失声痛哭，气得连饭都不想吃。我就对她们说：“胜败是兵家常事嘛！我看你们本领就是比日本队员强，谁个不说中国这对横拍女将技术高强，本领好。这次就是输了几个球嘛！是偶然的失手嘛，还有两场

比赛，把女单、女双都夺过来，依我看你们完全有这个本领。我过去打仗，一次仗没打好，也很生气，下决心第二仗一定要打好。你们痛哭流涕，不想吃饭，这种心情我很理解，很同情。你们再比赛，我在台上用心给你们使劲。打球我不会，也上不了台。打仗我保险要冲在你们前面。打球我是无能的人，全看你们的了。”

女子单打、双打，中国队双双夺魁，她们高兴得哭起来了。我就跟她们开玩笑：“我是孔明，估计正确吧。我给你们编个顺口溜：林郑输也哭，赢也哭，林郑的眼泪是珍珠，先流的是银珍珠，后流的是黄珍珠。”她们又打又闹，非常高兴。经过全体运动员的努力，又夺得男女混合双打冠军，我才松了一口气。但另有一件事让我紧张起来了。

六、乒 乓 外 交

有一天，我从比赛馆乘汽车回旅馆。开车之前，一个长头发的美国运动员科恩向大轿车连连招手，跳上车时，他才发现上错了车。大轿车内的中国运动员倒都认出他是美国运动员科恩。庄则栋这时站在科恩身边。他亲切地对科恩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到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上车。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出访前，曾有过规定：不和美国队员手拉手；不与美国人主动交谈；比赛场上不与美国队交换国旗。看到庄则栋这些举动，我心里颇为紧张，拉了他一下。庄则栋笑着对我

说：“你当团长顾虑多，我是运动员没关系，你放心吧。”庄则栋送给科恩一幅杭州织锦，织锦上是黄山风景画。科恩非常高兴地说：“你们邀请了好多国家运动员访问中国，我们美国运动员能不能去？”这一消息在当地马上传开了。有的记者问科恩是否愿意访华，科恩回答的很干脆：“中国人非常好，我当然想去。”

团体赛结束后，组织观光，中国运动员又一次与美国运动员有所接触。他们问：“听说你们邀请了加拿大和英国乒乓球队去你们国家访问，是真的吗？”我们说：“有此事。”他们又问：“什么时候能轮到我们美国队去呢？”我们当时不好回答，只是一笑了之。

实际上在科恩与庄则栋接触后，我们就及时报告了北京。北京第二天回答：“告诉美国朋友，将来访华总是有机会的。”美国队再度提出访华后，我们又打电话请示北京，答复还是那句话。当时代表团天天与北京通话两次。毛主席看到有关中美队员接触的简报后，提出一天要通话4次。代表团由外交部一个同志专门负责此事，在北京外交部也有专人负责，双方听到熟悉的声音后才通报情况。北京几次回电都是那句话。我们就根据北京的指示，把这个意思向日本朋友和有关方面发布了。后藤钾二先生多次询问，我们也以此相告。

4月7日上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滕久观光旅馆的花园里举行游园会，我们兴致勃勃地跟亚非拉各国运动员、教练员和领队在欢乐的乐曲声中互相交谈、唱歌、跳舞时，一位工作人员匆匆走到我跟前，急促地说：“赵团长，北京

来电话，叫你立即回房去。”我回到房间后，工作人员把电话记录本递给我，电话记录上写着：“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一事，考虑到该队已多次提出要求，表现热情友好，现在决定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包括负责人在内来我国访问。可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旅费不足可补助。请将办理情况，该队来华人数，动身时间等情况及时报回。”看完电话记录后，我既高兴又紧张，马上派人把宋中叫回。宋中看了电话记录后，我马上叫他去找美国乒乓球队，向他们正式发出邀请。当时比赛已结束，去晚了可能美国队就回国了。与此同时又派人去请日本文化交流协会的村岗久平先生来，请他把邀请美国队访华一事迅速转告后藤钾二先生。由于事情突然，我们来不及事先和后藤先打招呼，请村岗久平向后藤先生转达我们的歉意。

安排完毕后，由我向外界宣布，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邀请美国队访华。这一下哄动了，记者里三层，外三层，纷纷询问我是不是真的发出邀请了。其中日本记者最多。我一再回答：“我们确实发出邀请了。”

村岗久平乘车到后藤钾二先生家中时，很多记者正围着后藤先生问：“据美国代表团的消息，中国代表团已邀请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是否有此事？”后藤先生再三说：“没有这回事。中国代表团不会邀请美国代表团访华的。”正在大家扯着嗓子大喊大叫时，村岗久平到了后藤面前，对他说：“中国代表团赵团长要我转告您，他们刚刚向美国代表团发出邀请，请他们去中国……。”没等村岗说完，后藤大发脾气：“这么大的事也不打个招呼，太不够朋友了！我

刚刚答复了新闻界，中国决不会邀请美国队访问中国。这下子让我说什么好呢？”村岗说：“赵团长说事情突然决定了，来不及先通报，请您原谅。”过了一会，后藤亲自找到我们，问是怎么回事。我就把详情对他做了说明。这样他的气也消了。

宋中和翻译王家栋找到美国乒乓球队负责人哈里森和斯廷霍文，对他们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哈里森感到很突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平静下来后，连连说：“真没想到，但这是件好事，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美国队经过请示国内，接受了邀请。美国队负责人哈里森办完了访问中国的一切手续之后，我们代表团也离开了名古屋，访问了大阪、神户、福冈、札幌等地。所到之处受到当地政府周到的接待，日本人民对我们很友好。

在这期间，日本各大报连篇累牍地报道了“乒乓外交”这一戏剧性事件，都登在头版头条，叫做“小球推动了地球”。

七、返 国 途 中

4月28日，代表团在东京乘飞机回国。飞行途中，我反复考虑，毛主席、周总理交给的任务是否完成了，有没有辜负毛主席、周总理的重托。这次比赛，中国队拿了四项第一（男子团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男女混合双打）也算不错了。更重要的是，通过运动员之间的交往，邀

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使中美关系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在比赛中，我们还与亚非拉许多国家的运动员、教练员交了朋友。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都执行了，自己觉得很高兴，不由得在飞机上哼起了我最喜欢唱的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树呀树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啊，张灯又结彩啊，唱一支国际歌庆祝苏维埃（这首歌是1931年在江西成立苏维埃时唱的）。战争年代，打了胜仗，我总要叫警卫员买只鸡，叫几个战友吃一吃、唱一唱。

下午，飞机到达香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灵光、祁峰和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费彝民等都到机场来欢迎我们。出机场后，又遇上了成千自发地来欢迎我们的香港同胞。他们和运动员又握手，又拥抱，唱歌、高呼口号，情景感人。

代表团在香港住了5天，新华社梁、祁社长及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等分别为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白天，代表团中的运动员分别到工厂、学校为工人、学生做乒乓球表演。九龙的有关方面为了应付广大群众观看乒乓球表演的要求，专门修了一个能坐2000人的大棚子。观看比赛的群众情绪高涨，气氛热烈。

代表团离开香港时，成千上万的同胞夹道欢送代表团，争先恐后地与代表团成员握手、拥抱。更为感人的是有300多名同胞陪代表团一起乘火车到深圳。我们要分开时，难分难舍，热泪滚滚。

代表团到广州时，广东省的党政军领导到车站热烈欢迎。他们纷纷说：“代表团取得了政治、技术双丰收胜利。”此时我的心情用我在香港写的一首诗来表达，是最恰当不

过了：

终出牛棚心不静，蹉跎岁月愤难平。

总理给我交重任，率领球队到东瀛。

乒乓外交举世惊，赛场内外传友情。

发出小球转地球，中美关系化坚冰。

哪知回国后又遇上一个小小的波澜。

八、赛后余波

出国参赛前，有关领导对我队一旦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相遇时的对策，从中朝友谊的大局出发，曾研究过一个意见。由于我当时刚刚工作，负责此事的同志并未告诉我，结果在比赛中，我队一个主力队员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的一个主力队员淘汰了。在比赛前，我曾考虑过是否“让”一下，但有个同志说：“世界比赛哪有让他国之理”，我觉得也对，便未坚持。回国后总理问及此事，我主动承担了责任。后来总理了解到我确实不知道情况，气就不那么大了。但他又批评了我另一件事。比赛结束后，中日两队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中日双方各派4名男运动员、4名女运动员参加。教练问我如何打，我想反正是友谊比赛，就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结果把日本男女队员全打败了。在场的日本朋友都有点面子上下不来。回国后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批评我说：“已定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你为什么‘八仙过海’啊？”总理对李先念同志说：“赵正洪是你的老部下，是跟你过祁连山

到新疆的老同志啦，你也批评批评他。”李先念同志说：“赵正洪啊，赵正洪，你哪来那么多旧东西呢？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要好好认识错误。”

我检讨了自己没有贯彻执行总理关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指示所犯锦标主义的错误。周总理接着严厉地批评了知道情况的有关方面负责人。他说要派人到朝鲜赔礼道歉，“负荆请罪”。

后来由我、韩念龙、宋中以及那位我国运动员一起到了朝鲜。我们受到朝鲜方面的热烈欢迎，住到平壤郊区的一个高级宾馆里。到后第三天，金日成主席接见了我们。首先是韩念龙同志把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决定我们来朝鲜的意思报告了金日成主席，接着我国那位运动员表示了歉意。我马上接着说：“我是团长，没有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这是我的错。”金日成同志马上插话：“你说的不对，你当团长，你们党和国家叫你带队出去比赛，光打败仗行吗？比赛都想战胜对方，这是人之常情嘛。就连老子和儿子下棋也是谁也不让谁嘛！在世界锦标赛上，哪有一个国家愿意输给另一个国家，没有这个道理嘛。在比赛的时候，你当运动员，谁让谁呀！我理解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中朝两党、两国友谊做出的努力。请转告他们，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牢不可破的！”金日成同志的一番话反映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当天晚上，朝鲜外交部长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欢送我们。我们圆满地完成了那次“负荆请罪”的外交使命。

事隔 20 年了，事后想想，那次中国乒乓球队出师东瀛，决不仅仅是与美国队开展了“乒乓外交”。实际上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毛主席、周总理之所以为全队定下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基调，就是以体育作为整个外交政策的突破口。我们在这次比赛中还拒绝与朗诺集团对垒，庄则栋对记者发表的不与朗诺集团队员比赛的声明，影响很大。这样的比赛的确要服从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我们在比赛中不仅仅对美国开展了“乒乓外交”，应当说中国队从出国比赛之日起，中国对世界的“乒乓外交”就开始了。重温这一段历史，对我们今天进行改革、开放，也是有其借鉴作用的。我相信，后来者在评价还将举行的一届又一届乒乓球世界锦标赛时，一定会特别关注第 31 届，因为那一次球桌上的“乒乓”声的确震动了世界。

（责任编辑 邢济萍）

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及图书 出版发行的封锁与反封锁斗争

左明德

我参加《新华日报》工作是在1939年5月3、4日重庆遭到日机大轰炸之前，我主要是学习做报纸对外埠的发行工作，也在图书课主任徐君曼同志领导下和夏福一起兼售图书杂志，以后又陆续多次参与反封锁斗争。

1938年10月底，报馆从武汉撤退到重庆，营业部的门市一时没有选到适当的地方，就先在苍坪街69号（即现在邹容路味宛饭店楼下）落脚。从街平面下20级石梯才是大门，门口既是收发室，又是过道，面积不到20平方米。在这狭窄的地方，摆了三个阅览书架，把图书杂志陈列在上面，让读者来订阅报纸、刊登广告时选购。我记得书籍中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的抗战言论集，生活书店出版的少量图书，以及《解放》、《群众》、《全民抗战》等杂志。翻译书有《法兰西内战》、《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等。

《新华日报》1937年8月在南京筹备创刊时，就积极筹备出版一本《群众》周刊，这个周刊后来于当年12月初在武汉创刊出版，而《新华日报》到比它晚出版一个月。

《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创刊后，不久就相继

出版了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吴玉章等同志抗战言论集和《新华日报》的社论集。

1939年5月3、4日，日寇对重庆大轰炸，《新华日报》在苍坪街的营业部也被炸毁。这时，由于日机狂轰滥炸，重庆各大报多数已不能继续出版，国民党中央宣部要求各报立即疏散搬迁到郊区去建立编辑部、印刷厂，主张十家报纸在疏散期中组织出版《联合版》。同时还阴谋借此取消我们报纸今后独立存在继续出版的权利。周恩来同志特指示社长潘梓年去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伦，当面递交我们对“联合出报”的书面意见，要他保证我们在迁建条件成熟具有单独能力后，退出重庆各报《联合版》（参加《联合版》后十家报馆每家去编辑和发行一周）。当年“八·一三”抗战两周年纪念时，我们已在化龙桥虎头岩下建好了印刷厂和部分编辑用房，于是就复刊单独出版了。

在报馆迁建过程中，我们还把西三街二号原报馆的编辑部和印刷厂改建成门市部，并充实发售图书杂志的品种。年底这个地方也被炸毁。1940年初我们报馆营业部的门市就搬到民生路208号（即现在的《新华日报》纪念馆）去营业了。

《新华日报》每天出版一张对开四版的日报。1939年5月3、4日大轰炸后，我们除参加《联合版》，每两天还出版一中张油印简要重要新闻和评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报馆执行党中央确定的“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政策，为了防止突然事变，减少牺牲，对职工进行疏散。有的在国内投靠亲友，有的疏散到香港和南洋各

地，留下 80 人精干力量，坚持出版，因而从 2 月 1 日起改出一中张日报（四开）。到 1941 年 6 月 24 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内形势有所好转，被疏散的大部分同志逐渐返回报馆。从 9 月又恢复出版一大张，每周还出版一期《群众》周刊，并编印《解放》选刊。同时出版自己编印的书籍，比如《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论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团结到底》、《论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宪政》、《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吴玉章、周恩来、项英、聂荣臻等同志的抗战言论集，其中多数是用延安解放社、播种社，以及中国出版社、新华书店名义出版的。中国出版社是新知书店的另一名称，没有写明出版社地址。因为国民党中宣部的图书杂志委员会规定，就地出版的图书杂志的原稿，必须在出版前送审，批准后才能出版。用外地出版社的名义就不用过这关了。这些书包括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尔基等人的著作，都是在《新华日报》翻印和重排出版的，比如马恩合著的《社会主义入门》、《共产党宣言》，《列宁选集》（16 卷本），《斯大林选集》（5 卷本），《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季米特洛夫著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当前问题》、《为和平而斗争的统一战线问题》，凯丰译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共产党（布）党章的修改》、《什么是列宁主义》（1—4 分册），伏洛希罗夫写的《斯大林论红军》，徐冰译的《列宁主义问题》，艾思奇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唯物史观的通信》，恩格斯

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恩论中国》，艾思奇写的《哲学选集》，陈昌浩写的《近代世界革命史》（第一、二卷），斯诺写的《毛泽东自传》、《斯大林与中国苏维埃》、《中国的红区》等，雅洛曼洛夫的《列宁主义初步》，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洛甫（张闻天）的《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的一致》、《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冯文彬写的《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戈宝权写的《论现代战争的性质》和他所翻译的《联共（布）第十八次党代会》的文件。解放社还出版了《十年红军》、《论政党》、《陕甘边区的共产党》、《游击队基本动作教程》、《红色文献》、《整风文献》、《解放文选》、《论反帝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青年战线》、《西北特区抗战动员记》、《战略与策略》、《八路军的战斗生活》等。何干之、余国林等著《社会科学基础教程》，华岗写的《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论新民主主义》。杂志有《中国工人》、《中国青年》（半月刊）、《中国妇女》、《军政杂志》（八路军政治部编）、《解放》等。还有古元的《木刻画集》，冼星海的《抗战歌曲选》，《新华日报》合订本，《新华副刊》合订本。

上述书籍及杂志都先后在《新华日报》营业部的门市上发售。

我们门市部还发售了生活书店出版的章汉夫、许涤新合译的《恩格斯论“资本论”》，王唯真译的列宁写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徐懋庸译的《列宁家书集》，杨作材译的《列宁谈战争论笔记》，吴黎平译的《反

杜林论》、《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论丛》，钱亦石译的恩格斯从德文译成英文的《德国农民战争》，沈志远译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柯柏年译的马克思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还有青年自学丛书，如艾思奇写的《思想方法论》、平心著的《社会科学研究法》、汉夫著的《政治常识讲话》、钱俊瑞著的《怎样研究中国经济学》、沈志远著的《新经济学大纲》、柳湜写的《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胡绳著的《辩证唯物论入门》及《新哲学的人生观》、钱亦石写的《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薛暮桥著的《经济学》、茅盾著的《创作的准备》、孙起孟著的《写作方法论》等。

还发售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后去掉了“生活”两字）出版的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全三卷本）、郭大力译的马克思著、恩格斯编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全三卷）和《马恩通信集》、陈晓时、潘蕙田合译的列宁著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章汉夫译的《恩格斯论资本论》、徐冰译的列宁著的《社会主义与战争》、欧阳凡海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何封译的恩格斯等著的《卡尔·马克思》、冰生译的列宁著的《克劳塞维兹的〈战争论〉笔记》、楼适夷译的马恩著的《科学艺术论》、焦敏之译的《列宁战争论》、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此书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印行了36版，发行量大，影响深远）。

还发售了新知书店出版的书籍；如吴清友译的列宁著的《帝国主义论》（增订本）、方乃宜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什么是马克

思主义》、成仿吾译的新版《共产党宣言》等。

以上是发售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军事、经济等学说的重要著作。同时还发售过国内外著名的文学作品。外国的作品如《母亲》、《童年》、《静静的顿河》、《铁流》、《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战争与和平》、《复活》、《时间呀，前进》、《前线》（剧本）、《铁木儿及其伙伴》、《虎皮武士》（格鲁吉亚的民族史诗）、《圣诞节的故事》、《普希金文集》、《死魂灵》、《高尔基创作选集》、《冰岛渔夫》、《安娜卡列尼娜》、《简爱》等。国内的作品如《鲁迅全集》及其《且介亭杂文》、《阿Q正传》和译作《小约翰》、《桃色的云》，郭沫若的《创造十年》、《青铜时代》、《反正前后》、《沫若文选》、《漂流三部曲》、《沫若诗集》、《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和著名历史剧本《屈原》、《棠棣之花》、《孔雀胆》、《虎符》及《沫若小说戏曲集》等，邹韬奋的《经历》、《患难余生记》、《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瞿秋白的《饿乡游记》、《海上述林》，茅盾的《子夜》、《蚀》、《虹》、《幻灭》、《追求》、《三人行》，巴金的《家》、《春》、《秋》。其他作家、学术专家的名著与专著，如张友渔、邓初民、范文澜、翦伯赞、杜重远、陈白尘、阳翰笙、夏衍、胡风、艾青、臧克家、艾芜、沙汀、肖军、肖红、葛一虹、司马文森、丁玲、冰心、端木蕻良、叶圣陶、洪深、叶浅予、曹禺、侯外庐、韩幽桐、曹靖华、冼星海、光未然、老舍、张天翼、刘白羽、欧阳予倩、黄炎培、李公朴、陶行知、姚雪垠、孔罗荪、邵荃麟等人的著作和翻译作品在《新华日报》营业

部门市都曾发售过。

生活书店是邹韬奋创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是李公朴创办的，但两机构主要领导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张友渔、徐伯昕、吉少甫、仲秋元等同志先后在生活书店任总编辑、经理等职。黄洛峰任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时间达8年多，柳湜、艾思奇负责编辑工作。新知书店是钱俊瑞、姜君辰、薛暮桥、石西民、孙治方、徐雪寒、华应申等同志发起创办的，钱俊瑞任董事长，姜君辰任总编辑，徐雪寒、岳中俊前后任经理。群益出版社是郭沫若创办的，郭老任董事长，董事有冯乃超、阳翰笙、于立群、胡克林，冯克熙、郭培谦先后任经理，刘盛亚负责编辑工作，屈楚任副经理，吉少甫同志也参加了这个社的工作，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分社的经理。

上述四家出版社和书店，都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在武汉时期和重庆时期，周恩来、董老、凯丰都曾亲自指示他们如何开展业务，搞好文化战线上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好出版工作。南方局文委徐冰、张友渔、张颖、陈舜瑶、张晓梅负责，先后分别同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的有关负责人徐伯昕、黄洛峰、徐雪寒接触，研究形势和对策。1940年夏初周恩来约请徐、黄、徐三人去红岩村谈话，这时正是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期。谈话指出要准备应付反共逆流的到来，要他们以民间企业形式把书店办好，并要他们筹集资金，派出干部，去延安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开展业务。皖南事变后又是周恩来关怀这三个书店（出版社）如何应付危局，把书

店（出版社）同仁分一、二、三线，有计划地撤退隐蔽。邹韬奋转移去香港，就是周恩来亲自作了周密安排：派人护送去桂林，并致函李济深先生协助邹去香港。这三个书店（出版社）实际上是党的出版机构（现中央组织部已明确决定，凡书店〈出版社〉的同志都从参加之日起算参加革命工作），而且它们的创立都比《新华日报》早。它们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进行 10 年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中在上海诞生的，和抗战初期才创办的《新华日报》实际上是“兄弟关系”。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进步图书杂志的编辑出版上，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着革命作用并互相支持。凡它们（包括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及 1942 年开办的群益出版社和国讯书店）所出版的图书、杂志，我们门市部均公开销售，反动派不让销售的查禁的图书，我们也设法销售。

党在出版战线上的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通过三家书店（出版社）去进行的。1943 年以三联书店为核心，联系团结了 21 家政治态度较进步的书店，联合发表了一个争取出版自由的紧急呼吁书，在《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接着于 12 月又成立了一个新出版业总管理处，黄洛峰为董事长，上海杂志公司张静庐为总经理。通过这个联营组织宣传和执行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主张。当然，其方法是采取特殊的形式，用迂回曲折的隐晦的方法，使参加者都能接受。因为团结抗日，要求民主，是人心所向，所以这个组织后来发展到有 55 家出版社和书店。1945 年 6 月 14 日

又以这一组织名义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个出版业的紧急呼吁：要求国民党平价供应纸张；限制书刊费用的猛涨；取消邮局教育图书小包收费办法；设立出版业贷款机构等。这些呼声是出版业同仁的共同心愿。1946年1月2日，又向正在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提交了意见书。《新华日报》1月9日发表了这个意见书，列举了国民党对进步书刊限制的事实，并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做到：废止出版法；取消书刊登记办法；撤销收复区的出版检查办法；明令取消一切非法检扣书刊办法；取消寄递限制等。这个文件是采取彻底揭露和严正抗议的方式提出的，所以要求各家出版社、书店自愿签名联署，结果有29家参加了，表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出版业是富有成果的。

在抗战胜利前夕，又成立了以“三联书店”为核心的出版业联谊会。这个会的活动方式是采取联欢、聚餐会的形式进行的。报馆图书课主任徐君曼同志，有时也以客人身份应邀参加。因这个会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把持的书业同业公会相对抗的，《新华日报》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报，如果对此不采取回避态度，反动派就有借口说是共产党操纵的组织，好对它进行镇压和迫害。

《新华日报》在宣传舆论上对新书业的正当要求即反对国民党对书刊言论的禁锢和对书刊从业人员的迫害，是给予极大支持和关注的。为此发表了社论，题为《打破法西斯的出版法》，并率先实行对报纸新闻、书刊原稿在发表前送审办法的“抗检”，号召新闻、出版同业响应“抗检”作法。这样很快就形成一个抗检运动，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宣

布自 10 月 1 日起废止图书新闻检查。这个重大胜利，也显示了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当时，不少出版社、书店宣传进步书刊的发行广告，其它报纸拒登或不敢登，我们就把这些书刊发行广告接受下来，刊登在显著位置，并在广告费上给予优待。

在《新华日报》的“新华副刊”上，还对进步的革命的书刊和影剧进行评介与组织讨论。比如对郭沫若的历史名剧《屈原》，是周恩来同志指示张颖同志组织的剧评，《新华日报》用不少版面连续几天发表对《屈原》剧的评介。对阳翰笙写的《天国春秋》也是这样做的，声势比对《屈原》稍小一点。从而扩大了历史剧以古喻今、借古说今的现实政治的意义。对其它革命书刊《新华日报》也向读者推荐和评介。对不少重要小说名著和翻译作品，以及对理论专著也是组织了评介的，藉以帮助读者选购所需图书和协助出版社、书店搞好推销发行工作。

在黄洛峰、徐伯昕、徐雪寒三同志（以“三联书店”为核心）所组织起来的“联营书店”和“出版业联谊会”活动时，我们新华日报的同志没有公开的以同业人员身份去参加活动，以免授柄予反动派。只有当他们进行大型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去参加时，我们社长和记者才去参加。通常我们只是以报纸为媒介作政策方针的指导和舆论的声援。

我们门市部除销售当时各书店、出版社出版的进步的政治、经济、文艺图书外，也销售他们出版的科技读物、青年丛书、儿童读物和知识性较强有实用性的参考书及古典

文学书。销售的期刊杂志有生活书店出版的《全民抗战》、《读书月报》、《学习生活》、《文艺阵地》、《妇女生活》、《世界知识》等，读书出版社出版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新音乐》、《文学月报》等，国讯书店出版的《国讯》旬刊、《宪政》月刊，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开明少年》，新知书店出版的《民主》周刊、《现代妇女》、《音乐艺术》、《少年学园》，中苏文协出版的《中苏文化》，张志让主编的《学生导报》，民主同盟主编的《再生》周刊，中外出版社出版的《文汇周报》、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出版的《文萃》半月刊，蒋一苇主编的《人物》杂志等。

《新华日报》门市部还销售苏联外文出版局出版的中文和英文书刊，是由苏联外贸部对外粮食局批发给报馆的，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精装本），列宁著的《左派幼稚病》、《进一步，退两步》、《帝国主义论》、《怎么办》，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高尔基的《母亲》、《童年》，李敏（李立三）译的《考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等等。苏联出版的书籍，内文用纸较高级，印刷质量好，装帧设计很讲究，价格便宜，颇受读者欢迎。

《新华日报》营业部门市部在重庆期间，集中地发售了自己出版的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及其文艺思想的书刊，也集中地发售了在国民党统治下一批进步的革命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的著作。他们在政治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十分恶劣的境况中，辛勤地创作和著述了各类专著。

读者走进《新华日报》门市部，就感到跨进了另一个

世界。从这里可选购到所需要的各种革命书籍和杂志。《新华日报》门市部被读者喻为照耀人们奋发上进的一束革命的火把。

桂林、昆明、成都的营业分处和北碚、歌乐山的发行站也同样发售报馆出版的和其它进步出版社、书店出版的图书、杂志，甚至读者需要买书，但又不便去门市部选购，我们的报丁报童也可替他代买。

我们门市部的宗旨，就是忠诚热情地为读者服务。在图书陈列和书架的设计上，都要考虑怎样才方便读者。开架售书，让读者在书架上自由选购。门市服务员对读者来门市不论买书与否，都是热情接待，做到有问必答，帮助读者选购图书。他们善于察言观色，从到门市部来的人群中，要识别有无特务分子混在里面，若发现有鬼祟分子，就用各种机灵手法，告诉读者们这里有“狗”，要注意安全，以防“恶狗”伤人。同时要警惕他们把反动印刷品放在陈列的图书内，并防止他们暗藏爆炸器破坏我们。总之，要切实保护读者的安全。

图书课还办理邮购业务，外地读者来信要购的图书，只要信到就给他邮寄去，而且在寄书时用私人名义，并在有些书的封面上作出伪装，包装上也作到认真捆扎。

对《新华日报》门市部的存在，反动派是恨之入骨的。他们借口所谓“内容荒谬”、“曲解国父遗教”、“曲解三民主义”、“宣传赤化”、“诬蔑本党”（即国民党）、“鼓动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诽谤领袖”（指对蒋介石）、“诬蔑现行军政官吏”、“违背抗战国策”、“违犯书刊检查法”等

等理由，查禁没收进步书刊，甚至封闭出版社、书店，强迫停业，拘捕迫害从业人员。“生活书店”在1940年6月前，全国有56处分、支店，其后，半年内就有40余处分、支店被查封或被迫停业。仅存的几个分、支店，从业人员也有数十人被捕。西安分店经理被绑架失踪。到皖南事变后不到半年，就仅存重庆总店一家了。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也遭到同样的摧残。反动派对《新华日报》也如法炮制，勒令我们先将原稿送审后才能出版发表，否则也采取查禁、警告、没收的处分。1938年8月24日武汉警备司令郭忏规定报刊一律送检的规定代电、蒋介石于1939年1月9日发出禁止宣传八路军战绩的代电，借口“一切部队行动与作战经过，尤应绝对严守机密，不得任意转载”，要一切报刊和《新华日报》“切实注意，勿得故违，否则嗣后如再发现此类记载，应严加处分。”由于全国人民要团结、要抗日、要民主、要自由，反对法西斯独裁专制，蒋介石和他的反动的国家机器虽对我们滥施淫威，极力摧残、迫害，但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查封《新华日报》。可是，反动派却不愿善罢甘休。从1938年2月起至1945年12月止，国民党政府以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战时新闻检查局、重庆市新闻检查处、重庆卫戍司令部等名义，对《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发出要“原稿送审”和“拒检不妥”、发表“泄密”消息、“言论不妥”、不准在书、报、刊上发表以“八路军”名义的战绩、禁止“赞扬共产党之宣传文字”、“八路军朱德总司令来渝不予宣传”、毛泽东对新闻记者的谈话“要检扣不能发行”等，共发出手谕、警告

250 余件之多，处分停刊、删改、检扣原稿那就更难计数了。1946 年 2 月 22 日他们在重庆发动反苏反共大游行时，也唆使特务，收买暴徒捣毁了报馆民生路门市部，并把营业部主任杨黎原、图书课主任徐君曼、营业员管佑民三同志打成重伤。

国民党中宣部 1938 年 8 月至 1939 年 10 月，多次密电广州、西安、成都、桂林、昆明等地不准我们寄纸型去翻印，要内政部在航空公司没收我们寄出的纸型。1939 年 9 月查封了我们宜昌分销处，1940 年又查封了自流井、内江、万县（新华日报）的分销处，并借抢米事件捣毁成都营业分处，逮捕了分处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洪希宗等同志（罗、车两烈士于 1949 年牺牲于渣滓洞，洪当时送重庆途中被沉入沱江河中）。他们三人先后被反动派杀害了，成为千古留名的烈士，我们至今还深怀悼念之情。

从 1939 年起到 1943 年 7 月止，国民党中宣部、图书杂志委员会、重庆市警察局直接向我们发出搜查检扣、查禁、警告不准销售革命书刊的命令、通知达 15 次之多。

1939 年 6 月，国民党重庆市执委会查抄我《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 12 种共 501 册，7 月又在西三街门市部查抄《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700 册。一天下午，罗戈东同志和我在门市部服务，因我年青，缺乏同狡猾的敌人作斗争的经验，一个穿长袍的面带“善意”的人在门市部东翻西选似要急着买好书。他拿着《毛泽东言论选集》、《中国革命运动史》、《我们怎样打敌人》、《论反帝统一战线》和《解放》杂志等，向我要买。他还说这些书好，每种都要多

买几本。我以为他是外州县来的书商，就打开书柜去取，他一看到藏书的地方，马上就露出真面目，亮出检查证，说要没收这些书刊。这次被没收走的《毛选》1542本、《解放》杂志804本、《论反帝统一战线》17本、华岗写的《中国革命运动史》4本、朱德的《我们怎样打敌人》49本、《法西斯走狗》15本。这次给我的教训是很大的。我感到十分难过。看着特务叫三辆黄包车（人力车）把书拉走了，心中怒火直冒，同他们争吵，争夺被没收的部分书刊，但无济于事。他们还发展到搜查我们职工宿舍。为此，报馆潘梓年社长7月24日向李济深（他是同情我党的国民党左派）领导的战地党政委员会写了抗议信，指出：“《新华日报》营业部近日有便衣检查员前来查抄经营图书，纷扰情形，日甚一日”，“惟查禁手续，实有欠妥之处”，“何书可售，何书在禁”，“检查员查书时，不事通知，到辄随意乱翻书架、书摊。一时秩序大乱，且使宵小有机可乘，常生趁火打劫之弊。”“往往今日可售，明日突被查禁；亦有今日被抄者，明日又复可售。”检查员“他可任意抄走图书，他可任意闯入职员宿舍，指挥宪警任意搜查，即私人笥篋，亦所不免”。书业同人则“受不到任何法律之保障，终日惶惶不宁。市面无治安可言，居处无自由可保，道路侧目，闻者裂眦。文化界之服务人员，若同囹圄之拘捕人犯，此岂国家检查图书之初意，保障人民民主自由所容许？……恳祈主张公道，以伸冤抑而平民愤。”1941年11月4日重庆市图书审查委员会又抄走我们的进步书刊28种854册。而那零星搜走的就难以计算了。1940年深夜，在磁器口高峰

寺印刷分所，我报印刷分所职工林肖碇（离休前是《红旗》杂志社副总编兼秘书长）同志等 13 人，被国民党特务捆去。后经周恩来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抗议，上述 13 人才于 3 月 4 日在土桥监所释放。国民党还多次搜查我化龙桥印刷厂的装订车间，凡是他们认为该查禁的书刊，在未成书本之前，也被搜走没收。

仅国民党留下的档案中有案可查的，从 1938 年 8 月起至 1945 年 8 月止，以《新华日报》、解放社、播种社、新华书店名义出版的图书被查禁的有 130 多种。加上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群益出版社、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国讯书店等被查禁的图书、杂志、刊物、报纸在内，经统计，书籍有 2548 种，翻译作品 68 种，报刊 151 种，歌曲戏剧 54 种，图画影集 12 种。

反动派妄图禁锢舆论，钳制思想，是办不到的。他们查禁了那么多的图书报刊，但在革命的进步的出版社、书店的从业人员，采取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法，不怕苦，不畏死，苦心经营，革命进步的书刊照样出版发行。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文化界、出版界知名人士云集重庆。在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以及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的直接领导下，历尽艰辛出版了许多普及读物和有价值的书刊，以宣传团结抗日，开发民智。南方局的文委（也称过文化组）是徐冰、张友渔、何其芳、张颖、陈舜瑶、张晓梅、张剑虹等同志先后代表南方局具体同中华全国文艺界、戏剧界、诗歌、木刻、音乐等各抗敌协会往

来联络；政治、经济界，是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许涤新同志同经济界人士往来密切。郭沫若先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1年起又以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团结了大批地下党和非党的进步知名人士，如茅盾、邹韬奋、胡愈之、阳翰笙、冯乃超、夏衍、胡风、黄洛峰、徐雪寒、徐伯昕、巴金、叶圣陶、李公朴、沈志远、张申府、侯外庐、翦伯赞、张志让、周谷城等共同推动文化艺术界的革命活动，发展抗战文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发展壮大统一战线力量。而在这方面，《新华日报》则是这条战线的中坚力量。它是共产党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机关报，在传播与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击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反共、反人民逆流及其对人民进行文化“围剿”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两股力量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条强大的反对国民党进行文化“围剿”的统一战线，成为一个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孤立反动派的坚强堡垒。在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派除了用它的反动国家机器对进步力量进行法西斯的摧残、迫害外，在政治、文化、军事、经济、艺术等方面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包括形象思维的斗争，他们都显得十分贫乏和无力，处于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的状态。

在这条战线上，《新华日报》是公开的同国民党反动派相对垒的力量，而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以及1942年成立的群益出版社，则是以民间组织形式出现的，但他们和《新华日报》是同一条战线的同盟军，是患难与

共、同舟共济的兄弟关系，是互相依存、相互支持共进退的战友。正是由于这条文化战线成功地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进行了反击，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提高了识别谁代表真理、代表进步，谁是时代的前进动力的能力，知道跟谁走才有光明前途。所以当反动派违背全民族的利益于1946年7月发动全面内战之际，全国民心是向着共产党的。又经过三年多的较量，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统治就土崩瓦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这标志着在文武两条战线上，我们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伟大的功绩应永载史册为后人所敬仰。

(责任编辑 汪 新)

李大钊与苏联及共产国际

黄 修 荣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一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的伟大爱国者，同时，又是一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忘我奋斗的伟大国际主义者。他是我国同情、支持和歌颂十月革命的第一人。十月革命爆发后不久，李大钊即著文热情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他把俄国十月革命比喻为“惊秋之桐叶”，“知运之鹃声”，认为正是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他满腔热情地号召人们“翘首以迎”这个革命所代表的“世界新文明之曙光。”^① 并且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②

李大钊也是中国最早关心共产国际成立的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列宁筹建新的国际组织期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对此没有什么反应。而李大钊却在中国最早认识到成立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①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出版。

② 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5号，1918年11月15日出版。

共产国际于 1919 年 3 月成立后，李大钊马上表示坚决支持，认为它是各种无产阶级国际组织中最进步、最富有世界革命精神的革命组织。他说：“‘第一国际大会’，到普法战后消灭了。‘第二国际大会’，很有马克思的精神，但是欧战一起，里头的会员大多数弃其主义而从事于战争，名虽存而实亡。‘第三国际大会’，曾在莫斯科开会，很能承继‘第一国际大会’，而有世界革命的精神”，比过去又前进了一步。^①李大钊称赞共产国际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他在中国积极宣传和认真研究共产国际，组织了“布尔什维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之研究”理论小组，并且还经常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曙光》等杂志和《晨报》上发表介绍共产国际和俄国革命的文章，热情赞扬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他认为“一九一九年成立的‘第三国际’，现方蓬蓬勃勃势力日大”，已经成为“国际大联合的基础”，^②今后的国际工人运动由于“有第三国际为之中枢，将来活动的势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扩大。”^③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者中最早同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建立联系的人。1920 年春，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的领导人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派

^① 李大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22 年 2 月 19 日），《李大钊文集》下册第 546—547 页。

^② 李大钊：《平民主义》（1923 年 1 月），《李大钊文集》下册第 602 页、603 页。

^③ 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1921 年 3 月），《李大钊文集》下册第 444 页。

俄共党员维金斯基等赴华，其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经北大俄籍教员柏烈伟和伊风阁的介绍，首先会见了李大钊。李大钊组织欢迎会、讲演会，热情地接待了这些来自苏俄的使者。维金斯基一行在北京期间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进步人士举行了多次座谈，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和苏俄的对外政策，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问题，并就党员的基本信念、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共产国际成立的经过、俄国革命情况及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座谈。他们都认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为了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李大钊介绍维金斯基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而随同维金斯基到北京的马迈耶夫则留在北京帮助筹备建党。1920年10月，李大钊在马迈耶夫的帮助下，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相继成立，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更趋成熟。

1924年6月，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从北京出发，经哈尔滨、满洲里乘火车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住莫斯科卢克斯大旅馆。他在苏联化名琴华逗留了半年之久，除了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外，还在苏联参观、访问和考察，向共产国际和苏联详细介绍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为中国革命事业争取国际援助而奔走呼号。

李大钊到苏联后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声明。7月11日，苏联《真理报》以《中国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为题刊载了这个声明。这个声明后来编入

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22次会议的记录中。

李大钊亲自起草的这个声明着重介绍了在中国建立国共合作问题。他认为自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拟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以来，东方各国共产党便依照这一提纲的原则进行了斗争。他列举了近一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大的事件，强调指出，中国的民族运动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李大钊在声明中还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阐述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和革命斗争情况。在谈到有关国共合作的情况时，李大钊说：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象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必须发动一个能联合所有群众活动的统一的政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所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我党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其目的是为了改组它，改变它的纲领，并使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左翼决定根据我们的建议改组这个党。”^① 1924年1月国民党进行了改组。从此“民族运动进入新阶段”。^②最后李大钊表示，希望以后能得到共产国际更多的关怀和帮助。

9月初，李大钊在列宁格勒参观时，看到该市40万工人给英国职工大会的电报稿，这封电报号召英国工人反对麦克唐纳政府干涉广东革命政府。9月5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工会代表在莫斯科劳动宫举行大会，洛佐夫斯基

^{①②}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90—91页，第91页。

发表长篇讲话，声讨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企图。同时，苏联和世界各地相继成立了“不许干涉中国协会”。这些都使他深受感动。9月中旬，李大钊接受了《工人莫斯科报》记者的采访。在谈话中，李大钊告诉苏联记者，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是国际帝国主义策划和支持的。同时“英国资本正在孙中山革命政府辖内的南方帮助受直系军阀支持的反动将领陈炯明去反对孙中山。”“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向工农群众说明这次内战的原因和性质。中国共产党在全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斗争的同时，将组织这些工农群众投入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并且指出：“南方孙中山的政策至今还不够明确。他本人尚未找到真正的依靠力量。”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彻底暴露了外国资本的全部阴谋”，这就“必定会帮助孙中山本人在工农群众中找到踏实牢固的基础。”^①

9月22日，苏联“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盛大集会。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国际援华反帝大会，英、法、日、苏等国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会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拉狄克作了《中国为什么发生内战》的报告，英、法等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在会上发了言。李大钊出席了这次大会。当他登上大会主席台时，会场上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他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呼吁国际无产阶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李华同志对〈工人莫斯科报〉记者的谈话》，《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

级援助中国革命。他再次谈到：“中国人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落入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现在中国正进行着军阀混战，但这并不仅仅是军阀之间的战争，而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不断发展和扩大。”李大钊明确指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民族解放运动是不可能发展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正把革命知识分子、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他呼吁国际无产阶级援助中国革命。他说“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援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不能发展。只有无产阶级能起到革命领导者的作用。”^①

10月，李大钊在赤色职工国际机关刊物《赤色职工国际》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并再次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广东革命政府的问题。

李大钊在苏联逗留期间，亲自体验到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和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他于9月24日写了题为《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的通讯，刊登在11月19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这篇旅俄通讯记述了李大钊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参观游览受到热情接待的感受，介绍了苏联人民深切同情中国革命、反对英

^① 李大钊：《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24年9月22日），《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

美干涉中国革命的情形。

李大钊这次苏联之行，进一步领会了共产国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战略策略；介绍了中国革命情况，争取了国际援助；加深了对苏联的了解，密切了同苏联人民的联系，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国内出现了新情况。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李大钊早日回国。12月3日，李大钊从莫斯科启程回国。回国后，他亲自做冯玉祥及其部下的工作，并介绍苏联顾问鲍罗廷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结识冯玉祥，促使冯玉祥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并接纳共产党人在国民军中从事革命工作。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揭开了中苏关系的新篇章。李大钊为促进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为建立中苏两国革命者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为推动中苏邦交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行革命的外交政策。1917年12月，苏俄政府宣告废除沙皇政府同其他国家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外国的各种特权，表示了对被压迫人民的友好态度。1919年7月、1920年9月，苏俄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时代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在中国所攫取的一切特权，希望与中国政府谈判建交。苏俄政府的友好表示，受到李大钊和中国各阶层人民的赞扬，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1922年，北京政府表示要与苏联进行建交谈判。1923

年9月2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副人民委员加拉罕到达北京，准备与北京政府谈判有关签订条约、建立外交关系问题。9月9日，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组织召开了欢迎加拉罕的大会。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开展促进中苏建交的活动。他在文章中指出：“苏俄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是我们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中俄交涉的根本问题，即在缔结中俄两国的亲交”。^①由于北京政府缺乏诚意和帝国主义列强的阻挠破坏，加拉罕与北京政府代表王正廷的会谈时断时续，从1923年9月谈到1924年春，一直没有结果。李大钊约集北京大学教授马叙伦等47人，于1924年2月16日联名致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和中国全权代表王正廷，敦促北京政府立即恢复中苏邦交。

各界群众的强大呼声，迫使北京政府于3月14日草签了中苏协定大纲。但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阻挠和干涉下，北京政府又出尔反尔，收回已经准备签字的协定，迫使历时已久的谈判再次中断。北京政府悔约的消息传出，各界群众十分愤怒。李大钊亲自率领一个由北京大学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面见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质问北京政府为什么不批准中苏协定。在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市党组织的领导下，争取中苏签约的斗争不断发展。3月21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教育会、民权运动大同盟等9个团体联合发表抗议宣言。“督促政府立即无条件承认苏

^① 李大钊：《“大国民”的外交》（1923年9月16日），《李大钊文集》下册第664页。

俄”。^①3月28日，北大、师大等40多所学校的代表在北大召开紧急会议，议定第二天发动全体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都开始有所行动。迫于群众的压力和担心苏联与广东革命政府建交，北京政府终于在5月31日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与苏联正式恢复邦交，这对于两国人民都是有益的。中苏协定的签订，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军阀斗争的成果。同时，它的签订，同李大钊的积极组织和争取也是分不开的。

李大钊为了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但是反动派却对他恨之入骨。1927年4月6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将他逮捕。

李大钊被捕后，共产国际和苏联组织了强大的抗议示威活动。1927年4月12日下午，莫斯科10万工人、群众示威，抗议帝国主义伙同北京政府迫害李大钊的暴行。李大钊壮烈牺牲后，共产国际于5月1日发表声明，强烈抗议“世界帝国主义的雇佣刽子手，嗜血成性的中国绞刑吏军阀张作霖，秉承帝国主义的旨意，残酷地杀害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同志。”^②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的工农群众，“开展强大的抗议运动，反对这些威胁中国工人阶级和准备新战争的帝国主义绞杀者的新暴行！”与此同时，共

① 《晨报》，1924年3月22日。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年）》第1辑第296页。

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和苏联《真理报》也分别发表文章，谴责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暴行，号召中国工农大众和革命战士，高举革命红旗，继承烈士遗志，继续奋勇前进。

李大钊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忘我奋斗，孜孜不倦地宣传和捍卫十月革命的道路，不断密切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努力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不仅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也将永远活在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中。

（责任编辑 邢济萍）

抗战前夕彭德怀为争取东北军 和西北地方军队所做的贡献

蒋 宝 华

彭德怀是我党我军的一位久经考验的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在一生的戎马生涯中立下了无数震惊中外的赫赫战功，永远为人们所传诵。他还善于把军事斗争与实现党的战略策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抗日战争前夕为争取东北军与西北地方军队走上抗日道路所做的工作，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从此中国革命便以陕北为大本营而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国民党政府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日甚一日，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继续抽调重兵向陕甘根据地扑来，计有：蒋介石嫡系陈诚、汤恩伯指挥的中央军，西北地方军阀宁夏马鸿宾、马鸿逵的军队，杨虎城指挥的西北军以及东北军。其中东北军是实力仅次于中央军的一支

部队，有3个步兵军、1个骑兵军，每个军下辖5个师，共计30万兵力。

为分化瓦解来犯之敌，争取其停止内战枪口对外，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与政治委员毛泽东联名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向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受日本侵略者指挥的官兵提出：只要不打红军，不进攻陕甘苏区，红军便愿意和他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共同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还郑重声明，“不论哪一派军队，也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都一律欢迎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这一号召在敌军各部引起很大反响，为在陕北争取团结东北军和西北地方军队起了很大作用。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和加强党对东北军统战工作的领导。彭德怀因在前线指挥作战，未能参加瓦窑堡会议，但他完全拥护会议确定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彭德怀根据在前方指挥作战中所了解的情况，于1936年1月15日致电党中央，提出争取东北军的意见，他说：张学良、王以哲“因我们的胜利，其部队损失陕甘地盘问题，士兵及下级干部抗日情绪高（涨），可能与我们协作”，“应耐烦进行这一工作”。彭德怀此时已注意到争取张学良东北军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是从争取高福源开始的。人们都知道高福源在使红军与张学良建立联合抗日的关系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彭德怀争取教育高福源的历史过程却鲜为人知。

高福源是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一〇师一个主力团的团长。原系北京大学学生，后毕业于东北军官讲武堂，又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曾任张学良的卫队长，深受张的信任。高出于爱国民族意识，有强烈的抗日要求，在进攻陕甘苏区的一次战役中被红二十五军俘虏，扣押在瓦窑堡。

1935年12月，红一军团开始围攻甘泉，守敌为东北军一一〇七师。红军挖通了地道，发动多次攻击，均未成功。这时，彭德怀让把高福源送至前线指挥部，待之以礼。请他参观红军部队，观看部队文艺工作者演出的抗日节目；亲自到高的住处同他长谈，向他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出卖东北，利用‘剿共’削弱东北军，以致消灭东北军”的祸心；^①还向他宣传《八一宣言》和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经过彭德怀诚挚、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高福源逐渐认识到红军对抗日是真诚的，但对党的政策特别是国际主义政策还有许多疑虑，他提了出来，都得到了圆满解答。后复派政治部秘书长周桓继续做高的工作。高福源从与红军高级指挥员的接触中受到深刻教育，明白了许多从前不懂的道理，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① 彭德怀：《第三批简历材料》。

他表示愿意沟通红军与东北军一〇七师的关系，说服守军总指挥一〇七师参谋长刘汉东改变敌视红军的態度。彭德怀遂指派周桓同高福源一起来到甘泉。高向城内喊话，刘汉东让高进城面谈。高向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分析了东北军的困难处境，说明只有与红军联合抗日才是出路。同时了解到甘泉城内东北军生活很苦，吃烧难维持。高返回红军驻地后把此行经过做了汇报，彭德怀遂派周桓带着二三十垛子猪肉、牛羊肉和柴米，送给驻守甘泉的东北军，并进一步向刘汉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解答刘提出的许多问题，使红军与部分东北军的关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经过与共产党人的接触，高福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他对彭德怀说：“抗日救国大事要依靠共产党和红军”，“共产党是爱国爱民的”。^①1936年1月初，高福源来到彭德怀的住处，面陈他愿为红军与东北军谈判联合抗日问题而奔走的意愿。他说：我了解，东北军不仅下层官兵，就是张学良、王以哲也有抵抗日寇、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如果张、王能够了解红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可以同红军合作抗日的。“如果你们相信我，我愿回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停战，联合抗日。”

彭德怀答复说：“我们相信你！”

“你们真的相信我，敢放我回去吗？”

“军中无戏言，一言为定。”

^① 彭德怀：《第三批简历材料》。

“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一定不虚此行。”

“我们希望你能完成任务。”^①

高福源急于说服张学良，在谈话的第二天清晨就上路了。彭德怀派骑兵护送他到东北军王以哲六十七军防线边，另赠200元路费。

高福源经道佐铺到洛川。张学良见到高福源异常惊讶，原以为他已被杀。高把自己在红军中的感受全盘托出，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要求张学良放弃反共，与红军联合抗日。这时，张学良的思想已有了重大转变，认识到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行不通的，要求蒋停止内战，领导全国抗日。遂明确表示：你谈得很好，我同意你的意见。你要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我们正式进行商谈。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从洛川乘运送给养的飞机回到甘泉，骑马来到红军政治部，周桓热情地接待了他。高说：“我这次是奉命而来，张学良要面见你们的代表，共商抗日大计。他在洛川等候。”^②

彭德怀接到周桓的电话后，立即向瓦窑堡党中央请示，可否派人去同张学良会见。中央回电：可先从周桓、伍修权中选一人为代表，待证实张学良、王以哲确有诚意后，再派全权代表与张会谈。

① 彭德怀：《第三批简历材料》。

② 《访问周桓记录》，1985年4月18日。

这时，恰值李克农从道佐铺做情报工作归来，经党中央同意，彭德怀派李于1936年1月19日随同高福源一道前往洛川会见张学良，从而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的正式会谈。

高福源在中国共产党和东北军合作抗日的历史上，起了重要的牵线搭桥作用，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后高福源不幸被东北军内部某些不顾大局的人杀害。他的历史功绩，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李克农到达洛川后，毛泽东于1月20日致彭德怀要求即转李克农“万万火急电”，提出与张学良谈判的基本原则：1. “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2. “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危险的”；3. “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等。

1月21日，彭德怀在回答李克农的电报中指示关于谈判的几项具体策略：1. 向彼方表示：“凡属对抗日表示诚意，积极参加者，不问其党派、军队、团体以及个人过去行为如何，均表示欢迎”；2. 说明“目前共产党在政治上领导着中国民族革命，脱离日本的束缚，求得民族独立、领土完整，而不是在政权机关的专政”；3. 我方“诚推张学良”任抗日联军总司令，并“设法接济”“军饷械弹”；4. “凡属阻碍友军抗日行动者，红军须以实力援助”（友军）。

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第一次见面，便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为进一步会谈打下了基础。李克农在21日给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报中说：与张学良谈3个小时，张表示“如我

方果能站在诚意方面，彼愿意奔走”，“赴甘肃、南京方面斡旋，约期两周返”，届时如有成果则约彭德怀在延安、洛川见面。

2月中旬，李克农代表中共再次赴洛川，时张学良去南京，使与王以哲进行会谈。经过10多天真诚友好的谈判，2月28日双方取得谅解，红军先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就一致对日、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线、恢复通商关系等问题订立了局部口头协定。关于同东北军整个协定，待张学良返回后再议。

3月5日双方口头协定正式生效。彭德怀、毛泽东致电王以哲，说明关于双方口头协定，我方已通知红军及地方党政机关执行，要求他亦应通知甘、鄜、洛等地军政机关立即实行。指出此虽系口头协定，但双方出于抗日救国诚意，会比“寻常外交上之文字协定更为诚信无欺”。红军与六十七军订立和实施口头协定，加强了双方的了解和在抗日救国基础上的团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就抗日救国大计作进一步会谈创造了条件。

不久，中共中央确定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前去肤施^①与张学良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家之根本大计。3月16日，彭德怀与毛泽东致电王以哲，告知中共决定，对李克农由洛川返回石楼转告王以哲、张学良“对抗日救国有进一步之计划，甚以为慰”。

周恩来去肤施前夕，彭德怀、毛泽东于4月6日电告

^① 即延安。

王以哲：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等约于4月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到达肤施城东北20里之川口，待派人接入城内。此行安全望妥为布置。还就双方会议讨论的问题，提出了意见：

1. 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
2. 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进攻。
3. 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
4. 联合苏联，先派代表赴莫斯科联络。
5. 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等初步协定。

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举行了著名会谈，即延安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具有说服力地解答了张学良提出的各种问题。双方对联合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次会谈的成功对于西北地区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全国统一战线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会谈中，张学良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应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建议。中共经过考虑后，接受了张的意见，随即放弃了“反蒋抗日”而实行“逼蒋抗日”方针。

二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东征取得胜利后，回师陕北，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停战议和”的倡议，但蒋介石却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其嫡系部队、东北军、西北军以及西北地方军阀的部队，向陕甘苏区发动进攻。

1936年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组成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以下称西方野战军），开始了西征。

西征的任务是：打破蒋介石军队对陕甘苏区的进攻，重点消灭扰乱苏区的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开展宁夏局面，打通与苏联联系的路线；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争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以实现抗日作战。

在西征中，彭德怀十分重视统战工作。他在《西征中统战工作指示》（1936年8月30日）中指出，统一战线工作是“西征中战斗任务之一”和“消灭敌人的战斗任务一样的重要”。要求西方野战军以最大的力量做好这项工作。他在向西方野战军各级领导和政治部主任发出的指示中号召：

一、对统战工作应有正确认识。每个指战员要深刻认识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要依靠红军，而且要争取敌军到我们这边来。还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使民族革命战争发展起来，以实现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目的。

二、统一战线必须成为广大群众的运动。应抓紧一切机会，一切可能，向一切社会团体进行广泛的宣传与活动，在社会上造成舆论，使群众认识到只有接受红军的倡议才有出路。为做好这一工作，务须反对关门主义。

三、争取敌军工作，不仅依靠部队，而且还须动员社会各种力量来推动、加速完成。

四、大力培养干部。各级政治部立即在部队中挑选适

合作这项工作的同志，予以训练，使其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骨干，以便到地方进行有效的工作。

由于彭德怀的重视和强调，西方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都积极地展开了争取敌军的工作。他们给敌军官兵写信，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交战时向敌军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被俘的敌军经过教育后，归还武器，全部释放。如“在曲子、马岭、阜城几次战斗中，对俘虏的纪律是前所未有的”，“掏腰包、虐待的事，个别现象也未发现。”^①在前方，红军同东北军停了火，敌对的双方白天阵地上鸦雀无声，黑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的歌声，此起彼伏，从双方阵地上传出，唱到辛酸处，可以听到呜咽声，唱到愤怒处，可以听到激昂的咒骂声。这样，两军渐渐地互相熟悉起来，甚至在战地上开联欢会，变成共同要求抗日救亡的朋友，从而建立了友邻关系。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

彭德怀还身体力行，亲自做被俘敌军官兵的争取教育工作。据在直罗镇战斗时被俘的东北军于维哲（时任一〇九师通讯连长）、李鸿德（时任一〇九师营长）回忆：他们被俘后便受到了彭德怀司令员的接见，请他们吃饭，还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你们的家乡沦陷了，你们应当去打日本，收复失地，可你们受人欺骗来打我们。这责任不在你们，应由蒋介石来负，我们不追究你们。”他们在被

^① 彭德怀：《西征中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1936年7月5日。

送往瓦窑堡的途中还受到群众的欢迎，甚至连儿童团员也向他们讲解抗日道理。他们感到“自己连小孩都不如，真是惭愧极了”。俘虏们回去后，大部分表现得很好，向东北军官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在西征中，彭德怀还注意争取教育敌军的上层人士。西北军阀马鸿逵部下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性情暴躁，打仗强悍，为非作歹，人称“野骡子”。此人在据守陇东曲子镇时顽抗到底，受伤后被俘虏。他态度恶劣，不吃不喝，默不作声。我军还是每天给他冲洗伤口，上药，在生活上予以照顾。彭德怀亲自同冶谈话，讲抗日救国、停止内战的道理，后将冶氏夫妇释放。冶终于受到感动，态度有所变化，后来“在回族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起了某些作用。”^①

在西征中，彭德怀还继续做王以哲的工作。在与王以哲接触的过程中，彭德怀增加了对王的了解，认为“王对抗日态度诚恳”，同时也发现他对蒋介石的态度“甚软弱”，且易受其反共宣传的影响。据此，对王继续做了大量工作。在与王以哲达成口头协定之后，红军与六十七军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军事行动上彼此配合，相互支持。如1936年11月上旬，彭德怀在计划红军东进，消灭胡宗南一部之前，致电王以哲，说明“预旺堡于11月15日晨已空出，请速即进占，免为胡宗南部占领。”王以哲接到电报后，即派兵进驻了预旺堡。山城堡战斗前夕，为诱胡宗南先头部队深

① 彭德怀：《第三批简历材料》。

入红军阵地，彭德怀又电王以哲，陈述红军与东北军“休戚与共，相知在心”的关系，请他推迟进军速度。王以哲亦接受了这一要求，与红军配合行动。

山城堡战斗给蒋介石、胡宗南以沉重的打击，这对东北军来说，却有另外一种意义，使他们对红军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推动了东北军与红军进一步的合作。彭德怀于11月22日致电王以哲，指出山城堡战斗已将丁德隆师廖旅全部消灭，请继续予以协助，共同争取抗日前途。蒋介石不顾红军一再停止内战的呼吁，继续大举向苏区进攻，企图在消灭红军之后，再制裁东北军。所以东北军只有与红军“互相援助击破蒋军”，共同争取抗日前途，“才是民族革命之出路”。王以哲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在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逐步采取了与红军合作的立场，从而为西安事变的发动，做好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何柱国是东北军骑兵军长，下辖5个骑兵师，是东北军的主力之一。何柱国与蒋介石有来往，对红军敌意较深。1936年7月中旬，何乘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二中全会之机，遵照蒋介石的命令，调十六七个团的兵力沿甘肃清水河两岸，向红军驻地发动进攻。彭德怀当机立断，指出“对东北军在原则上不与之决战，多从政治上争取，但敌向我前进时，消灭其一部，也有必要。”^①7月14日，接到毛泽东电报：“对何柱国指挥进剿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

^① 彭德怀：《对东北军作战之策略及修筑野战工事》电报，1936年7月4日。

一部，这样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7月25日彭德怀致毛泽东电报称：“决定作战中心目标是何柱国，必须给他以严重痛打，才能解决问题。”当何柱国将其骑兵一部开进清水河七营以北红军驻地时，红军给以回击，消灭其一部。对所俘敌军官兵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后，归还武器，全部释放。大部被俘官兵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临走时纷纷表示：我们要再和红军打仗，就不算是中国人了。何柱国看到红军已有充分准备，张学良亦从南京返回西安，遂停止了进攻。

西安事变后，彭德怀认为这会“对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大的推动作用”，主张利用此机会压迫胡宗南西退，在运动中求得消灭其一部，恢复原有苏区，“巩固发展毛（炳文）、关（麟征）两军的统战工作，给张、杨两氏以支持，推动全国抗日怒潮”。^①他还认为从目前时局的发展看，有停止内战走向抗日战争的可能，而红军是抗战的最中坚力量，因此他主张目前应以最大努力扩大红军。为实现这一任务，他提出最好是建议张、杨所部全部进至渭水流域活动一时期。他们如不接受我方建议，则一方面军应以一军团进占宁县、枸邑，十五军团向三岔、马渠镇等地推进；四军、三十一军在合水、庆阳地区扩红。他还特别指出各兵团组织扩红队深入白区扩红时，必须注意“不打土豪，不

^① 彭德怀：《对西安事变后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意见向军委主席团的报告》，1936年12月13日。

破坏其政权和其他机关”，^①以巩固发展党在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

张学良放蒋后，党中央发电给彭德怀、任弼时，征求对时局的意见。彭、任经过慎重考虑，于12月28日，就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后的形势和推动抗日运动问题致电中央军委。他们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放了蒋介石，中国局势有走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较多可能，但美帝国主义的动摇态度，会影响南京。所以蒋介石回南京后，可能产生新的动摇，不过西安事变后，再组织大规模进攻红军的战役可能性小了，但蒋介石仍不会放松限制红军的发展。我们认为，应用最大力量和方法扩大红军，巩固抗日根据地，加强白区义勇军的发展，以实力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建成，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迅速发展。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科学地分析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据此提出了党今后斗争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与党中央在西安事变前后所采取的策略完全一致。后来彭德怀率红军主力驻在陕西三原、耀县地区，继续作了大量的争取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的统战工作，收到明显的成果，为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全民抗战，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责任编辑 邢济萍）

^① 彭德怀：《关于目前时局及与张杨交涉我行动部署，加强与开展扩红工作向军委主席团的报告》，1936年12月29日。

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军区的政治工作*

莫 文 骅

辽东的部队主要是从山东省胶东和鲁中地区来的，一部分是冀东的，另有几个连是从延安来的，干部各处都有。这一时期，战事频繁，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因此政治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在政治工作方面的主要作法是：

一、诉苦运动与立功运动相结合

1、立功与诉苦的提出

“诉苦”在沈阳撤退时就开始了，但只是在部队中零零碎碎地进行，未正式号召及系统地总结经验。

“立功”是1946年3月19日在本溪时提出的，当时建立了功劳簿并发奖章等，第二次迁到安东后仍继续进行。我们部队大多是从山东来的，部队虽是老成份多，但因根据地还未巩固，因此部队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中国人不愿打中国人”等糊涂想法。我们为了鼓励情绪，同时也看到苏联红军都挂有奖牌，而且，那时还有许多伪满军来的新兵，一下子不能从政治上给他们鼓励，因此采用了建

* 本文是1948年2月8日辽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在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汇报的一部分。题目为编者所加，发表时对全文作了一些修改。

立功劳簿发奖章的办法。我们当时也曾提出，能多缴敌人枪的发给钱，后感此办法不妥。在安东时还未形成一个热烈运动，但工作是有成绩的。退出安东后，吸收各方的经验，尤其是华东的立功经验，我们也提过能歼灭敌人一个班的给一个大功，但只是这样鼓励，以后慢慢就平淡了。

2、1947年3月军区政治部指示立功与诉苦相结合

4月2号发出这个指示，有些部队做了，有些部队未进行。当时所以这样提出，是因为在七师二十团九连发现了落后分子房天静的转变并立功，是由于诉苦启发了阶级仇恨。因此感到了诉苦对于启发阶级仇恨，提高复仇情绪能起重要作用。它使立功运动的内容更丰富了，而且也解决了许多思想问题，使“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论调得到了纠正，战争的目的明确了，部队情绪提高了。立功运动与诉苦运动相结合，使部队确立了保家报仇立功的思想，澄清了部队中的糊涂观念，改造了落后分子，新的积极分子不断涌现，部队得到巩固。

3、取得的经验

(1) 在夏季攻势后的政工会议上总结了经验，认识到：阶级教育是立功运动的基础，诉苦运动是进行阶级教育的有效方法。以阶级教育为基础，就能提高士气加强军队的建设。同时要防止教条主义的教育方法。首先要诉苦。这一经验对后来的全军诉苦立功运动起了思想指导作用。

(2) 立功运动贯彻以奖为主的方针

a. 从过去历史上看我们的政治工作，我以为中央苏维埃后期红军的教条宗派的政治工作路线不是以宣扬先进、

奖励为主，而是以斗争为主的。毛主席的思想则是以奖为主的方针。如陕甘宁边区英模运动及其各种工作皆是贯彻以奖为主的方针。

b. 以奖为主方针的好处：扶持了正气，发扬了自觉性，发挥了创造性，群众积极性提高了，人人争取进步。

c. 这样是否会妨害两条路线斗争呢？是否放弃了处罚呢？经验证明，只有发扬优点才能纠正缺点。我们过去的缺点是只简单地用立功运动来鼓励士气。现与诉苦相结合后，部队中就有新的气象。查功的同时也促使大家检讨并纠正了缺点。政工会议后，全军普遍进行立功、诉苦运动，并统一了立功条例，颁布了新奖励办法，提出了1000万元的立功费，各前后方部队、工厂、医院普遍开功臣会。现已接总部颁布的条例执行。

二、以阶级教育为基础开展政治工作

阶级教育以诉苦运动为基础，但诉苦不能完全代替阶级教育，还要进行土改教育。1946年“五四”指示和东北局“七七”决定发布时，部队初步进行了土改教育，并开展做群众工作，组织了工作团（四纵工作团的车学藻等后来成为坚持敌后的模范），军队抽调600多名干部下乡工作。但此时开始发现有人干涉土改，有些出身不好的干部顾虑自己的家庭。9月间召开了干部会反对这种倾向，号召全党干部要站在工农的立场上，不能说农民过火，不准干涉妨碍农民运动，会后引起了大家思想上的注意。

安东失守后，没有什么土地了，到临江后，地区缩小了，战斗频繁，与群众接近少了，因此，阶级教育也削弱

了。夏季攻势后地区又扩大了，土地斗争又轰轰烈烈地搞起来。这一热潮也影响到部队，但有一些人对土改缺乏正确认识，思想不通。7月13日，军区政治部下了训令，学习东北局“五五”决定和陈云政委关于发动群众的报告，并规定对个别庇护地富分子的人开展斗争，恢复民运工作组。

第一次政工会决定进行土改学习，以奖为主，以后发展到查功，查思想。进行土改学习以后，政治思想工作更深入了，诉苦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土改学习中解决了。如诉苦后，仍然会有宿命论观点及对谁养活谁、怎么穷的、怎么富的等问题不了解。尤其挖苦根进行不深刻的或诉苦“夹生”的单位还发现埋怨“诉苦没有用”的现象。有的人说打倒蒋介石，但打不动俘虏兵的心，因为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好的，孔祥熙不好。这可以证明诉苦不能完全解决思想问题。到土改学习时，才逐渐解决了苦从何处来的问题，认识到物资全被地主富农拿走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比以前提高了一步。这是否说学习土改政策思想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呢？也不是。还要清查思想，要树立仇恨地主思想，检讨忘本思想。但还有一个问题未解决：个人利益与阶级利益的关系怎么处理？为革命我死了怎么办？诉苦中到烈士灵前宣誓，苦都统统集中起来了，那面是地主、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压，这面是反对欺压，劳动人民都站起来了，这时生死的问题解决了，认清自己的奋斗牺牲是为了阶级的翻身，为了活，不是死。即使为阶级解放而牺牲，那也是光荣的。这才解决了生与死问题。诉苦中发现积极分子都因是提高了阶级觉悟。如九连诉苦9天出现24个积极分

子，到查阶级时又出现 17 个积极分子。我们在摸索过程中解决了这些问题后，政治工作就好展开了。

取得的成效：经过土改学习后，妨碍干涉土改的大大减少了，有个别妨碍土改的交地方群众处理，思想一时不通的也不能干涉群众运动。至此以后，拥干爱兵、拥政爱民现象大量涌现，部队中友爱加强了，阶级情感丰富了，天下穷人是一家。医院、工厂也都进行了诉苦（地方武装中的辽南独一师诉苦搞得较好），地方老百姓中的诉苦典型到医院作报告。诉苦后伤员与医院的同志相互慰劳，关系密切了。部队经过诉苦及土改教育后，实现战前诺言，热情学习军事，树立顽强的战斗作风（三纵提倡“硬骨头”作风）等工作也都开展起来了。但这是否说明一切问题都得到解决了呢？不是的。工作中还是有缺点和问题的。

领导土改学习中的问题：

（1）在教育工作中还存在一些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如四纵有一个连队开诉苦会，指导员说“大家有苦就诉”。结果有一战士诉苦哭着说：“我家在柳河住，父亲年龄大了没饭吃还要抬担架。”另外，有一解放战士则诉起在我军所受的苦来了。有些机关开始在文字里打圈子，如军大学土地法大纲，咬文嚼字。军政大学起初订教育计划时认为：干部在部队中都诉过苦了，再诉是否必要？大家都是干部，有文化应该学习理论，不必再诉苦了等等。后来这个思想克服了，还是进行了土改教育，收效很好。

（2）土改教育应坚决掌握以思想改造为主，不是以清洗打击为主，不能采用地方群众斗争的方式。我们对其它

地方来的经验是批判地接受不是硬搬。七师开始在执行这一问题上有所偏差，搞唯成份论有清洗思想，因此，有一排长跑了，地主成份的开小差的有45人。有的领导同志认为土改教育中“分化、过火是必然现象”。有的团政委说：“地主成份跑了没有关系，剩下我们工农自己干”。有一文化教员在训练场上被战士用枪瞄准，说是打地主。另有一个团准备洗刷的黑名单上就有100多人，幸亏得到及时纠正。在进行阶级教育中干部的思想状况主要是有家庭顾虑，有些人有地主富农思想。我们对出身不好的人，以思想教育为主，不同意用清洗的方法，那样会削弱战斗力。我把这种想法向军区党委作了汇报，得到同意。于是，我即去第七师纠正错误作法，后又给全军发了通知。

(3) 从土改学习发展到查成份坦白运动时，有假坦白者，还有个别单位在掌握政策方面犯了严重错误。如军直工兵营搞的“贫雇农路线”，他们晚上开了会，讨论决定“大权交给贫雇农”（指好的成份），第二天就开大会宣布，政治指导员过问此事，就将政治指导员赶走（他们是机械地搬用地方上的经验及晋绥连队贫雇农小组的作法），并扣押捆打了一些他们认为不坦白的战士。再如，卫生学校逮捕了62人，打了20个人，10个教员全部被捕。学校中有个别学员历史上有问题，东北局指示要整顿机关，我们还未指示怎样进行，他们自己就搞起来了。这个学校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东北入伍的，一部分是从胶东来的，曾被“抢救”过的；政委在延安也被“抢救”过，现又“抢救”别人，我们准备撤换。

三、加强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

军大有学员 800 人，中农成份占一半，地富成份占一半。军大提出目前的教育方针是阶级斗争还是思想教育呢？我们答复是以思想教育为主。

我们宣传队是在安东成立的，地主富农成份很多。从安东撤退后，他们也随着撤退，一般的是经过了生死考验。一次在通化，他们要求回家看看。我们事先对他们说希望不要袒护地主，别的也再没提什么了。他们回去后，帮助地方搞土改。有些家属害怕自己女儿回来捉她，吓的跑了。地富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可以革命的，当然也有个别反动的。清洗不应成为运动，个别极坏的才清洗。

干部成份：四纵团以上干部 103 人，地主成份两个，富农成份 8 个，其余皆是贫雇农、中农成份的（可能不准确，从有些同志发愁自己家里被斗的情绪上来看，是不确的）。另外，虽有些干部不是出身于地主富农，但还有地富思想，需要进行帮助。

四、政治工作与战术技术相结合

在过去我们感到伤亡很大，因此在四保临江时就提出战场爱兵的问题，即不仅从生活上照顾战士，而且要爱护战士的生命。

1、在夏季攻势开始的动员会上，就提出了政治工作与战术结合的问题。因是军队的政治工作，就必须与军事相结合。当时感觉到政治工作应提高一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引起了部队的注意，但还没有更明确的认识，也无很多经验。

在夏委攻势中，于南山场子击溃了敌 22 师，打了个胜仗，但我们也付出了代价，有 1000 人的伤亡。战后部队的情绪是很高的，但问题是我们有的伤亡是在第二线时还没有到冲锋出发地就被敌人的炮火给打掉了。打仗后干部与战士也在考虑怎样才能压住敌人的炮火，减少伤亡。有一个连队冲锋道路选择的好，伤亡很少，未选择好路的伤亡就很大。当时南山场子一仗的经验是很多的，只总结了一个：就是战斗情绪高，战术技术水平低。因而提出以后政治工作与战术技术相结合，但顾虑这总结让军事干部看到是不是会不高兴？因过去也曾打了好多胜仗，说战术水平低，恐怕是不高兴的，所以这个总结没有发。

在打下梅河口之后，伤亡也不少，而且有些伤亡是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有了这一次的体会，经验更充实了。就把那个指示在词句上修改了一下，发了下去，引起了部队的注意，开始想许多办法，如学打坦克等。

在这个时期，就是从诉苦、复仇到立功；但必须注意提高战术技术，否则不能打垮敌人。

2、夏季攻势后，为节省时间，同时召开军政会议。但两个会议中反映了两种情况：军事会议上一些师长们反映说，部队中以右倾情绪为主，今后主要应强调军事纪律。而政工会议上师主任们说，战斗情绪空前提高了，但战术技术差，今后应加紧进行阶级教育，开展立功运动，政治工作应与战术技术相结合，保证军事。

由于两个会议反映了两个矛盾的情况，会议就准备合起来开，讨论部队情况是以右倾为主还是情绪高昂。这时，

有的师长说：“师上不右倾，主要是营团两级右倾”，因此须强调纪律。后来大家又交换意见，军区负责同志也找个别师长谈，有的认为“战士情绪高，但干部主要是右倾的”，但又说不通，因为四保临江，打了许多胜仗，无法解释，但这一点必须弄清楚，因估计不对，则指导方向也会错的。尤其主要强调军纪更会发生毛病。最后结论认为，部队情绪高，战术技术差。思想统一了。当然战术水平低不能只怪军事干部，政工干部也须负责，而且这是一个新的问题。今后政治工作要保证战术技术水平的提高。

但也并不是说干部中就没有右倾情绪，如有人对师领导不满而不执行命令等。但这不是主要的，所以就没有提出主要强调纪律，而是强调阶级教育。

后来在秋季攻势中，政治工作与战术技术结合有了新的体验。有个连伤亡很大，指挥上缺点很多，但战士情绪很高。随后四纵产生了战评运动。

3、四纵的战评运动

为什么战评运动不发生在三纵而在四纵呢？这是因为四纵具有以下几点：

(1) 经过了诉苦、土改初步学习，阶级觉悟有了初步提高。

(2) 对夏季攻势经验进行了总结。

(3) 接受了华东评伤亡评技术的经验。但实行之后立即感觉到华东经验中由大家评伤亡是消极的，而且易引起波动；评技术又着重了战士个人的动作。应该着重于指挥战术问题，不过当时我们的新办法还不很多，不知如何具

体地把政治工作与战术技术相结合。

(4) 四纵一贯伤亡较大。

梅河口一仗主要也是四纵打的，胜仗很多，但伤亡却很大。有的干部对伤亡不在乎，甚至以伤亡大为光荣。从战士方面说主要是技术水平低，因此打起仗来往往往采取压的办法。甚至个别的也以杀头来威胁战士，这是不应该的。在打碉堡时，限制时间，师命令要一个小时拿下，而逐级打折扣，团说40分钟，营说半个小时，连说20分钟，结果班排一哄而上，受到不必要的伤亡。有的在指挥作战时，一打电话就骂街，使得团长不敢接电话，让别人去接。对这些问题，军区虽感到不应该，但没有好办法解决。比如十师从到东北来至夏季攻势共伤亡了10955人，已超过了他们的现有人数（9000人）。有的人就是光凭勇敢。比如有的指导员带一排人守山头，他就站起来喊：“你们来吧，我是十师二十八团的！”就这样伤亡很大，不断补充，一仗下来就是五六百人。在打营盘时，伤亡也很大，战士们说这是第二次“沙岭战斗”，当时就提出了要想办法减少伤亡。就这样促成了战评运动的产生。现在发展到评战术、评指挥、评动作、评演习、评防冻、评行军等，已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

现在来看，战评运动是通过群众运动形式以克服存在着的军事与战时政治工作方面的形式主义。军事上的形式主义有不少，这里不谈它。在战时政治工作上，只注意提高士气，进行简单的鼓励，对于如何取胜及如何减少伤亡都不关心与注意，这就使政治工作与战争脱节。在今天进

行现代化的大规模战争，政治工作只注意提高士气，不与战术结合，只有勇气是不行的，单喊冲杀更是不行的了。自有了战评运动，就解决了不仅鼓励冲杀，而且怎样冲杀才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问题。

战评运动的基础还是阶级教育，我们提高战术水平是要对阶级弟兄的生命负责任。四纵有的人以为提高战术水平是要完全避免伤亡，“伤亡是白冤枉了！”有的干部则放不下架子，怕评了以后不好领导，怕降低威信不好指挥。有个别师级老干部，以为这种运动没什么了不起，“还是老一套”，表现了对新事物接受的慢。三纵队接受了四纵的经验，评战运动开展得较顺利。但经验还没四纵的多。现在军事干部也感到战评重要了。开展战评运动之后，军政分家这个问题解决了，军政工作配合得密切了。

最后，谈谈领导政治工作的一些体验：

1、政治工作主要是掌握部队的思想，一切工作以阶级教育为基础，贯彻到各种工作中去。比如带战士参观，比穷人和富人住的房子，看穷苦老百姓吃什么样的饭以进行教育，就是比较成功地抓住了这主要的一环。

军区的工作，在对广大士兵下层干部的政治工作方面，主要是提高了觉悟，改造了俘虏，是收到了成效的。缺点是在干部工作上存在两个问题：

(1) 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干部做得不够。有些干部出身还是个问题，主观方面，他们对自己的家庭出身问题还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过去在进行诉苦与阶级教育中，有些干部只是作了一些工作，没有作为运动的参加者，而是站

到运动以外去指导运动，因此就缺乏了对自己的锻炼。

(2) 领导上抓提高阶级觉悟教育是有成绩的，但提高阶级政策观念还有缺点。如对锄奸政策、工商政策及对俘虏的统战思想等没有总结，对部队教育不够，所以就发生了好多问题。现在已开始注意了，可能以后会好些。

2、以奖为主，培养典型。只要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就可以作为典型，因为样样都有突出成绩的很难找到。如打仗、打坦克、群众纪律、团结等特殊好的，都可以作为典型，然后发扬提高，推广到全军去。过去有些同志对新典型要求过高；对树立的一些典型培养和爱护做得不够，抓着一个连队就经常用他，今天打仗，明天打仗，就打完了。所以一成为典型就成了问题。

有了典型对其他各方面的鼓励是很大的。如王永泰运动，虽然看起来王永泰比不上今天的典型，但他是第一个。辉南战斗，八师二十二团执行总部俘虏政策很好，没拿一件东西，使俘虏们很感动。我们立即通电表扬，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人们注意了俘虏政策。后来有的就讨论，打着赤脚作战，拿不拿俘虏的鞋子，结果一致认为不拿，从其他方面想办法解决困难。

3、发扬创造性，强调新的经验。领导上想不出什么经验，办法要靠大家创造。但要注意创造中有好的，也有坏的。如在立功运动中，有的连队另组织一个和支部平行的立功委员会，这就不好了。领导上对好的，一发现就应表扬介绍。不好的，就应马上纠正。问题在于领导上看哪是好的，哪是坏的。领导上看问题，应比下面站得更高一些。

过去，我们的缺点是要求不严，后来就逼着各师总结经验。开政工会议时，你总结不了就不让你回去。在地方工作会上也是一样。有些工农老干部，他们说从来就没总结过。在逼着他非总结不可的情况之下，逼着他们去想问题，提高思想和工作水平，结果也总结了对敌斗争的一些经验。我们体验到，政治工作要发扬大家的创造能力，少用命令。过去我们只发过两个训令，一个是建军问题，一个是土改学习。而其它则用发号召、指示，动员群众自觉地去。做。

（责任编辑 邢济萍）

党对军队领导的几项组织制度综述

李俊亭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解放军建设的一个根本原则。而要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就必须坚持党对军队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其中，重要的组织制度有：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度；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支部建在连上；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对军队的双重领导制度等。这些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几十年来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过程？本文仅就以上这些问题作一系统介绍。

一、中央领导体制

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是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并不是在建党、建军之初就实行了的，而是随着党对军队在中国革命中重要性的认识，随着对军队统一指挥必要性的认识，以及党所领导的军队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党中央对军队的领导体制才逐步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继续发展完善。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到北伐战争，“党对军事工作还没有系统的观念与工作”。^① 从大革命失败的惨重教训中，党认识到独立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先后组织领导了百余次武装起义，创建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60余年来，这支军队一直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但中央对军队的领导体制在不同时期却有较大的差别，其领导机构的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为四大类：（1）党中央设军事机构，但不直接指挥军队，军队由地方党委分别领导，如建军初期。（2）党中央设军事机构，政权系统不设军事机构，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及1975年至1982年。（3）党中央不设军事机构，通过政权系统的军事机构领导和指挥军队，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4）党中央和国家政权均设军事机构，党的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指挥军队，政权系统的军事机构也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如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后的几年，1954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和1982年设立国家中央军委以后。下面，让我们循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分阶段地考察中央军事机构的沿革。

1、1927年8月至1930年12月 党中央军事机构先后称中央军事部（1927年11月前和1928年7月至1930年2月）、中央军事科（1927年11月至1928年7月）、中央军事委员会（1930年2月后）。名称虽不同，但职能基本相同，即主要进行党的军事工作的组织和联络事宜，不直

^① 见《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的军事报告》，1928年7月。

接指挥军队。

1928年7月，党的“六大”通过的《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中曾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军事工作都应集中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部。各地军事委员会受地方党部之一般指导，但在军事工作方面则受中央军事部之指挥。”中央军事部下设军事委员会（1928年10月成立，作为就军事问题进行讨论和建议的机关）和参谋、组织、兵士、特务、交通等科，机关人员很精干。随着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对军队的统一指挥愈加迫切。193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军事部更名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同年4月3日，又在《关于全国红军指挥问题》中规定：“各地已组织的正式红军，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但是，由于当时中央军委设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远离主力红军，不具备对红军统一指挥的条件，主要工作依然是组织、联络和方针指导等。这个阶段，担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的主要是周恩来。期间，杨殷（1928年7月至1929年8月）、关向应（1930年2月至8月）也曾先后任军事部长和军委书记。

2、1931年1月至11月 周恩来在1930年曾提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应设在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在地。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军委一些负责人陆续进入中央苏区。此时，中央军事机构分为两部分：一是设在中央苏区的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隶属中央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红军的工作，并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红军，项英（1931年1月至6月）、毛泽东（1931年6月至11月）先

后任军委主席；二是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后又称中央军事部），主要负责党的白区军事工作，并对各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和军事机关的重大决策予以指导，不直接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1933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全部迁至中央苏区，原中央军事部机构改隶上海中央局，成为地区性军事领导机关。这一时期先后在上海任中央军委书记（军事部长）的有周恩来（1931年1月至12月）、李富春（1931年6月至12月代理）、武福景（1931年12月至1933年1月）。

3、1931年11月至1937年8月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并组成了隶属于该政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中革军委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既负责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又负责领导红军的建设。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经理部等。中革军委在组织编制上是政权系统的一部分。1933年1月前，中革军委主要由中央苏区中央局领导；1933年1月后，迁至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与中央苏区中央局合并，中革军委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代表党中央领导中革军委，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这个阶段的中革军委，既是中共中央的军事领导机构，又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军事部门。先后担任中革军委主席的有朱德（1931年11月至1936年12月）、项英（1933年5月代理）、毛泽东（1936年12月至1937年8月）。

4、1937年8月至1949年9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管辖的区域设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原隶属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中革军委在名义上不再存在。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形势下，为加强党对改编后的军队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8月决定成立党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成立的中央军委，仅隶属于党的系统。它作为中共中央的军事领导机关，统率八路军、新四军及以后的人民解放军，指挥武装斗争，领导军事建设，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阶段，中央军委在编制、职能以及主要负责人等方面均已形成稳定的、有权威的统帅部，军委主席一直由毛泽东担任。

5、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 根据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49年10月成立，统一管辖和指挥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正式纳入国家政权系统。同时，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兼任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主席，实行一元化领导。

6、1954年9月至1975年1月 1954年9月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同年9月27日，第一届国防委员会正式成立，国家主席毛泽东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9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中央政治局认为，必须同过去一样，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一个党的军事委员会，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并决定由毛泽东等 12 人组成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这样，就形成了由党的系统和国家政权系统共同构成的中央军事领导体制。中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全国武装力量；国防委员会则是国家军事防务工作的咨询机构和动员全民武装的统一战线组织。继毛泽东之后，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期间兼任第二届、第三届国防委员会主席。这种领导体制，既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又健全了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机关职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家主席的职权被剥夺，国防委员会也停止了活动。但鉴于其名义尚未正式废除，故将这一阶段的时间延至第二部宪法颁布。

7、1975 年 1 月至 1982 年 12 月 1975 年 1 月和 1978 年 3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再有设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的规定，而明确规定：中共中央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这个阶段（实际上应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后算起），中央军事领导机构只有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1976 年 10 月至 1981 年 6 月）、邓小平（1981 年 6 月后）相继任中央军委主席。

8、1982 年 12 月以后 根据 1982 年 12 月 4 日通过的第四部宪法，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国家中央军委），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国家中央军委成立后，中共中央军委仍然作为党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直接领导、指挥军队。两个中央军委设一套机构，组成人员和对军队

的领导职能完全一致，但又是两种含义不同的形式并存，在党内和国家机构内同时有两个地位。党和国家共同设立中央军委，进一步完善了中央军事领导体制，利于运用国家机器，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继邓小平之后，1990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兼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

以上八个阶段的划分，主要依据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组织形式的变化。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各个时期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但党中央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始终未变。即使在中共中央未设军事机构的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因整个国家政权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隶属政权系统的军事机构的主要组成人员也是中共中央的领导成员，一切重大军事决策、计划、措施的作出和实施，都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其余的绝大部分岁月，党创建的人民军队都是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中共中央军委作为党中央领导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下”，“依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而工作”，其成员由党中央决定任免，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担负对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责任。^①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必须使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军事机关组织与系统问题》，193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1954年9月。

二、党委制（略^①）

三、政治委员制度

综览当今世界各国军队，绝大多数实行的是“一长制”，而我军则实行“两长制”，即：在团以上（及独立营）部队设政治委员，在营、连分别设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与同级军事指挥员同为该部队（分队）首长。这一制度，在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如追根溯源，它却源于国外。

据《苏联军事百科全书》记载：政治委员作为全权监督部队活动的政府代表，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意大利共和国雇佣军。法国大革命时期，执政的雅各宾派也曾向部队派国民议会的全权代表——政治委员，作为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1918年，列宁在领导创建苏联红军时，在红军中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委员作为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全权代表。

孙中山在共产党帮助下创办的黄埔军校，吸收了苏联红军的经验，在军校设国民党党代表。以后，党代表制在整个国民革命军中推广。到1926年，国民革命军和军事机关的各级党代表达1000余人。那时，国共两党建立了统一

^① 本刊第38辑已发表与本节内容相同的文章，故略去。

战线，共产党员也可以加入国民党持双重党籍。各级党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很大比例，成为军队政治工作队伍的主力军，为夺取北伐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毛泽东曾对这个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制度给予高度评价，指出：“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①

自1927年南昌起义始，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人民军队继承发扬了大革命时期党代表制的优良传统，以后发展为政治委员制度。几十年来，这一制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逐步得到稳定和完善。其发展变化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1、初称党代表 参加南昌起义的三个军和各个师，均设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党代表。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后，则在团、营、连都设了党代表。1928年4月，朱、毛部队会师井冈山，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年6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军党代表，各师、团及营连也都相继配备了党代表。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都实行了党代表制。党代表在红军中具有崇高地位与威望，各级党代表与军事指挥员为同级首长，并担任党委会或支委会的书记。“连支委为红军党的工作的核心，党代表则为此工作核心之负责者”。^②当时，红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80页。

② 见《红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1月。

军在连、营、团均设有士兵委员会，处于秘密状态的党组织设在士兵委员会内，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代表士兵利益，参加部队管理，维护部队纪律，监督部队经济，厉行士兵教育，做群众工作，还可批评处罚军官。士兵委员会是在党代表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的，党代表参加其会议，必要时可予以解散。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里，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各级党代表，为红军的建设和战斗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事实证明那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那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

还应指出，党代表作用的大小，与党代表本身的素质关系很大。在一些部队中，由于“此项人才非常缺乏”，有的党代表“能力不足，无多少效果”。红五军曾一度取消所属部队的党代表，后又恢复。^①

2、改称政治委员 党的“六大”在《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中，规定了建立红军的四项原则，其中之一为：“采用苏联红军组织的经验，实行政治委员与政治部制度。”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要求将党代表名称改为政治委员。^②古田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信，此后，红军中的各级党代表均改称政治委员（营、连政治委员于1931年分别改为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改

① 见滕代远《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9年1月12日，载《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2册。

②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8页。

名初期，政治委员与原来的党代表职权基本相同，主要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①但顾名思义，二者的性质、身份亦不尽一致。193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政治委员是代表政权与党两方面来领导军队的。政治委员在政治上在党的立场上比军官权限大，即在军事上一切问题亦应得政治委员的副署。”

3、政治委员被赋予“最后决定权” 1930年冬，中共中央颁布的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对政治委员的地位、责任、权限、隶属系统等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即：“政治委员不仅是苏维埃政权在红军中的政治代表，而同时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全权代表”，是“执行党在红军政治路线及纪律的完全负责者”，“有监督一切军事行动军事行政的权力”。条例还规定：“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持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但必须立刻将争持的详细情形报告上级机关，在未得到上级指示以前，须依照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这样，政治委员不仅与所在单位军事指挥员为同级首长，而且被赋予了“最后决定权”。政治委员还有最高执法权：“在发现该部一切人员（由同级军事指挥员以至战斗员）有反革命或以破坏军队组织为目的的行动时，政治委员有执行革命法律之权。”红军师以上机关所设的军事法庭和政治保卫局，均受政治委员领导。在与党组织的关系上，政治委员也处于领导地位。条例规定，

^① 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9页。

团委与政治委员发生争执时，团委应当执行政治委员的指示。

政治委员的权力被如此不适当地扩大，主要是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机械地搬用苏联红军的作法。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红军中政治委员的权限很大，军队中一切军事、政治问题，最后决定权均属于政治委员。如发现同级军事指挥员及其他任何组织与个人有破坏政府、破坏军队、破坏上级的命令与指挥等反革命阴谋时，政治委员有权代表政府实行紧急处置。之所以授予政治委员这样的权利，是因为当时苏军中的各级军事指挥员过去多是沙俄旧军队的军官，许多人不仅政治上薄弱，而且其中潜藏有反苏维埃政权的危险分子。而当苏军中军事指挥员的政治质量普遍提高后，政治委员就不再有上述所谓“监军”的权力了，甚至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教条主义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顾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指挥员绝大多数是经过斗争考验的共产党员的实际情况，把苏军某一时期的特殊作法照搬过来，造成了军政之间的不协调，并且妨碍了党的集体领导。应该肯定，红军中的绝大多数政治委员是有高度觉悟的共产党员，为红军的建设和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但这支队伍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不少人本身的素质与所担负的责任并不相称。在一个时期内，“中下级政治委员，都是从宣传员、司书两种人中提拔起来的”，“政委多系学生分子”，“当政委的政治基础不够与成份不好或不军事化的生活”，亦是造成对政治委员制度根本缺乏认识

的主要原因之一。^① 政治委员握有大权，而又不能胜任，难免贻误革命工作。特别是某些在高级领导岗位上的政治委员，如果滥用或错用手中的权力，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这个时期，在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等苏区和红军中发生的许多“肃反”悲剧事件，就有这方面的沉痛教训。

1935年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加强了集体领导，但在整个红军中，原赋予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仍未正式改变。例如，在中共中央于1936年11月决定组建的西路军中，由政治委员陈昌浩兼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对该部重大决策起着主导作用。

4、政治委员一度被取消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一时迁就国民党，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时，完全按照国民革命军的编制进行，取消了政治委员。原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多改任军事副职或政训处主任。政治委员被取消，但党对军队的领导没有变，只是采用了另外的形式。1937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前方设个军委分会”，统一领导开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三个师，并在各师设军政委员会。以上组织均系党内组织，对外保密。1938年1月组建新四军时，设立了隶属中共中央军委的新四军分会。项英虽任副军长，但因是党的分会书记（后为东南局书记），实际上是新四军的主要决策者。但从普遍的情况看，取消政治委员，

^① 见红四军、红十六军及鄂豫皖红四军给中央的报告，载《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2册，第275、377、386页。

降低了政治工作和政工人员的地位和职权，使党的领导、政治工作受到削弱。1937年10月29日，前方军委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名义向中央发电，及时反映了改编后部队出现的问题，并建议“部队仍应保持党代表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仍用政治委员名称，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并于10月29日任命了八路军各师的政治委员。随后，八路军各旅、团，新四军以及党领导的山西新军等部队也都相继设立了政治委员。

5、政治委员制度趋向完善 1938年和1942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先后两次颁布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与1930年的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相比，对政治委员的作用、权限等，规定有明显不同，主要表现在政治委员与同级军事指挥员的关系上。1938年的条例规定：“在军事行政和作战指挥上，军事指挥员负更重大的责任，但在军事指挥员有违犯了党的路线或不执行上级命令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但必须把经过的情形详细报告上级机关。在未得到上级机关指示以前，军事指挥员必须依照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同时，军事指挥员有向上级申诉之权。”这里所授予政治委员的特殊权利与以前的“最后决定权”完全不同。按照1930年条例的规定，同级军政主官发生争执，不管是什么范围和性质的问题，均须服从政治委员。而按照1938年条例的规定，只有在涉及违犯党的路线或抗命等政治、纪律性质的问题时，政治委员的权利才高于军事指挥员。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赋予政治委员以必要的紧急处置权也是必要的。但是，在不涉及上述性质的问题，而只

是对军事行政、作战指挥等发生不同意见的争执时应该怎么办？条例明确了“军事指挥员负更重大的责任”。其具体涵义是什么？条例中没有进一步说明。而在实际工作中，却形成了正确的处理办法。1938年11月，时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的罗瑞卿在毛泽东指导下写出《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一书，第一次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员发生争执时，属军务方面者，其最后决定权属于军事指挥员，属政治工作方面者，其最后决定权属于政治委员，但双方均有权向上级控诉一直到总政治部及军事委员会。”1942年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原则上吸取了上述处置方法，规定：“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除属于作战方面的行动由军事指挥员决定之外，其他由政治委员作最后决定，但均须同时报告上级军政首长。”这样，政治委员在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被不适当地扩大权力，以及抗日战争初期被取消的大上大下之后，又确定了其在军队中适当的地位和作用。政治委员制度在实践中的不断完善，为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制度的完善，终归要以完整准确的书面语言形式来表现。1954年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中有这样一段话：政治委员“和同级军事指挥员共同负责制定部队作战、训练、动员、供应和一切军事建设的计划，并在颁布的命令上签字；在紧急情况下遇有争执时，属于作战行动和军事工作的问题，由军事指挥员决定，属于政策性质和政治工作的问题，由政治委员决定，但均须同时报告上级首长。”短短百十余字，凝结着我军几十年政治工作

的经验和教训，标志着我军政治委员制度的成熟与完善。

四、政治机关制度

我军设立政治机关的开端，始于南昌起义部队。周恩来等领导人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我党在国民革命军中进行政治工作的实践，在起义军中建立了政治机关：全军设总政治部，各军、师设政治部。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会师后组成的红四军，也设有政治部。此后，根据党的“六大”的有关决议，在军队中设立政治机关成为党领导军队的一项重要组织制度，也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几十年来，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政治工作、政治机关的地位、作用有时被不适当地抬高，有时又被不适当地降低。政治机关制度的执行，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

1、制度的基本形成 1927年8月至1931年2月，是政治机关制度创建和基本形成的时期。创建的开端如上所述，基本形成的标志有三个：一是古田会议决议，二是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的颁布，三是红军总政治部的建立。建军初期，对于为什么要设立政治机关，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是什么关系等重大原则问题，在各地红军中均有不同的认识和作法。在红四军及其他红军部队中，存在着“军事领导政治”、“司令部对外”、将政治部隶属于司令部等单纯军事观点的认识和作法。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军队建设的经验，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等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解决了军队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决议规

定了政治机关的职权以及与军事机关的关系，指出：“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的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凡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事政治两机关会衔发布”；“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的指挥。凡政治训练、群众工作等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决议否定了“司令部对外”的提法，明确由政治部担负部分政权的职能，规定：“凡没有建设政权机关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替当地政权机关，至地方政权机关建设时为止。”这些规定和原则，不仅在红四军中执行，后来在其他红军部队也相继执行了，为我军政治机关制度奠定了基础。在总结全国红军政治机关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在1930年冬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中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明确了政治机关的性质、任务、机构、隶属关系等，使政治机关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规范化、条理化。按照条例规定：团及独立营设政治处，师以上设政治部，全军设总政治部。政治机关是红军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指导机关，是苏维埃政权的一部分，是党在红军中政治路线及纪律的执行者。按照上述条例规定，1931年2月正式成立了总政治部。至此，我军的政治机关制度从理论基础、法规形式到组织体系均基本形成。

2、制度的发展与挫折 从红军时期到民主革命胜利，直至90年代，我军政治机关制度总的趋势是正常发展，不断完善。但也有几次大的挫折，突出表现为“两上两下”。“下”是挫折，不难理解；这里所说的“上”，属一种不正

常的上，乃是挫折的另一种形式。“一上”，是指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时期。由于红军中的党委制被取消，各级党组织在同级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指导下进行工作。这个时期，曾一度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地位与权力，不适当地强调军事工作人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党性差别，影响了军政之间的协调和团结，对政治机关自身的建设也产生了副作用。“一下”，是指抗日战争初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曾按照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在撤销政治委员的同时，把政治部改为政训处，规定政训处主任“为同级单一首长的政治助手”，^①降低了政治机关的地位。时过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及时纠正了削弱政治工作的偏向。抗日战争时期颁发的两部政治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政治机关的性质、地位、职能等。1944年4月，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受中共中央委托，代表八路军驻陕甘宁边区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在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总结了我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建设的经验，对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许多重要问题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述，肃清了王明路线的影响。解放战争时期，总政治部颁发了党委会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政治机关与党委的关系，以及政治机关作为党的工作机关的职责范围和实施形式等。条例规定：“军政机关应无条件地执行党

^① 见《中央组织部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1937年8月1日。

委会之决定、指示和训令”，“上级军政机关之指示、训令、命令，一般应由党委会讨论保证执行”。

新中国建立不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1954年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中，进一步肯定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是政治工作领导机关，并统一了全军各级政治机关的组织机构、工作职责等。从全军政治工作最高领导机关总政治部，到基层政治工作领导机关团政治处，形成了完整的组织体系和工作制度。此后，又于1963年3月、1978年7月、1991年1月颁发了三部政治工作条例，使政治机关制度更加完善，政治机关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但是，这期间也经历了严重的挫折，那就是第二次不正常的“上”和“下”。“二上”，发生在林彪搞所谓“突出政治”时期，又一次把政治工作、政治机关的地位、作用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使我军政治工作的方向发生了偏差。“二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公然提出“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甚至对总政治部实行“军管”，并把下面一些政治机关诬蔑为“阎王分殿”，企图摧跨和搞乱政治机关，严重破坏了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于1978年7月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强调要尊重政治机关的职权，明确政治机关就是党委的工作机关，不准脱离政治机关另立党委办公室，要求“在三几年内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恢复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水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提高，使政治机关成为强有

力的、有很高威信的政治工作领导机关。”1987年1月和1990年2月，中共中央又先后批准转发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和总政治部《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简称“纪要”），对设立政治机关制度的重要意义，加强政治机关建设等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使我军的政治机关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五、支部建在连上

自从三湾改编开创把党支部建在连队的先例，这一原则便一直作为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之一。多部政治工作条例和许多重要文件中，都有这样的规定：连队党支部是党在军队中的基层组织，是连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但是，这一制度的确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一个马鞍形的发展过程。

1、建军初期“一切工作归支部” 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红四军，建立了由连支部到军委的党组织系统。连队党支部是全连团结战斗的领导核心。当时的口号叫“一切工作归支部”，即：一切工作通过支部讨论决定，“然后分别交付军事、政治、士兵委员会的同志去起作用，公开的在群众中实现起来”。^①对这一制度，红四军中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古田会议召开前，中共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肯定“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古田会议

^① 见《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2册，第280页。

总结了党支部建设的经验，在决议中明确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那时，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红军物质生活菲薄，而且战斗频繁，随时有牺牲的危险。但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经受住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毛泽东对此体会最深，他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①

2、支部以监督保证作用为主时期 1931年底以后，随着党委制被取消，连队党支部的地位、作用也发生了变化。连队的重大问题和工作不再必须经过支部讨论决定，支部无权干涉军事人员的命令，无权干涉指导员在连队政治工作上的指挥。“如在连支部与政治指导员间发生冲突时，则由团委讨论其问题，由政治委员解决之。”^②这个时期，也讲支部的“堡垒”作用和领导作用。例如，1932年9月21日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的训令》中指出：“支部是党在红军中的‘堡垒’，连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1935年5月2日，总政治部在《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中要求“使支部在连队中起最高的领导作用”。但其含义与现在不完全相同。实际工作中，支部在保证党的纪律，吸收新党员等党务问题上，有执行党的一级组织的权限；但对部队的各种任务，则主要是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团结广大群众，来保证一切任务和上级指示、命令的完成。在政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65页。

^② 见《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

治组织体系中，连支部与政治指导员并列，支部工作接受政治指导员的指导。连队中的许多组织，如经济协助委员会、宣传队、十人团、政治战士、地方工作组、列宁室（后称军人俱乐部）等，均受政治指导员直接领导，隶属支部的组织只有党小组和青年团小组。这样，支部就不可能对连队实行统一领导。

这个时期的支部虽然没有行政权力，不是连队统一领导的核心，但在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等方面，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3、划时代的原则改变 党委制在全军恢复后，1948年初，华东野战军等部队开始进行支部亦作为连队一级党委的实验。经过半年多的实施，显示了良好效果，“连队政治工作有了一个大的进步”，“更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政工作更协同一致”。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在一份文件中列举了上述事实后，热情称赞支部成为一级党委“是一个划时代的原则改变”。^① 1948年10月25日，总政治部颁发《关于支部工作的条例草案》，正式规定了支部的性质、任务、职权等。条例草案指出：“支部是军队中党的组织基础，支部委员会是全连统一领导机关，一切上级党委的指示，决定及本连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重大问题，一般都须经过支委会讨论决定”；“连长、政指是在上级命令指示下与在支部

^① 见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关于建立和健全目前支部委员会领导问题（草案）》，1948年8月。

统一领导下，对连队实施其工作”。这样，连队中的所有人员、所有组织和全部工作，都置于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之下，从而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基层进一步得到落实。

六、双重领导制度

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对军队的双重领导制度，从确立到现在，曾几经改变，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过不同的形式。

（一）党的“六大”确立了双重领导制度

在“六大”以前，我们党还没有一个与普通组织分开的军事系统。中央军事部（或军事科）工作上曾隶属于中央组织部（或组织局），各省的军事机构也多设在组织部下。因此，在党组织武装起义时，大都由当地党组织在中央方针指导下分别领导发动（南昌起义则由中央派出的前敌委员会领导，秋收起义、百色起义等也有中央代表），起义后保留和发展起来的部队，在一段时间内主要由各地方党委领导。鉴于军事工作的特殊性质，党的“六大”确定将全党军事工作集中于中央军事部，中央军事部直接受政治局常委领导；各地设立在常委指导之下的军事委员会，“受地方党部之一般指导而工作”。1929年5月15日，中央在给顺直省委的指示信中对建立军事系统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大会何以规定在中央设部及各地设军委会？其原因即是因军事工作有特殊的性质，即军队中的组织亦有其特殊的环境。在党的组织路线下，军队中的组织应特别秘密，绝

对的须与普通组织分开。现在一切军事工作……无论在组织上在技术上都有独立工作的必要(自然所谓独立工作,并不是离开组织,而是在常委指导下另一系统部门的工作……)。”信中还明确指示:“不能在组织部下设军事科,此是六次大会以前的组织形式,现在不适用了。”^①“六大”之后,从上到下的军事系统逐步建立、健全,同时继续保留地方党委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从而确立了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对军事工作的双重领导制度。这种制度,适合军事工作的特点,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有利于密切军队同地方党委的关系,加强双方工作上的相互配合和支援。

(二) 不同时期采取的不同形式

1、建军初期分散指挥,以地方党委领导为主 “六大”之后,党中央曾作出正式决定,全国红军的指挥权统一于中央军委。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各地红军实际上仍以各地党组织领导为主。例如,1929年11月25日,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前委现在江西境内,受江西省委指导,如到湖南境内,即受湖南省委指导。同时请中央经过两省委随时直接指挥。”而1928年红四军主力向湖南冒进,造成边界“八月失败”,亦主要是由于执行了湖南省委的错误指导。这一时期在中央的一些文件中,也都明确由地方党委领导该地红军,如1929年10月12日《中央给新编一师诸同志的信》中规定:“军中党的组织要成立

^① 见《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2册,第144页。

前敌委员会，属湖北省委直辖，中央亦可与你们发生直接关系。”

2、集中指挥，以军事系统为主 在红军以游击战为主的阶段，地方党组织为主的分散领导体制是与之相适应的；但在红军形成主力部队，逐步向运动战转变以后，就必须有集中统一的指挥了。1930年5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随后根据会议决定全国红军进行统一整编，相继组建第一、二、三、四军团等正规兵团，接着又组建了红一方面军。此时的中央军事机构也迁至红一方面军所在的中央苏区，机构亦随之进行了充实。这样，中央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高效能的军事系统，足以担负起对军队实施统一指挥的责任。自1931年起，红军主力部队均受军事系统直接指挥，一些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则以地方党委领导为主。

3、军地合一的前敌委员会 从土地革命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或省委根据革命斗争需要，曾组建由地方党组织和军队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对军队和地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这也是对军队实行双重领导的一种形式。例如，毛泽东任书记的湘赣边界中共湖南省委前委，贺龙任书记的中共湘西前委等。在淮海、平津等重大战役中，还组织了总前委，负责统一领导作战区域党政军民的一切工作。

4、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一元化领导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由中共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

分局)及党的区委、地委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各地党委为各该地区最高领导机关,党委的决议,党政军民均须无条件地执行;各地军事政策与军事行动的大政方针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具体行动由军队首长决定;主力军对于所驻地区的县、区、乡级党委的决定和政府的法令,也必须执行;凡决定含有全党全军普遍性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共中央,不得擅自决定;各区党委、地委、县委书记兼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遵照中央的决定,各抗日根据地均实行了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依然保持。

5、新中国成立后的双重领导制度 1949年至今,由中央军委、总部、军区等构成的军事系统对军队的垂直领导形式始终保持,地方党委对军队的领导形式则有几次变动。1954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中规定:各级军区及军分区党的组织,除受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外,还分别受所驻地区中共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同级地方党组织的领导。1958年4月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地方党委对军队的领导和密切地方党委同军队关系的指示》中进一步规定:省级军区、军分区和县级兵役局三级军事机关,除保持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与隶属关系外,同时成为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同级军事机构的政治委员;凡军事区域同地方行政区域相一致的军区,也应置于中共中央军委和同级地方党委双重领导之下;军事区域同地方行政区域不一致的军区以及其他军事单位,在与地方有关的工作上,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各军区都要有一个主要负责人参加所在

地的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工作，地方党委要吸收当地驻军负责人参加地方党委会或列席地方党的会议。“文化大革命”中，双重领导制度曾一度中断，后又恢复。1978年以来，这种制度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动。1985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的通知》中规定：省、地两级地方党委书记分别兼任省军区、军分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不再兼任政治委员。1986年，县级人民武装部移交地方建制，县（市）委书记兼任人民武装部党委书记。以上三级军事机关仍接受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

以上分别论述了党对军队实施领导的六项组织制度。另外，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也是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制度，鉴于对这一问题已有较多文章发表，这里不再赘述。实际上，上述一系列根本制度又是互相关联、互相补充的，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目的，即：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部队战斗力。

实行和坚持上述一系列根本制度，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即由理论原则物化为组织体系。在这个从中央到基层的完整组织体系中，既有掌握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又有做为中间环节的各级党委、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以及党在军队中最基层的组织——连队党支部；既有决策机关（在全军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一个部队是该部队党委），又有执行机关（各级政治机关是该级党委的工作机关）；既有党委的集体领导，又有政治委员个人的特殊责任；既有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又有地方党委对军事

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正是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和一系列制度而得以实现的。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由我军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是在长期斗争中形成并逐步完善的。人民解放军作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从创建之日起，就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可能独立于社会政治之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对军队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我军就一定能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经得起任何风浪和战争的考验。

（责任编辑 汪 新）

党的挚友陈嘉庚

曾昭铎

陈嘉庚是当代中国一位有骨气的民族资本家，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一位举世闻名的华侨领袖，炎黄子孙中的佼佼者。他的晚年（即67岁—88岁，1940年—1961年）是怎样开始与共产党人结识并逐步成为党的一位难得的真诚朋友，建国以后，他又怎样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为祖国为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本文拟就上述问题，对陈嘉庚作一简要介绍。

一、真诚的友谊产生于抗日圣地——延安

正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华儿女奋起抗日救亡之际，长期侨居新加坡的陈嘉庚，于1940年3月亲率“南洋华侨慰劳考察团”（以下简称慰劳团）回国。慰劳团途经仰光，首先到达重庆，并在重庆活动了一个多月。慰劳团在重庆所见所闻，使满怀希望而来的陈嘉庚大失所望。他看到重庆抗战气氛淡薄，百姓生活困苦，缺衣缺粮，度日如年，国民党官吏却结党营私，屯积居奇，花红酒绿，大发国难财，为此他深感痛心。之后，他又抱着

“未知延安方面如何”的心情，想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看看。蒋介石得知陈嘉庚想去延安，就当着他的面破口大骂共产党，劝他别去。说“你是大资本家，延安不但不欢迎，而且安全也无保障。”陈说：“我受千百万华侨委托，身负重任，岂能以个人安危而避之。”蒋见劝阻无效，又说：“要去也可以，但不要受人欺骗。”在延安的毛泽东得知陈嘉庚想去延安时，迅速来电邀约前往。陈嘉庚遂决意“亲往考察，以明真相”。

陈嘉庚敢想、敢说、也敢做。在侯西反、李铁明等人陪同下，他率领慰劳团部分成员，于1940年5月31日下午5时半到达延安。

陈嘉庚一行受到延安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欢迎会上，陈嘉庚代表南洋1100万侨胞向大家致意。他说：“南洋广大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支持祖国抗战。仅1939年，侨汇就达11亿元，占当年重庆国民政府军费开支18亿元的一大半。现在日寇占领我广大领土，我方内部却不断发生磨擦，汪精卫又叛国当了汉奸，形势可虑。广大华侨迫切希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坚持抗战。实现这两条，是全国民众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

陈嘉庚在延安访问期间，毛泽东多次邀请他到杨家岭窑洞办公处会晤，毛泽东也多次到陈嘉庚下榻处拜访他。他们会晤中所谈的中心议题：一是抗战问题；二是国共合作问题。陈嘉庚说话直爽，交谈中他开门见山地说：“我对国共两党的希望是：一是要坚决抗战，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二是国共要合作，兄弟间的一切磨擦，都等打败了日寇后解

决。”他还一再希望共产党宽大为怀，作出让步，不跟他们（指国民党）搞磨擦。毛泽东表示：共产党为了抗日救国，十分珍视国共两党的团结。同时也指出，对国民党顽固派如不经过斗争是达不到团结抗战目的的。

陈嘉庚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他一到延安，就十分注意观察共产党领袖们的日常生活，他不但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一天，毛泽东请陈嘉庚吃晚饭，桌上只有白菜、咸萝卜干，外加一碗鸡汤。毛泽东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下蛋，她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办公处的摆设，也十分简单：一张陈旧办公桌，几张长短高低不等的木头凳子，墙壁上挂了一张作战地图。所有这些，陈嘉庚看在眼里，记在心间。

更出乎陈嘉庚意料的是，统率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待人是那么随和。陈嘉庚在延安，看见他与八路军战士同桌吃饭，与军校学生一同打篮球，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官兵彼此如此亲热、平等和团结，使陈嘉庚感慨不已。他回想起在重庆所看到的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真像个封建皇帝，官架子十足，部下对他无不唯唯诺诺。对比之下，有天渊之别。

陈嘉庚未到延安之前，虽也和一些共产党人有过接触，也曾经看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一类书籍，听过一些正直的人讲过共产党的好话，但更多的是听到不少人讲共产党的坏话。共产党究竟是好还是坏？共产党是不是真抗日？他们是否关心老百姓？老百姓拥护不拥护他们？共产党讲

不讲伦理？陈嘉庚脑子里是有一系列“疑团”的。在延安考察期间，他还特意与延安华侨青年（有的是集美校友，有的还是他所熟悉的南洋同事的子女）会见。他们用闽南家乡话直接交谈。陈嘉庚把自己内心“疑团”一一向他们委婉倾吐，华侨青年如实相告。他们说：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抗日，他们处在抗日最前线，为了打日本，许多人（包括印尼归侨女青年李林）英勇牺牲了。而国民党顽固派不但不积极抗日，还用海外华侨大量捐款所装备起来的几十万部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妄图伺机消灭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共产党、毛泽东为了打破敌人封锁，为了解放区人民生存，为了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领导大伙开荒种粮、养猪种菜、纺纱织布。华侨青年还说，陕北这个地方土地太瘦，百姓很穷，自从1935年10月工农红军万里长征来到陕北，百姓生活才逐步有了改善。所以人们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称毛泽东为“大救星”。陈嘉庚亲眼看到延安男女青年平等相处，互相尊重，社会秩序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百姓安居乐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心中的“疑团”逐渐烟消云散，内心充满了希望和喜悦。

在朱德和康克清陪同下，陈嘉庚在延安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女子大学等学校，观看了女大同学的窑洞宿舍和露天上课情形，参观了女大附设的缝纫、制鞋车间。在朱德陪同下，陈嘉庚还参观了安塞钢铁厂，看到了工厂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制造前线急需的武器弹药。这一切，使他进一步看清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团结一致积极抗战的坚强决心。

一天清晨，陈嘉庚就近登山鸟瞰延安城。只见延安城区除了残存几间平屋外，几乎已被日寇炸成一片废墟。但困难吓不倒延安的人们。他信步来到延河边，见到一群日本反战同盟男女盟员在欢快地洗衣服，看到了边区男女自卫队员拿着大刀和红缨枪，在列队操练和练习投弹，看到了商店自由营业，一路上唯独看不到游民、乞丐和灾民。

陈嘉庚一行在延安期间，同延安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并进行实地深入细致的观察了解。他这番出乎意料的新鲜经历，与重庆国民党统治区所见所闻形成了鲜明对照。他由此得出结论：破坏抗战、投降卖国、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是国民党顽固派；真正抗日救国、维护团结统一、廉洁奉公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希望不在重庆而在延安。毛泽东真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

同年6月8日，陈嘉庚满怀喜悦的心情，结束了在延安的考察访问，转到其他战区继续他的考察之行。延安之行使陈嘉庚晚年在政治态度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坚决拥蒋”开始逐步转向“拥共反蒋”。

二、在反美反蒋斗争中发展同 共产党的真诚合作

19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才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海内外同胞、侨胞无不欢欣鼓舞。这时陈嘉庚在印尼爱国侨胞（包括厦大、集美校友）的秘密掩护下，结束了3年多（1942年2月——

1945年10月)艰苦的流亡生活,于1945年10月6日安全回到新加坡,受到新加坡500多个社团的联合欢迎。同年11月28日,重庆也有10个社会团体发起举行“陈嘉庚先生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送去条幅,上书:“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周恩来和王若飞送去的祝词是:“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诤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陈嘉庚的赞赏、信赖和希望之情。

抗日胜利后的中国,究竟要往何处去?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大问题。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无不盼望祖国能够实行民主政治,和平建设家园,以便医治战争创伤,让人民休养生息。1945年8月下旬至10月上旬,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陈嘉庚十分希望和谈能够真正成功。他说:“那比赚什么大钱都更高兴,因为这是全国人民的大福气。”但根据陈嘉庚几十年的经历,特别是在抗日期间亲自回国考察的经历,又使他不无忧虑。事实上,国民党谈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在美帝国主义大力支持下,蒋介石政权运用现代化运输工具,到处调兵遣将,抢占地盘,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谈不过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正如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所说的:“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80万人。”陈嘉庚也认为对和平“蒋介石没有诚意”,“民主非流血不易得”。后来国共双方在“双十协定”上签了字。这时南洋《华侨导报》请陈嘉庚题词,他写道:“还政于民,

谋皮于虎。蜀道崎岖，忧心如捣。”一针见血地道破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诡计。

不出中国共产党人和陈嘉庚所料，蒋介石把和谈当幌子，一旦准备就绪，就公然撕毁国共双方签定的“双十协定”，于1946年6月26日，悍然发动反革命的全面内战。陈嘉庚对美蒋联合反共反人民深恶痛绝，他于同年9月7日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美国参众两院议长、美驻华特使马歇尔和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坚决要求美国停止对国民党的一切援助，并撤退驻华美军。其电文列举国民党政权贪污腐败、独裁专断、丧失民心的种种事实之后，还着重提到中共情况和华侨意愿。他说：“本人曾亲访延安中共辖地，民主政治已见实施，与国民党辖区有天壤之别；且中共获民众拥护，根深蒂固。不但国民党军队不能加以剿灭，即任何外来金钱武器的压迫，亦不能使其软化。”“本人代表南洋华侨，特向贵国吁请顾全国际信誉。以日本为前车之鉴，勿再误信武力可灭公理，奸谋可欺上帝；务请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府，以使中国内战得以停止，人民痛苦得以减少……”

上述电文经外电向全世界播出，震惊了海内外。影响所及，非同小可。

然而，南洋华侨决非清一色。国民党利用在南洋华侨中的反动势力诽谤和打击陈嘉庚。华侨社会中拥陈与反陈的斗争十分激烈。当时华侨报纸大多为国民党反动势力所操纵。为了祖国未来前途，为了华侨根本利益，进步侨胞

认为应有为自己所掌握的舆论工具。在同事们的拥护和支持下，陈嘉庚在新加坡创办的《南侨日报》，于1946年11月21日与读者见面了。陈嘉庚任该报董事会主席，胡愈之任社长，张楚琨任经理，李铁民任督印。《南侨日报》的创办，得到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1947年周恩来推荐夏衍任该报主笔，进一步加强《南侨日报》的战斗性。《南侨日报》的创办，在南洋舆论界是一桩大事。它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陈嘉庚在创刊号上《告读者》一文中告诉读者：“我海外华侨本爱国真诚，求和平建设，兹故与各帮侨领，创立《南侨日报》。其目的在团结华侨，促进祖国之和平民主，俾内战早日停止，政治早日修明，国民幸福早日实现，以达到孙国父建国之主旨。”在祖国处于炮火连天的大规模内战岁月里，陈嘉庚总是充分利用《南侨日报》这块舆论阵地，亲自写文章，对美蒋反动派进行口诛笔伐。其主要文章有：《论美国救蒋必败》、《以历史经验证明蒋政府必倒》、《中国内战何日告终》、《国共决无和平可言》、《明是非、辨真伪》、《蒋介石的最大错误》等等，深刻阐述蒋介石打内战不得人心以及美蒋玩火自焚的道理，擦亮了海外侨胞的眼睛，坚定了海外侨胞反美反蒋的斗志。1948年元旦，陈嘉庚在《南侨日报》发表《新年献词》，指出“今岁为民国纪元三十七年，实为我国历史上巨大变革之年，或亦竟为中华民族大革命胜利成功之年。民国建立以来，掌握政权最久者，厥为袁世凯与蒋介石。倘以袁蒋两相比较……袁氏所承认之二十一条条件从未实现，而蒋氏手中所断送之领土主权不可以数计，所借外债数额，尤十百倍于袁

氏。”1949年11月21日《南侨日报》成立三周年，毛泽东为之题词：“为侨民利益服务”。并号召：“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周恩来的题词是：“为宣扬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这些题词充分表达了党中央对《南侨日报》的高度赞扬和充分支持。在抗战胜利后的几年当中，广大海外华侨在陈嘉庚影响下，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广泛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9年1月，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国民党败局已定，全国胜利在望。中共中央着手与各界人士酝酿召开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以便成立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就在这时（1月20日），陈嘉庚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邀请电，电文说：

嘉庚先生：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盛望，众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陈嘉庚接电后，异常兴奋。他当即复电说：“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曷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在党中央的盛请邀请和海外侨胞敦促下，陈嘉庚带着一颗对祖国的赤诚之心，于1949年5月5日登船北上，迎着西太平洋的狂风恶浪，途经香港，几经周折，于6月初到达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筹备会。会议结束，转到东北各地考察了两个多月，又再赶回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

议。会议期间，他被分配在国旗、国徽、国歌方案拟定小组。陈嘉庚特别欣赏绘有“五星红旗”的一幅图案，认为它最富有意义，最具代表性。他认为：五星中的一颗大星，是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其余四颗小星是代表工农商学各阶层人民。小星围绕着大星，并各有一个星尖向着大星的中心点，象征各阶层人民团结在中央周围。陈嘉庚满意地选择并向会议推荐了这一幅，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他的提案。从此五星红旗便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陈嘉庚历来最不满意把党旗和国旗混同，当年国民党把“青天白日”当作旧中国“国旗”标志，他就认为很不适当。1940年他率“南侨慰劳团”到达重庆之机，特地请来美术家专门设计了新图案，想“提请”国民党当局“采纳”。不料他的满腔热情却遭到国民党官员的无情冷遇，使陈嘉庚倍感伤心。这事陈嘉庚一直记忆犹新。共产党和全国政协全体代表对他亲自选择的新中国国旗方案如此尊重，又怎不令陈嘉庚倍感兴奋。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结束。在这次会议上，陈嘉庚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又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侨联主席。党和人民委陈嘉庚以重任，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无上光荣，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和千百万海外侨胞的共同心愿。

三、为建设新中国而竭智尽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受尽屈辱的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我国各族人民和海外爱国侨胞皆大欢喜。陈嘉庚更是兴奋异常，因为他一生为之苦心追求和奋斗不息的愿望，终于初步实现了。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他在国家中央机构中担任了要职，但从他个人的愿望来说，不是想做大官，而是想干实事。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政务院，一再热情挽留他在北京工作，他婉谢了，执意要回厦门集美定居。因为他早就认定：“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他要继续扩建由他亲手创办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要为祖国和家乡的繁荣昌盛，培养更多的建设人材。

1949年9月23日，集美解放。我人民解放军某部立即张贴布告，命令部队坚决保护由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可是，不甘心失败而又丧尽民族天良的国民党反动派，竟于11月11日派出8架重型轰炸机，对集美学村进行轮番轰炸。集美校舍和民房侨宅遭破坏，集美学校师生和村民21人罹难，致使在抗战期间遭日寇严重破坏的集美，又再次受到一场浩劫。陈嘉庚对此十分气愤。他说：“蒋帮做尽坏事，竟然派飞机滥炸集美学校。校舍损失严重，需要一番大修理，增加了我筹集办学经费的困难。但不管怎样困难，总要想办法把被破坏的校舍修好，以恢复旧观。”陈嘉庚说到做到，解放后在他定居集美的岁月里，在党和人民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不但迅速把被破坏了的集美校舍恢复旧观，而且规模更加扩大，修建得更加壮观。

解放前的几十年，陈嘉庚为创办集美学校，共建校舍5万平方米，包括：集美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业和国学专门部等各类学校以及为师生教学和生活服务的科学馆、图书馆、美术馆、医院、电灯厂等公共设施；初步建成全国少有的学科门类齐全的集美学村。解放后陈嘉庚继续大力集资，人民政府也先后拨出巨款，在原有基础上，再扩建校舍16万平方米，相当于解放前集美校舍总面积的3倍多。其中包括一座拥有15层高的南薰楼，一座可容纳4000人集会的福南大会堂，一座可容纳3000观众的体育馆。经陈嘉庚建议并受中侨委委托，还筹办了集美侨校。同时扩大集美水产、航海、财经和中小学校的基建规模。在学校的南端扩建了约10万平方米的大水池（又称龙舟池和外池），在学校东端建起有今古奇观艺术雕刻的鳌园，园内高高竖立着有毛泽东亲笔题词的集美解放纪念碑和陈嘉庚亲手书写的碑文。这些重要设施的修建，从规划、设计、备料、到施工，陈嘉庚都亲自过问，亲自督察，风雨无阻，从不间断。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建成了一座巍峨壮丽、富有民族风格、碧水绿树相映的集美新学村。这个学村，不仅是莘莘学子学习的好场所，而且是闻名海内外的旅游胜地。据统计：从1913年陈嘉庚创办集美小学开始到1989年夏季为止，从集美各类学校毕业的学生共有6万余，培养出学者、专家、企业家、教育家、工程师、船长、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为数甚多。集

美校友遍及世界五大洲，许多人鲲化鹏博，卓然有成，为推动侨居地各国及港、澳、台等地的经济和文教事业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以及对促进祖国的经济建设和统一大业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兴办教育事业方面最使陈嘉庚呕心沥血的，除了集美学校，就算厦门大学了。解放前（从1921年—1937年），陈嘉庚集资创办厦大16年，为厦大兴建校舍73幢，共9万多平方米。他自己带头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分12年付清）300万元，两笔合计400万元。在党和政府大力支持下，从1951年到1955年，厦大再扩建校舍31幢，共计6万多平方米。其中最大建筑物是拥有5000个座位的建南大礼堂，迄今它仍然是国内大学最大的大礼堂。大礼堂的两侧还建有化学馆、生物馆、物理馆、图书馆。此外还建成一座座教职员宿舍楼、游泳池、运动场、学生餐厅等等。这些楼房与设施，全部采用地产花岗石为主要建筑材料，既价廉物美，又坚固耐用。扩建前，人们曾担心国民党继续搞破坏，以大炮轰，或飞机炸。因此有人劝陈嘉庚待金台问题解决后，再扩建比较稳妥。陈嘉庚却说：“不要怕，敌人一边炸，我们一边建，今天被炸了，明天再建起来。”扩建成功后，他又说：“台湾（与大陆）统一后，将有万吨、十万吨外国和本国的轮船，从东海进入厦门，让他们一进入厦门港，就能看到新建的厦门大学，看到了新中国的新气象。那巨大的客轮中，将载来许多来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学习的华侨子女。”就是这座位于我国东南沿海，被海内外有识之士誉为“南方之强”的重点高等学府，从

1921年创办到1989年的68年中，已为国家培养出近3万名具有不同专业知识的各类人材，在全国和世界各国的各行各业中发挥着骨干作用。真是奇树培硕果，桃李满天下。

陈嘉庚不但一直热心在南洋和闽南办学，解放后尤其关心祖国建设，关心在家乡福建修建铁路和在厦门修筑海堤这两件大事。

解放初，陈嘉庚认为福建有12万平方公里土地，有1200万人口，竟没有一寸铁路，这种落后状况应该改变。他还认为英国人能在南洋群岛修一条石头海堤，把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连结起来，为什么我们新中国就不能在厦门海峡也修一条石头海堤，将厦门岛和大陆内地连接起来呢？新中国成立不久，陈嘉庚就将其大胆设想向党和政府一再恳切陈词，得到省、市和华东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认可和批准。当时尽管国家由于长期饱受战争创伤，工程技术人员十分缺乏，物力、财力也很困难，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却认为宁可将其它建设项目（如株州到韶山铁路）暂时推迟，也要把联接福建沿海和内地，与海外华侨有密切联系，与国际外贸息息相关的鹰厦铁路和厦门海堤工程首先修建起来。

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和前线军民通力合作下，由陈嘉庚提出倡议，总长10华里的厦门跨海长堤和全长近700公里的鹰厦铁路，于1956年12月全部建成通车。这两项艰巨复杂工程，其修建速度、工程质量以及建成后的社会效益诸方面，按当时历史条件衡量，都是上乘的，都应当载入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光荣史册。

1955年8月，陈嘉庚亲眼看到鹰厦铁路和厦门海堤工程进度迅速，心里非常高兴。但他不以此为满足，还想到全国各地走走看看。他不顾年迈体弱，不辞旅途劳累，亲临祖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和中南各地考察（包括重访延安）。他看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不仅在家乡福建和厦门，而且在全国各地，都在蓬勃发展，使他欢喜异常。考察途中，他连续不断向毛泽东、周恩来和有关领导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陈嘉庚祖国万里之行结束后，于1956年元旦发表了题为《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一文，文中赞道：“我的总观感是：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做我们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幸福。”

1956年，年逾八旬的陈嘉庚先生“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继倡议修筑鹰厦铁路和厦门海堤之后，又亲自筹划在祖国著名侨乡——厦门修建全国第一家华侨博物院。他带头认捐人民币10万元，并积极向其他华侨、侨眷募捐27万元，两项合计共得捐款人民币37万元。由于资金落实，实际负责建院事宜的张楚琨、肖枫等人办事得力，工程进展顺利。1958年，一座壮丽堂皇、拥有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的华侨博物院，在厦门大学附近蜂巢山下落成。落成后的华侨博物院陈列着近万件海内外各种历史文物展品，着重展示了我千百万海外华侨，几百年来披荆斩棘，与当地人民共同奋力开拓南洋群岛的光荣历史和光辉业绩，使每一个海内外观众参观后，犹如上了一堂生动逼真的南洋华侨史地课，受到一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形象教育。著名

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参观后留言：“厦门华侨博物院是中国唯一展出华侨历史的博物院，它使人们了解什么叫华侨”。

陈嘉庚对家乡的工业建设也很关心。由他建议、由政府兴办的厦门纺织厂，于1960年在厦门杏林湾畔迅速建成投产。这座当年就拥有5万纱锭的厦门纺织厂，是福建第一家现代化大型纺织工业企业，拥有从纺纱到织布的全能生产技术。厦门纺织厂的建成投产，不仅有助于解决福建人民的穿衣大事，还为厦门人民提供了4000多人的就业机会，部分产品还可以出口创汇，其社会效益至为明显。

四、斯人已逝，风范永存

党的真诚朋友陈嘉庚，不仅在南洋兴办工商企业和在祖国倾资兴学方面，能够独树一帜，成效赫然可观，而且在对待国家政治原则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明辨是非，敢讲真话。即便是对大权在握的执政党，他也无所畏惧，他敢“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早在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一时对日妥协气氛弥漫重庆，加深了我中华民族的危机。1938年10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身份，从新加坡向大会致电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后被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会议一致赞成和通过这项提案。进步作家邹韬奋誉之为“这寥寥 11

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后来汪精卫果然公开叛国投敌，陈嘉庚立即致电蒋介石，并提出严正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1940年3月12日，陈嘉庚亲率“南侨慰劳团”到国统区和解放区考察，他不顾蒋介石千方百计威胁、拉拢、阻挠和恐吓，将在重庆与延安所见所闻，原原本本向祖国同胞和海外侨胞如实报告，好就好，坏就坏。用陈嘉庚的话来说，就是“决不昧着良心，指鹿为马”。从而赢得了社会舆论的极大赞许。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取真诚拥护和支持态度，并以积极行动投入祖国建设的伟大洪流中去。他对国家内政外交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有某些不同看法，也毫无顾虑勇于向党直言。例如对“一边倒”的问题，他就主张兄弟友邦应平等相待，以维护世界和平。1950年4月25日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朝战争，严重威胁中苏两国安全，我国决定派出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陈嘉庚积极拥护。但他同时认为，中国人民为了阻止美帝侵略，敢于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而苏联虽提供了部分武器弹药，却还要我们折价还钱，实与情理不合。1958年，国家为了早日摆脱贫困落后面貌，加快了经济建设步伐，陈嘉庚也赞同，但他对全国各地许多不实事求是，甚至浮夸蛮干的做法，十分反感。在所谓“大炼钢铁”时，听家乡人说，人们把铁床、铁锅砸破，当作“大炼钢铁”原料，他就交代身边工作人员去实地调查，并如实写信向中央反映。此外，陈嘉庚对民间住房、卫生和风俗习惯，一向十分关注，早年曾有专门论著《住屋与

卫生》和《民俗非论集》两本小册子，极力主张城乡住宅要有规划，要讲卫生、讲健康，要移风易俗，不要铺张浪费。1955年他视察新疆独山子石油矿区新建的职工宿舍，认为宿舍建筑结构简朴，设备良好，既实用又省钱，他亲自向周总理和各地领导写信，建议推广。他看闽南各地乡村私厕林立，严重危害群众身体健康，就专门写信给福建省省长叶飞，提出废私厕立公厕建议。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作为党的真诚朋友，他时时处处体现着对党的真挚情谊。

陈嘉庚早年飘洋过海，外出谋生，经商办厂，成了闻名于世的千万富翁。富了以后怎么办？胸怀祖国的陈嘉庚，既没有恣意挥霍享受，也没有把钱留给子孙后代坐享其成，而是慷慨解囊，把一生辛苦得来的钱拿来兴办各项公益事业，兴办各类文化教育设施。正如我国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于1945年对他评价的那样：“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陈嘉庚自奉十分俭朴，个人生活一直坚持低标准。他晚年定居集美，住的是简朴的集美学校的一栋小楼房的两小间。卧室里摆着古旧的木床、被子、蚊帐；穿的是打过补丁的衣服和普通鞋子、袜子、帽子；用的是古老写字桌、沙发椅、旧皮箱和旧布伞；他到建筑工地督察，靠的是两条腿另加一支“司的克”（手杖）；吃的是当地老百姓喜欢吃的地瓜稀饭，配上一点花生、油条、豆干、青菜和小鱼。人民政府每月发给他的薪金外加各种补贴总共500余元，他却给自己规定每月伙食费不超过15元，余款全部充当集美学校办学费用。他用钱的格言是：

“应该用的钱，千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在陈嘉庚身上，既表明了一个精明的实业家敢于花大钱办大事的雄心壮志，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历来提倡“要珍惜每一个铜板”的传统美德，两者之间贯串着和谐与统一。

陈嘉庚自他当年到延安与共产党人结识之后，对共产党的认识是从怀疑到理解、到同情、到拥护。他拥护党所领导的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成了党的一位挚友。而党和人民，也非常敬重他、支持他。他曾经对人讲过：“知我者，党也。”

1961年3月，年近九旬的陈嘉庚积劳成疾，脑血管发生病变，病情日益恶化。中央卫生部派出专门保健医生和护士，住到他在北京的寓所护理他，并组织有名望的医务专家，多次对他的病况进行会诊。周恩来、彭真、何香凝、廖承志、方方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不断来到他的寓所探望。周恩来总理还特别指示在场的医务人员要采取一切措施，对陈先生要努力抢救和精心护理。

陈嘉庚在病重期间，曾让他的好友庄明理来到他的身旁，亲自交代三件事。一是自己身后的事，死后不要火化，希望运回集美安葬。二是人总是要死，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前途。……我们要尽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归中国。三是集美学校一定要继续办下去。香港、厦门和上海的集友银行，都是集美学校的财产，其红利和股息可充作学校经费。庄老听后即如实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总理指示：“第一、应按嘉老意愿办理。第二、解放台湾是全国人民包

括台湾同胞、爱国侨胞的共同愿望。嘉老关心台湾回归祖国，他的爱国精神给广大华侨树立良好榜样，他的愿望一定要实现，请他放心。第三，集美学校一定照嘉老的意见继续办下去，一定要把它办得更好，请他放心。”庄明理把周总理的话一一转告他。他仔细听着，在慈祥的面容上展现出宽慰的笑容。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因年迈体衰，又患脑溢血，医治无效，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

陈嘉庚逝世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举行隆重国葬。周总理担任“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亲自到灵前领头执绋。在首都举行各界公祭陈嘉庚先生大会上，中央侨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致悼词说：“陈嘉庚先生是华侨的领袖人物，是一个爱国爱乡、热心公益事业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和我们永别了，但是陈嘉庚先生生前拥护国家民族利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社会经济面貌，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推动国外华侨爱国大团结方面，表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给广大海外华侨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党和国家对陈嘉庚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厦门经济特区开始兴办，短短的10年，已使陈嘉庚的故乡变了样。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几十年来也越办越好。更值得欣慰的是，自从邓小平在80年代初期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以来，历史上留下来香港和澳门的主权问题，已

经和英、葡两国达成和平解决协议，港澳将分别于 1997 年和 1999 年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从 1987 年 11 月 2 日起，不少台胞已回到祖国大陆探亲，与离别 40 年之久的亲人团聚。如果陈老地下有知，当会含笑九泉。陈嘉庚虽然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那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光辉业绩，以及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真诚友谊，将千秋万代永为后人所传颂。

（责任编辑 刘昌亮）

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

〔苏〕Г·З·索尔金著 马贵凡译

已经是 1922 年，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的第五个年头。国际帝国主义扼杀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种种企图均以失败告终。苏维埃俄国站住了脚。西方有远见的政治活动家越来越坚定地指出，必须改变他们对苏维埃俄国的态度，必须从经济封锁转到签订经济协议谈判上来。苏维埃俄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得到改善，帝国主义阵营的经济困难日益严重，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凡尔赛和约并没有带来和解。这个时期，远东成了帝国主义之间尖锐矛盾的焦点。根据美国的倡议，帝国主义国家正在华盛顿召开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决议不仅会以牺牲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使美国更广泛地参与对远东各民族的剥削，而且会加重这种剥削。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的危机不断加深，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基础。

苏维埃政府成功地解决了民族问题；中亚、西伯利亚和外高加索各民族获得了真正的解放；苏维埃俄国援助起

* 译文有删节。

来进行民族解放革命的蒙古人民；苏维埃政权放弃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沙俄在中国取得的特权并声明支持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苏维埃俄国同伊朗、土耳其、阿富汗等国签订平等条约并且苏俄人民援助这些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所有这一切都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苏维埃俄国的榜样鼓舞着他们去采取坚决的行动。

可见，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将所有反帝力量，首先是将远东各国的所有劳动者联合起来的任务，已提上议事日程。

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中的指路明灯，是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其提纲和报告中对这一学说作了阐述。1920年的巴库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和1922年的莫斯科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都是以这一学说为旗帜举行的。

这两次会议具有同样目的，但是它们的工作却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进行的。巴库会议是紧随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召开的。这次会议的决议是根据列宁的提纲起草的。与会代表用会议决议武装起来之后，返回各自国家，把这些思想传播到正在争取独立的各被奴役民族的广大群众之中。在差不多过了一年半时间以后召开的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已经可以谈论各民族斗争取得的初步成果，谈论发展壮大起来的解放运动所面临的更复杂更具体的任务。代表们的发言，已是代表刚刚在许多国家建立起

来的工会，代表各地出现的共产主义小组和在一些国家出现的共产党，代表已经取得了胜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朝鲜游击队。无论在会议代表组成上还是在报告、发言和决议中，都反映出民族解放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 * *

筹备召开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时的形势非常复杂。看来，这就是这次会议的筹备时间长达一年零四个月（从贝拉·库恩在1920年9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代表国际执委会执行局提出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建议到1922年1月21日）的原因所在。由于会议筹备时间很长，又是由几个委员会进行的，所以造成了关于会议名称、开幕时间和任务的许多错误说法。而会议速记稿未能出版则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当时出版的小册子《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彼得格勒，1922年出版）仅仅含有会议的部分材料。关于这次会议的一些不大准确的说法，多半只是以参加当时交错发生的各种事件的一些人的回忆为依据，未核对文件，所以这些回忆叙事不准确和前后不一致，是不足为奇的。关于会议名称的说法多达十几个，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上述问题。不少人过去和现在一直称这次会议是：“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远东共产党和革命组织代表大会”、“远东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代表大会”、“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①、“远东共产党和

^① 《真理报》1922年1月25日，V·3·福斯特：《三个国际史》，莫斯科1959年版第324页。

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①、“莫斯科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②、“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③，等等。我们认为，既符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这次会议的文件的说法，又符合这次会议性质的较正确的名称是“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④。

第二个不准确之处是关于会议的工作地点。B·3·舒米雅茨基 1928 年写道：“（1921 年）11 月，东方（原文如此，实指远东一译者）各民族代表大会在伊尔库茨克召开……但是大会在伊尔库茨克城的工作只是筹备性质的。在这里，中国、日本、朝鲜和蒙古科做了较多工作……开过第一次全体会议后，大会工作由伊尔库茨克转移到莫斯科”^⑤。日本共产党人志贺义雄在其论片山潜一文中说：“1922 年，他（片山潜）出席了在伊尔库茨克开幕后转到莫斯科继续进行的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⑥ 这些说法都产生于一种误解。因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最初的一些决议中曾拟定伊尔库茨克为会议工作地点，的确几乎全部会议代表都汇集在伊尔库茨克，在伊尔库茨克就如何开好这

① 《回忆弗·伊·列宁》第 2 卷，莫斯科 1957 年版第 628 页。

② 《国际新闻通讯》柏林，1922 年 2 月 24 日，第 105 页。

③ 《消息报》1922 年 1—2 月；志贺义雄：《片山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载《共产党人》1959 年第 17 期，第 86 页。

④ 见 B·3·舒米雅茨基：《中国共青团史和共产党史片断》，载《革命的东方》1928 年第 4—5 期，第 222—223 页。

⑤ 见 B·3·舒米雅茨基：《中国共青团史和共产党史片断》，载《革命的东方》1928 年第 4—5 期，第 226—227 页。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⑥ 见志贺义雄：《片山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第 86 页。

次会议问题举行过一些会议并起草了文件。但是 1921 年 12 月 25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最后决定会议改在莫斯科举行。1922 年 1 月 22 日，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从 1 月 21 日到 30 日在莫斯科举行 11 次会议，2 月 2 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了闭幕式即第 12 次会议。

第三个误解是关于会议的任务。不能同意某些作者的这样一种说法，即这次会议是专门为“抵制帝国主义列强的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对待华盛顿会议的态度问题，只是会议议程中的一个议题，并且不是主要的议题。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 1920 年 9 月作出的决定，会议应当具有与巴库会议相同的性质。当时决定立即着手做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希望把片山潜从墨西哥召回，让他参加这项工作^①。但是如前所述，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决定在短期内未能实现。1921 年 5 月，又想到这次会议，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信中说：“筹备中的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也会起到自己的作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不仅需要象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时那样从理论上研究东方问题，而且需要从实践上研究这个问题。”^②

1921 年 8 月 26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局决定：“远东各民族代表会议定在 1921 年 11 月 11 日召开，将讨论华盛顿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在执行局的这次会议上决定将片

① 见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

② 《共产国际第三次全世界代表大会速记稿》，彼得格勒 1922 年版第 6 页。

山潜召回莫斯科。^①

1921年12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决定：“大会无论如何也不应在1922年1月1日以前召开”。这次会议建议研究会议改在莫斯科召开的可能性问题。^②

最后，1921年1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选举了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并决定在克里姆林宫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③

1922年1月24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已有出席大会的代表团代表参加，会议听取了关于已抵达的代表人数和关于大会议程的报告。^④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表决权的131名，有发言权的17名，他们来自下述国家和民族（见表）：

	有表决权	有发言权		有表决权	有发言权
朝 鲜	54	—	卡尔梅克	2	—
中 国	39	5	雅 库 特	—	3
蒙 古	14	—	印 尼 度	1	—
日 本	13	3	印 度	—	2
布里亚特	8	4			

① 见《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执委会主席团活动（1921.7.13—1922.2.1）》，彼得格勒1922年版第152、154页。

② 见《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执委会主席团活动（1921.7.13—1922.2.1）》，彼得格勒1922年版第314页。

③ 见《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执委会主席团活动（1921.7.13—1922.2.1）》，彼得格勒1922年版第379页。

④ 见《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执委会主席团活动（1921.7.13—1922.2.1）》，彼得格勒1922年版第444、445页。

与会代表的年龄构成很有意思：在有据可查的 119 名代表中，17—20 岁 7 名；21—25 岁 47 名；26—30 岁 29 名；31—35 岁 12 名；36—40 岁 13 名；41—45 岁 7 名；46—50 岁 2 名；51—55 岁 1 名；63 岁 1 名。换句话说，绝大多数代表（几乎占 70%）年龄在 17—40 岁之间。这次会议是年轻人的会议，同当时的许多会议一样，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都是民族解放斗争的最积极参加者。

与会代表的社会成份、文化程度和党派情况见下表*：

	社会成份				文化程度				党 派			
	知识 分子	工 人	农 民	其 他	高 等	中 等	初 等	文 盲	共产党	民族革 命党	无党派	青年团
中 国	20	9	9	1	9	26	4		14	1 ^①	13	11
朝 鲜	18	3	25	2	10	29	9		37		6	5
日 本	4	12			5	5	5	1	9	4 ^②	3	
蒙古和 布里亚特	4 ^③		12			4	8	4	1	10 ^④	3	2
总 计	46 ^⑤	24	46	3	24	64	26	5	61 ^⑥	15	25	18

小注：①国民党。②无政府共产党。③喇嘛和王侯。④蒙古人民革命党。
⑤知识分子，主要是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其中教授 1 名，律师 1 名，新闻记者 13 名，教师 15 名。⑥其中候补党员 10 名，同情者 6 名。

中国代表团由来自以下组织的代表组成：中国共产党；北京、上海、广州、四川等地的共产党组织；国民党；山东复兴会；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汉口互济工联组织；汉

* 此表根据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119 名代表的调查材料和其他资料制成。

口和山东、安徽等省的教师联合会；山东、安徽、湖南等省的学生联合会；山东、湖南、湖北等省的报界代表联合会；中国妇女联合会；湖南和浙江、广州的机械工会；京沈铁路产业工会；广州建筑工会；（浙江省）杭州印刷工会；湖南和浙江的农民协会等。在中共代表中有瞿秋白、张太雷、王烬美、邓恩铭、柯庆施等这样一些著名的活动家。

* * *

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开幕。第一次会议确定了会议议程，组成了领导机构，听取了贺词。列宁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大会议程上有四个议题：

1. 国际形势和华盛顿会议结果（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
2. 各国报告；
3. 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其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
4. 大会致远东各民族宣言。

片山潜代表共产国际和大会主席团向到会代表致欢迎词。他说，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是为了在友好的气氛中自由地讨论“如何消灭正在蹂躏和剥削中国、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日本和西欧帝国主义”的问题。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И·И·加里宁向大会致贺词，他说：“你们身处其首都的这个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它既不认为自己可以无偿地利用其他民族的劳动，也不主张

这样做。”他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劳动人民祝愿这次会议成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和远东所有被压迫国家迅速接近自己向往的目标（即可以安静地安排自己的劳动）的开端”。^①

C·A·洛佐夫斯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向大会致贺词。致贺词的还有中国、日本、蒙古、荷属印度、印度、美国劳动者代表，中国妇女代表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

共产国际执委会 1921 年 8 月 15 日通过的提纲指出，华盛顿会议是帝国主义国家又一次试图寻求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未能解决的资本主义矛盾的途径。提纲中说，华盛顿会议充其量也只能以力量的重新组合，对远东各国掠夺的加强和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而告结束。“这次会议只是试图以牺牲较弱的日本强盗的利益以及中国和俄国的利益来调整强大的盎格魯萨克逊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利益。”

当然，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不能不谈及与华盛顿会议有关的问题。大会代表就第一项议程发言时指出，扮演远东各民族的“朋友”和裁减军备拥护者角色的美帝国主义，实际上在追求自己贪婪的目的：尽可能多地在中国攫取特权，因此它拨出几十亿美元扩充军队，特别是海军舰队。片山潜指出，美国不可能完全实现它在远东的目标，它不得不同日、英帝国主义妥协，但他们的矛盾依然存在。关于这个问题，大会决议指出：“华盛顿会议必然会消除最近出现的一种幻想：似乎朝鲜、中国和蒙古的人民群众可以在

^① 见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

某种程度上指靠帝国主义的援助。这次会议必然会使这些群众完全相信，他们只有同国际无产阶级和苏维埃俄国联合起来，同一切侵略者进行有组织的团结一致的斗争，才能取得独立和自由。远东各民族的劳苦大众只有破除帝国主义的压迫网，建立以工农兄弟联盟为基础的新制度，才能摆脱奴隶地位和享用自己国家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

然而，没有任何理由把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意义仅仅归结在远东劳动者的那些与华盛顿会议有关的任务上。仔细研究大会材料就会清楚，这次会议是远东劳动者的第一次有很广泛代表性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具体地研究了每一个国家的情况和由此而得出的民族和社会解放任务。这方面工作在进行第二、第三项议程时，而主要是在进行第三项议程（各国报告）时有所体现。这就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意义所在。

一些国家代表的报告指出，自巴库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前进了一大步。这些报告反映了从探讨一般理论问题向具体探讨每个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问题的过渡。这些报告的题目很有意思。

中国代表团中有五人发言，他们的报告题目是：1. 论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2. 中国的工人运动，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3. 中国劳动者的严重状况；4. 中国政治斗争的历史概述；5. 中国妇女状况。

中国代表在报告和发言中讲述了中国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以及中小企业主所受到的帝国主义日益加重的政治经济压迫。报告人普遍强调，这种压迫为组织反对外国

帝国主义的广泛战线创造了条件。一位代表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北洋政府的政策：“坐车兜风，殴打学生，向外国人借钱，这就是它的全部活动，其余管理国家的问题都交给了外国人。”^① 报告人详细讲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严重经济状况，它所受到的骇人听闻的剥削和因此而不断高涨的不满情绪。中国代表还讲述了上海、唐山、长辛店、九江等地和津浦路一线铁路工人的光荣战斗，1921年的上海起义（原文如此——译者），以及全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情况。他们说：“我们要利用俄国革命的榜样，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贫穷国家联合起来，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应当首先联合起来，一旦我们联合起来，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与我们相对抗。”^② 有一个报告提出了中国革命应分两个阶段的思想。第一个阶段是争取民族独立，争取摆脱外国的政治压迫。报告人说，为完成这项任务，需要整个远东的劳动者作出努力，还需要引导远东有产阶级参加斗争。完成这个阶段后，开始进行第二个阶段，即“推翻资本主义，使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③ 这个发言表明，当时中国革命者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必须把第一个阶段的反帝斗争同反封建斗争任务结合起来。

大会没有就第三项议程作出专门决议，但是代表们的报告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远东

① 见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

② 见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

③ 见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

发生的新情况，即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其群众性和组织性都有所加强。

会议讨论第三个议题后，作出如下决议：“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在了解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后，1. 声明它完全拥护这些决议；2. 着重指出，必须正确理解民族革命运动与劳动者争取社会解放斗争之间的关系，认为受帝国主义奴役的远东劳苦大众，只有同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取得民族和社会的解放；3. 欢迎日本、朝鲜无产者的革命觉醒，认为这是顺利进行斗争的保证。”^①

与会代表中有7名远东妇女组织的代表，她们积极参加了会议工作。大会妇女组讨论了以下问题：1. 西方的妇女运动；2. 苏俄的女工和女农；3. 远东各国女代表的报告；4. 妇女运动的任务、方式和方法；5. 对俄国饥荒地区的救济的组织工作。

中国女代表讲述了中国妇女的严重状况及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完全无权地位。一位代表说：“共产主义的呼唤传到中国时，我们受压迫妇女听到这个呼唤，完全象是一只正在沉入水底的船，听到了前来救援它的轮船的汽笛声。我们的状况要求我们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我们的任务同你们的任务一样，我们的目标同你们的目标一样：彻底摧毁资本主义。”^②

与会者接受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邀请：到彼得格勒举

^{①②}见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

行闭幕式。1922年2月2日，大会的第12次会议在乌里茨基宫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除会议代表外，还有彼得格勒苏维埃、党、工会、妇女、青年组织的代表。俄共（布）彼得格勒省委代表、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和彼得格勒妇女代表向大会致欢迎词，中国、朝鲜、日本、蒙古共和国和远东妇女的代表以及法国、美国共产党和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致答词。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大会致远东劳动者宣言。

* * *

列宁因健康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大会的各次会议。在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中，也没有他直接针对这次会议的讲话，但是有理由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关注这次会议。片山潜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片山潜后来写道：列宁由于健康原因未能出席大会，但他曾邀请大会代表去他家里。“列宁同志同每个代表团讨论了其国家的特殊问题以及涉及整个远东的问题。他着重强调了把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各国革命力量联合起来的必要性”。^①

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斗争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总结了亚洲各民族争取人权斗争的成果并本着列宁的提纲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拟定了组织被奴役民族争取独立的任务。大会对苏俄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表示钦佩。在给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的致敬信中说：“远东

^① 见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各档案馆档案。

各国劳动者知道，俄国工人和农民走过怎样艰难的路程。首先他们为自己争得了主宰自己命运和建设自己国家的权利。每位代表心里都有这种感觉。他们要把这种感觉带回自己国家，转告给自己国家的工人和农民。”^①

大会也有重要的直接成果。会上，日本共产党人和日本无政府共产党人（原文如此——译者）联合起来了，并建立了共产国际同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联系。1922年7月日本共产党成立时，这种联系起了很大作用。按照片山潜的评价，“这次代表大会使日本社会主义领导人开始更坚决地从事建立共产党及其同共产国际的联系的工作。可以确有把握地说，这次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使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具体化和国际化了，从而完成了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②

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中国历史学家胡华写道，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问题，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英、美、日、德等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军阀制度和封建的土地制度。会议期间列宁还接见了中国产业工人的代表，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无限光明的前途，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其他革命群众，推动中国革命前进。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代表，不久后回国参加了党的第二次全

① 见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

② 见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并见片山潜：《共产国际与远东》，载《共产国际》1924年第1期第207页。

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的这次大会，具体地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革命纲领的制定。”^①

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对朝鲜民族革命力量的联合起了重要作用。大会在引导远东妇女参加积极斗争方面的意义也是很大的。

综上所述，这次会议是远东各民族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责任编辑 汪 新）

^① 见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1959年北京版第65—66页。